


80年
马华文学

<南洋商报>

名编系列 与其他

整理：雅波 

王岳波(雅波)

Mr. Wong Ah Loh

4, Tingkat 1,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 8 FEB 2005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 7

诸位文友：

几许年来，报章上的
文艺副刊，早已成为马
华文学的主干，许多重
要资料或精采作品都
发表于副刊上，倘若
不重视，殊为可惜也。

当您走向“世界性”，
也希望您保持住“马华性”，
那是前辈作家植下的根。

—— 雅波

- 8 FEB 2005

《目录》

1.	回顾连士珍先生(黄敏麟) P.1 - P.11
2.	编排美工创新风(陈雪峰) P.12 - P.21
3.	隔岸的灯火(白磊) P.22 - P.29
4.	你就是灯火(甄洪) P.30 - P.36
5.	薛残白编过的期刊与副刊(马汉) P.37 - P.45
6.	追忆李向(李锦宗) P.46 - P.52
7.	谢克的淡然敦厚(唐林) P.53 - 57
8.	永不言倦的彭松涛先生(马卷) P.58 - P.67
9.	马华文学史整理第一人——方修(张永修) P.69 - P.77
10.	缩微胶卷看过去(访杨松年)(林春美) P.78 - P.83
11.	马华文学与现代主义(张永修专访) P.84 - P.92
12.	80年代的时代命题(张光达专访) P.93 - P.98
13.	90年代年轻的一代(张光达专访) P.99 - P.102
14.	批评的典范(甄洪) P.103 - P.105
15.	记马华文学归侨作家丘士珍(钦鸿) P.106 - P.111
16.	何物千年聚若潮(白磊)(上)与(下) P.112 - P.123
17.	遥送梁秀英女士(钦鸿) P.124 - P.128
18.	甘为螺丝钉(甄洪) P.129 - P.131

19.	拜访游牧(王增文) P. 132 - P. 137
20.	马来西亚的族群文学与国家文学(洪谷锐) P. 138 - P. 141
21.	林英强的《郁达夫先生及其作品》(钦鸿) P. 141 - P. 142
22.	华裔史蹟(雅波) P. 143
23.	速写古老太平(雅波) 封底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书目

1	我的文学路(已编制)
2	2002年300字报限篇(已编制)
3	浅读马华文学(已编制)
4	2003年300字报限篇(已编制)
5	马华作家的悲欣岁月(已编制)
6.	2004年300字报限篇(已编制)
7.	名编系列与其他(已编制)
8	(整理中)

11 NOV 1998

75 (1923 - 1998)

周年

南洋商报



名编系列 1

南洋商报成立 75 周年，除了提供翔实报道、快捷资讯，同时也提供副刊园地，让作家文人驰骋其上，饮马放歌。一个文坛的风气如何，年轻的写作人是否有机会放胆突破改变，年长的作家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都和隐居幕后，“处心积虑”的文艺副刊编辑不无关系。这些编辑，成就了人才事业，但较之引领风骚的著名作家，其人其功却往往鲜为人知。【南洋商报名编系列】将每星期陆续向读者介绍曾经影响一时文艺气象的编辑，敬请垂注。（编者）

南洋文艺

星期三、六刊出

回顾 士升先生



连士升(1907 - 1972)

11 NOV 1998

《南

《南洋文艺》编辑来电，说今年是《南洋商报》创刊75周年，《南洋文艺》准备向早期在《南洋商报》编辑刊的前辈致人敬意，并认为我是写连士开先生的最恰当人选，因为连先生编过《商余》，我跟连先生很熟。

其实，我跟连先生并不很熟，只是他对当年许多刚刚起步学习写作的青年十分关心。据他后来说是当年新马两地的社会风气很坏，他担心的是这些青年可能得不到良好的指导而误入歧途。我也是当年许多刚刚起步学写文章的青年之一，所以便也有幸置身于他的关心的范围之内。

连先生是1953年四、五月间开始接编《商余》的，到了1954年我读初中的时候，他已经在华人社会里声名大噪了。

造成连先生声名大噪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这一年在《商余》上有一个天天见报的专栏叫“闲人杂记”，他在这个专栏上，每天用“观海”的笔名，针对当年十分动乱的新马社会，发表他精辟的见解，而且对当年英殖民地政府统治新马的手段，时常作出敢怒敢言的批评，而对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则非常支持。

当年进步的学校中学生，确实是轰轰烈烈的参加了反殖的队伍，并获得一些左倾老师的支持，但老师之中也有右倾的。因此，左倾的老师就鼓励我们每天读“闲人杂记”，右倾的老师，却叫我们不可以读“观海”这个专栏。有一位姓戴的海南籍老师和一位姓宋的客籍老师，更索性告诉我们，这个“观海”是一个共产党人。

当年我们这些学校中学生，都有着好奇的心理，有老师叫我们不可以读的文章，我们偷偷就会为了好奇而去读，何况还有一些老师鼓励我们去读。

所以，我应该说，我最早接触到连先生的文章，是他针对时弊的杂文。

险被驱逐出境

可是不久，就听说政治部要把连先生驱逐出境的消息。这事后来获得了陈雷锋先生的证实。陈先生在一篇纪念连先生的文章（红帽子陪送走连士升）中说，这事是政治部先通知当年《南洋商报》社长李玉棠，说是连先生有思想激进之嫌，要李玉棠先把连先生的职务辞掉，然后他们才下手。

陈雷锋先生说，他知道当时殖民地政府要驱逐任何人出境，必须经过公众联络部、政治部及华民政务司署三方面的同意，始能执行。于是他去找当年的华民政务司郑惠民先生主持公道。郑先生是当年一位深受华人社会拥戴的殖民地长官，他平时也天天读连先生的文章，深知连先生只是思想比较激进而已，并不是共产党人。结果，当连先生的案件到了他的手上的时候，他即拒批。当年华人事务的最后决定权，是操在华民政务司手里的。郑惠民先生拒批，英殖民地政府就没有理由把连先生驱逐出境。

我认识连士升先生是读高中那一年，突然接到他的来信。他说，他香港有位好友冯明之先生，正在为某个出版机构编一套高中华文课本，准备拿我一篇散文去作为课文，所以托他找我，问我同意与否，都可直接根据他给我的地址，写信给冯明之先生。我当时十分高兴，高兴之余，还在他的信末见到另一行“另者”。他说：“先生若不嫌弃，请于任何一日下午四时半过后，枉驾到报社一叙，——又及。”

这“另者”寥寥数字之于我，不啻晴天霹雳。我做报的作家，竟然对我用“不嫌弃”和“枉驾”的字眼。我其实早就想去拜见他，只恨没有人引荐。如今，我不敢不赶前去聆听教诲吗？

那时我每天下午放学后，必须随同东主去远一家洋行四工作，以赚取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第二天去工作时，我就拿连先生的信给我老板看，并问他可否让我请一天假，我要拜见正先生。

我的老板姓冯名裕谦，故前是广州中山大学的肄业生，平素也爱读连先生的作品，对连先生的言论，敬佩得不得了。他读了信后，比我还要高兴，即刻就叫我到报社去，还吩咐我，罗敏申路的汽车很多，踩脚车时要多加小心。

那一天，我终于见到连先生了，他是和蔼可亲的一位长者。他招呼我到他办公室一个角落的沙发上同坐，还倒了杯清茶给我。交谈间，他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学习状况、健康状况。他的语气非常恳切，并说彭松涛先生编“商余”的时候，他曾读过我的稿，然后又鼓励我，继续写稿给“商余”。这次见面，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的秘书来通知他开版的时间到了，他才起身与我告别。

次日下午，我去工作时，冯裕谦先生向我问起与连先生见面的情形，我一一告诉他，他高兴极了，他说他也曾与连先生见过一面，到如今可能连先生记不起来了。那是他有一天路过一间咖啡店时，遇到一位朋友在咖啡店里与连先生谈话，由那位朋友介绍认识的。他说：“连先生大名鼎鼎，却一点架子也没有。”然后又开玩笑的说：“将来你如果也大名鼎鼎，千万不可摆架子，要学连先生平易近人。”

之后，我偶有感想，就写成文章，寄与连先生，每当文章刊出，我经常发觉对其中有些遣词用字，都由连先生替我改得更确当。由此可见，他看稿的态度是十分小心的。

那么，有没有他看后不赞的呢？

当然是有的。在写作的道路上，我至今仍在学习。连先生不刊登我的一篇文章，是我评成北华先生的散文集《黎明前的行脚》。他读后即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叫我去见他。见面的时候，他即把这篇书评从抽屉里拿出来，说：“这是一篇最坏的书评。”

他的见解是，这篇书评如果把成北华的名字，换成另一个作家，把《黎明前的行脚》，换成另一本散文集，都可以用。他说：“一篇书评，如果套给另一本书也可以用的话，那篇书评，就是最坏的书评。因为你看不出成北华和他的散文的特点，所以评起来就是泛泛之作。这样的书评，就暴露了你的平庸和没有独到的见解。”



写出独到见解

他也说：“写‘序文’的时候，这一点更为重要。将来肯定会有人邀请你写‘序’的，你就必须写得出那人作品的异乎寻常，才是一篇好的‘序’。如果你像时下一般徒有虚名的作家一样，先说某某人是写散文的，再引出某某大作家说，散文的写法必须怎样怎样，然后再说你同意怎样怎样，而某某人的散文就是怎样怎样，于是功德圆满。这是最低级的批评，因为这样的一篇‘序’，套给任何人、任何一本书，都是一样的‘序’。在这最尖锐的层面上，你必须学习突破，你不好学那些平庸的作家，我相信你是有能力提升自己的。”

我接受了连先生的“点化”，并感动于他老早就看出将来肯定有人要请我写“序”。所以这些年来：我替松年法师的《墨痕与影》，替陈洪老师的《书法专辑》，替恩静女士的《我是妈祖的养女》写序，就都小心翼翼的，必须写出他们与众不同的精髓。甚至我为任何一位艺术家写评论，为任何一次高水平的演出写评论，我都必须要求我的评论，也是一件艺术品。

后来，南洋商报社从罗敏申路搬到亚历山大路。我也高中毕业且在教育界谋得一枝之栖。那段时期，我根本就不曾到报社拜访他，只知道他忙于写甘地、写尼赫鲁、写麦尤尔。当这些人物的传记完成之后，他又忙于写《海滨寄简》。

《海滨寄简》是书信体散文，他在每一篇散文里，都以温和的语气、恳切的态度与学术界的朋友讨论研究的方法，而更多的是，与当时的青年们，讨论学习问题、生活问题、恋爱问题、前途问题、升学与就业问题。这些谆谆善诱的文章，终于建立了他在万千青年们心中的导师形象，总共出版了8集，可说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著作。

他于1907年出生于中国福州福安县连厝巷，1973年逝世于新加坡，享年67岁。他的一生尽瘁于文字工作和学术研究，著作甚丰。要概括他的一生，我认为当年南洋大学中文系余雪曼教授在他逝世时，撰赠予他的一副挽联，最为完整。联云：

跌宕文史，脱略公卿，大名传海外。
笔扫千军，书成万卷，一初为青年。

11 NOV 1998

默默耕耘的报人

——连士升

■连尧思医生

11 NOV 1998

今年是南洋商报 75 周年纪念。以人类的年龄来计算，即使是在医药这么发达的 90 年代，75 年算是不短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里，它发生过无数的风风雨雨的事件，也经历过不少波峰起伏的人世变动。

父亲连士升的前半生，是在烽火，战乱，逃难的日子里度过。他从北京逃难到香港，越南，然后新加坡。直到 1948 年他进入了南洋商报后，生活才开始稳定下来。从 1948 年到 1971 年这 24 年，连士升在南洋商报全心全意地献出他的最可贵的岁月。他乐业敬业，20 多年来如一日。他曾任主笔、总编辑、总经理，但是他不为这些职务而停顿下来，反而利用在报馆工作的那段时期，出版了近 20 本书，深受读者的爱戴。

也由于父亲在南洋商报的这份工作，我和五个姐妹，能有个较安定的环境读书，深造。个个善学有所长，饮水思源，我们真要感谢南洋商报。要不然，我们的命运又得重写了。

虽然父亲工作的场所，是一个充满了是非之地，他总能超越当时的一切多事之秋，保持与世无争的清心态度。他是个读书人，他总喜爱那些爱读书，搞学问的人，不论他的出身，这里要讲几件父亲在南洋商报时对我们子女的谈话，可以反映父亲的为人。

父亲在南洋商报工作时，看门的是个印度人。记得父亲常常到来提到他。这位看门人，手不离卷，真令父亲大为佩服。也常常主动与他交谈，指导他，鼓励他上进，送他钱买书。

父亲平时乐施好善，以助人为乐。另一个父亲跟我们提过的是一位好学的穷学生，他勤于写稿，父亲给他很大的鼓励，让他有机会刊登他的文章在父亲编的副刊上，这位就是后来成为名作家的黄叔麟先生。

砂朥越历史学家刘子政先生对父亲的文章爱不释卷，他虽没见过父亲，但是勤于写信给父亲，向他请教，父亲利用《海峽商简》专栏，写了多篇文章鼓励刘先生做研究工作，最后成为砂朥越历史学的专家。詹冠群写刘子政时，这么形容：“连士升先生给刘先生很大的鼓励和鞭策。连士升是著名报人，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文章，在研究学问和文化方面，他供给刘先生一个新参照系和一个新视角。”

父亲平生敬仰的人，都是搞学问、求上进的读书人，而不是那些多财善贾或权贵。在这个以金钱挂帅的社会，更是难能可贵。

父亲的为人更大为怀，不念旧恶，当时另一间报馆的主笔，动不动就向南洋商报打笔战，父亲以冷静、磊落的胸怀从容应付，从不怕人恶言中伤。事后既往不咎，还跟那位仁兄客气的打招呼。许多父亲的朋友都为他不值，父亲只一笑置之。

临海写社论

父亲喜爱海，特地找了一个近海的屋子住，称之为《云海楼》。我们住宅的附近有一间《海景酒店》。那酒店临海，父亲的许多社论和文章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父亲喜欢那片无际的大海，我们也往往有机会在周末，随父亲在那里看书、看海，看日出及日落。由于父亲长期到《海景酒店》去，而他自己带那里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温文尔雅，每个工作人员都像父亲的朋友一样。

30-40年前的排版和印刷，和现在的相比，真是天渊之别。那时是用铅字，由工友一个一个捡出来，排好，用黑墨沾在铅字上，再打印在薄薄的纸上。我小时曾随父亲到报馆去，看父亲用红色的毛笔批改。改完，父亲往往亲自拿到楼下排字房去让他们修正。在那吵杂的排字房里，父亲对那些工友非常诚恳，每个人看到父亲也都热诚的向他打招呼。在回家的路上，父亲会谈论到那些工作人员怎么样的辛苦。多年后我做了医生，到报馆为工友检验，发现有一些人是中了铅毒需要治疗。还好现在捡铅字已被淘汰了。

适逢南洋商报 75 周年纪念，父亲生前在报馆的几个片断的回忆，除了显出父亲对文化的执著，对提携后辈的胸怀，和他对每个人的温文诚恳的态度；也让做他子女的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感谢南洋商报，并祝贺南洋商报前程万里。



■连士升爱写信给家人。这是1965年写给当年15岁最小的女儿萧思的明信片。

11 NOV 1965

连士升已出版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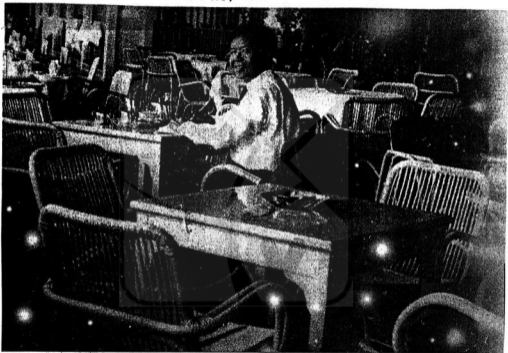
(黄叔麟/整理)

- | | | | | | |
|----|----------------------|-----|----------------------|-----|----------------------|
| 1 | 工业史(1939) | 19 | 名山胜水(1954) | 31 | 春树集(1960) |
| 2 | 祖国纪行(1948) | 20 | 西方英雄谱(1953) | 32 | 海滨寄简(一)——天宝集(1960) |
| 3 | 塞纳河两岸(1950) | 21 | 回首四十年(1952) | 33 | 海滨寄简(二)——物华集(1958) |
| 4 | 地中海之滨(1950) | 22 | 印度洋丹中(1950) | 34 | 两行集(1955) |
| 5 | 大西洋一角(1950) | 23 | 海滨寄简(一)——秋水集(1975) | 35 | 给新青年(1955) |
| 6 | 印度洋丹中(1950) | 24 | 海滨寄简(二)——孤鹭集(1972) | 36 | 闲人杂记(1955) |
| 7 | 回首四十年(1952) | 25 | 海滨寄简(三)——落霞集(1971) | 37 | 给新青年(1955) |
| 8 | 西方英雄谱(1953) | 26 | 甘地传(1966) | 38 | 海滨寄简(四)——地灵集(1965) |
| 9 | 名山胜水(1954) | 27 | 尼赫鲁传(1963) | 39 | 海滨寄简(五)——人杰集(1962) |
| 10 | 闲人杂记(1955) | 28 | 海滨寄简(一)——秋水集(1975) | 40 | 海滨寄简(六)——天宝集(1960) |
| 11 | 给新青年(1955) | 29 | 海滨寄简(二)——物华集(1958) | 41 | 海滨寄简(七)——天宝集(1960) |
| 12 | 两行集(1955) | 30 | 海滨寄简(三)——物华集(1958) | 42 | 海滨寄简(八)——天宝集(1960) |
| 13 | 海滨寄简(一)——物华集(1958) | 31 | 海滨寄简(四)——落霞集(1971) | 43 | 海滨寄简(九)——天宝集(1960) |
| 14 | 海滨寄简(二)——天宝集(1960) | 32 | 海滨寄简(五)——地灵集(1965) | 44 | 海滨寄简(十)——天宝集(1960) |
| 15 | 海滨寄简(三)——物华集(1958) | 33 | 海滨寄简(六)——人杰集(1962) | 45 | 海滨寄简(十一)——天宝集(1960) |
| 16 | 海滨寄简(四)——落霞集(1971) | 34 | 海滨寄简(七)——天宝集(1960) | 46 | 海滨寄简(十二)——天宝集(1960) |
| 17 | 海滨寄简(五)——地灵集(1965) | 35 | 海滨寄简(八)——天宝集(1960) | 47 | 海滨寄简(十三)——天宝集(1960) |
| 18 | 海滨寄简(六)——人杰集(1962) | 36 | 海滨寄简(九)——天宝集(1960) | 48 | 海滨寄简(十四)——天宝集(1960) |
| 19 | 海滨寄简(七)——天宝集(1960) | 37 | 海滨寄简(十)——天宝集(1960) | 49 | 海滨寄简(十五)——天宝集(1960) |
| 20 | 海滨寄简(八)——天宝集(1960) | 38 | 海滨寄简(十一)——天宝集(1960) | 50 | 海滨寄简(十六)——天宝集(1960) |
| 21 | 海滨寄简(九)——天宝集(1960) | 39 | 海滨寄简(十二)——天宝集(1960) | 51 | 海滨寄简(十七)——天宝集(1960) |
| 22 | 海滨寄简(十)——天宝集(1960) | 40 | 海滨寄简(十三)——天宝集(1960) | 52 | 海滨寄简(十八)——天宝集(1960) |
| 23 | 海滨寄简(十一)——天宝集(1960) | 41 | 海滨寄简(十四)——天宝集(1960) | 53 | 海滨寄简(十九)——天宝集(1960) |
| 24 | 海滨寄简(十二)——天宝集(1960) | 42 | 海滨寄简(十五)——天宝集(1960) | 54 | 海滨寄简(二十)——天宝集(1960) |
| 25 | 海滨寄简(十三)——天宝集(1960) | 43 | 海滨寄简(十六)——天宝集(1960) | 55 | 海滨寄简(二十一)——天宝集(1960) |
| 26 | 海滨寄简(十四)——天宝集(1960) | 44 | 海滨寄简(十七)——天宝集(1960) | 56 | 海滨寄简(二十二)——天宝集(1960) |
| 27 | 海滨寄简(十五)——天宝集(1960) | 45 | 海滨寄简(十八)——天宝集(1960) | 57 | 海滨寄简(二十三)——天宝集(1960) |
| 28 | 海滨寄简(十六)——天宝集(1960) | 46 | 海滨寄简(十九)——天宝集(1960) | 58 | 海滨寄简(二十四)——天宝集(1960) |
| 29 | 海滨寄简(十七)——天宝集(1960) | 47 | 海滨寄简(二十)——天宝集(1960) | 59 | 海滨寄简(二十五)——天宝集(1960) |
| 30 | 海滨寄简(十八)——天宝集(1960) | 48 | 海滨寄简(二十一)——天宝集(1960) | 60 | 海滨寄简(二十六)——天宝集(1960) |
| 31 | 海滨寄简(十九)——天宝集(1960) | 49 | 海滨寄简(二十二)——天宝集(1960) | 61 | 海滨寄简(二十七)——天宝集(1960) |
| 32 | 海滨寄简(二十)——天宝集(1960) | 50 | 海滨寄简(二十三)——天宝集(1960) | 62 | 海滨寄简(二十八)——天宝集(1960) |
| 33 | 海滨寄简(二十一)——天宝集(1960) | 51 | 海滨寄简(二十四)——天宝集(1960) | 63 | 海滨寄简(二十九)——天宝集(1960) |
| 34 | 海滨寄简(二十二)——天宝集(1960) | 52 | 海滨寄简(二十五)——天宝集(1960) | 64 | 海滨寄简(三十)——天宝集(1960) |
| 35 | 海滨寄简(二十三)——天宝集(1960) | 53 | 海滨寄简(二十六)——天宝集(1960) | 65 | 海滨寄简(三十一)——天宝集(1960) |
| 36 | 海滨寄简(二十四)——天宝集(1960) | 54 | 海滨寄简(二十七)——天宝集(1960) | 66 | 海滨寄简(三十二)——天宝集(1960) |
| 37 | 海滨寄简(二十五)——天宝集(1960) | 55 | 海滨寄简(二十八)——天宝集(1960) | 67 | 海滨寄简(三十三)——天宝集(1960) |
| 38 | 海滨寄简(二十六)——天宝集(1960) | 56 | 海滨寄简(二十九)——天宝集(1960) | 68 | 海滨寄简(三十四)——天宝集(1960) |
| 39 | 海滨寄简(二十七)——天宝集(1960) | 57 | 海滨寄简(三十)——天宝集(1960) | 69 | 海滨寄简(三十五)——天宝集(1960) |
| 40 | 海滨寄简(二十八)——天宝集(1960) | 58 | 海滨寄简(三十一)——天宝集(1960) | 70 | 海滨寄简(三十六)——天宝集(1960) |
| 41 | 海滨寄简(二十九)——天宝集(1960) | 59 | 海滨寄简(三十二)——天宝集(1960) | 71 | 海滨寄简(三十七)——天宝集(1960) |
| 42 | 海滨寄简(三十)——天宝集(1960) | 60 | 海滨寄简(三十三)——天宝集(1960) | 72 | 海滨寄简(三十八)——天宝集(1960) |
| 43 | 海滨寄简(三十一)——天宝集(1960) | 61 | 海滨寄简(三十四)——天宝集(1960) | 73 | 海滨寄简(三十九)——天宝集(1960) |
| 44 | 海滨寄简(三十二)——天宝集(1960) | 62 | 海滨寄简(三十五)——天宝集(1960) | 74 | 海滨寄简(四十)——天宝集(1960) |
| 45 | 海滨寄简(三十三)——天宝集(1960) | 63 | 海滨寄简(三十六)——天宝集(1960) | 75 | 海滨寄简(四十一)——天宝集(1960) |
| 46 | 海滨寄简(三十四)——天宝集(1960) | 64 | 海滨寄简(三十七)——天宝集(1960) | 76 | 海滨寄简(四十二)——天宝集(1960) |
| 47 | 海滨寄简(三十五)——天宝集(1960) | 65 | 海滨寄简(三十八)——天宝集(1960) | 77 | 海滨寄简(四十三)——天宝集(1960) |
| 48 | 海滨寄简(三十六)——天宝集(1960) | 66 | 海滨寄简(三十九)——天宝集(1960) | 78 | 海滨寄简(四十四)——天宝集(1960) |
| 49 | 海滨寄简(三十七)——天宝集(1960) | 67 | 海滨寄简(四十)——天宝集(1960) | 79 | 海滨寄简(四十五)——天宝集(1960) |
| 50 | 海滨寄简(三十八)——天宝集(1960) | 68 | 海滨寄简(四十一)——天宝集(1960) | 80 | 海滨寄简(四十六)——天宝集(1960) |
| 51 | 海滨寄简(三十九)——天宝集(1960) | 69 | 海滨寄简(四十二)——天宝集(1960) | 81 | 海滨寄简(四十七)——天宝集(1960) |
| 52 | 海滨寄简(四十)——天宝集(1960) | 70 | 海滨寄简(四十三)——天宝集(1960) | 82 | 海滨寄简(四十八)——天宝集(1960) |
| 53 | 海滨寄简(四十一)——天宝集(1960) | 71 | 海滨寄简(四十四)——天宝集(1960) | 83 | 海滨寄简(四十九)——天宝集(1960) |
| 54 | 海滨寄简(四十二)——天宝集(1960) | 72 | 海滨寄简(四十五)——天宝集(1960) | 84 | 海滨寄简(五十)——天宝集(1960) |
| 55 | 海滨寄简(四十三)——天宝集(1960) | 73 | 海滨寄简(四十六)——天宝集(1960) | 85 | 海滨寄简(五十一)——天宝集(1960) |
| 56 | 海滨寄简(四十四)——天宝集(1960) | 74 | 海滨寄简(四十七)——天宝集(1960) | 86 | 海滨寄简(五十二)——天宝集(1960) |
| 57 | 海滨寄简(四十五)——天宝集(1960) | 75 | 海滨寄简(四十八)——天宝集(1960) | 87 | 海滨寄简(五十三)——天宝集(1960) |
| 58 | 海滨寄简(四十六)——天宝集(1960) | 76 | 海滨寄简(四十九)——天宝集(1960) | 88 | 海滨寄简(五十四)——天宝集(1960) |
| 59 | 海滨寄简(四十七)——天宝集(1960) | 77 | 海滨寄简(五十)——天宝集(1960) | 89 | 海滨寄简(五十五)——天宝集(1960) |
| 60 | 海滨寄简(四十八)——天宝集(1960) | 78 | 海滨寄简(五十一)——天宝集(1960) | 90 | 海滨寄简(五十六)——天宝集(1960) |
| 61 | 海滨寄简(四十九)——天宝集(1960) | 79 | 海滨寄简(五十二)——天宝集(1960) | 91 | 海滨寄简(五十七)——天宝集(1960) |
| 62 | 海滨寄简(五十)——天宝集(1960) | 80 | 海滨寄简(五十三)——天宝集(1960) | 92 | 海滨寄简(五十八)——天宝集(1960) |
| 63 | 海滨寄简(五十一)——天宝集(1960) | 81 | 海滨寄简(五十四)——天宝集(1960) | 93 | 海滨寄简(五十九)——天宝集(1960) |
| 64 | 海滨寄简(五十二)——天宝集(1960) | 82 | 海滨寄简(五十五)——天宝集(1960) | 94 | 海滨寄简(六十)——天宝集(1960) |
| 65 | 海滨寄简(五十三)——天宝集(1960) | 83 | 海滨寄简(五十六)——天宝集(1960) | 95 | 海滨寄简(六十一)——天宝集(1960) |
| 66 | 海滨寄简(五十四)——天宝集(1960) | 84 | 海滨寄简(五十七)——天宝集(1960) | 96 | 海滨寄简(六十二)——天宝集(1960) |
| 67 | 海滨寄简(五十五)——天宝集(1960) | 85 | 海滨寄简(五十八)——天宝集(1960) | 97 | 海滨寄简(六十三)——天宝集(1960) |
| 68 | 海滨寄简(五十六)——天宝集(1960) | 86 | 海滨寄简(五十九)——天宝集(1960) | 98 | 海滨寄简(六十四)——天宝集(1960) |
| 69 | 海滨寄简(五十七)——天宝集(1960) | 87 | 海滨寄简(六十)——天宝集(1960) | 99 | 海滨寄简(六十五)——天宝集(1960) |
| 70 | 海滨寄简(五十八)——天宝集(1960) | 88 | 海滨寄简(六十一)——天宝集(1960) | 100 | 海滨寄简(六十六)——天宝集(1960) |
| 71 | 海滨寄简(五十九)——天宝集(1960) | 89 | 海滨寄简(六十二)——天宝集(1960) | | |
| 72 | 海滨寄简(六十)——天宝集(1960) | 90 | 海滨寄简(六十三)——天宝集(1960) | | |
| 73 | 海滨寄简(六十一)——天宝集(1960) | 91 | 海滨寄简(六十四)——天宝集(1960) | | |
| 74 | 海滨寄简(六十二)——天宝集(1960) | 92 | 海滨寄简(六十五)——天宝集(1960) | | |
| 75 | 海滨寄简(六十三)——天宝集(1960) | 93 | 海滨寄简(六十六)——天宝集(1960) | | |
| 76 | 海滨寄简(六十四)——天宝集(1960) | 94 | 海滨寄简(六十七)——天宝集(1960) | | |
| 77 | 海滨寄简(六十五)——天宝集(1960) | 95 | 海滨寄简(六十八)——天宝集(1960) | | |
| 78 | 海滨寄简(六十六)——天宝集(1960) | 96 | 海滨寄简(六十九)——天宝集(1960) | | |
| 79 | 海滨寄简(六十七)——天宝集(1960) | 97 | 海滨寄简(七十)——天宝集(1960) | | |
| 80 | 海滨寄简(六十八)——天宝集(1960) | 98 | 海滨寄简(七十一)——天宝集(1960) | | |
| 81 | 海滨寄简(六十九)——天宝集(1960) | 99 | 海滨寄简(七十二)——天宝集(1960) | | |
| 82 | 海滨寄简(七十)——天宝集(1960) | 100 | 海滨寄简(七十三)——天宝集(1960) | | |

11 NOV 1998



11 NOV 1998



■连士升平时在海边的海景酒店写社论及文章（照片提供/连亮思医生）



■报馆办公室是会见学生、读者、嘉宾的地方。这是与南大委员会，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合照。

11 NOV 1998

1998年11月18日 星期三

75周年
南洋商报
名编系列 2



姚紫，原名郑梦周
(1920 - 1982)

■陈雪风
(图像提供/陈雪风)

18 NOV 1998

编排 美工 创新 新风

缅怀姚紫

1. 开风气之先

知 道姚紫这个名字，那是在由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跟随一些同学

学习写一点课余活动的报道，投给学生刊物刊登，所以，很注意课外阅读，除了学校图书馆借阅文艺书籍与杂志，同学间如有什么好读物，也互相惠借阅读。有一次，我到同学基金殿的家，他即拿出几本，一见就发觉其封面设计新颖与众不同的杂志给我看，那就是《文艺行列》。我如获至宝，还没有翻阅，便为它封面的版刻画深深吸引。这个文艺刊物的编者就是姚紫。因为它的封面，在刊名的下方或旁边标明：姚紫主编。

过后，姚紫编辑南方商报的《绿洲》与南洋商报的《世纪路》，我也一直是这两个文艺副刊的读者。

姚紫编辑这两个文艺副刊，时间不长，似乎都是一年左右。然而，它们却是50年代初期非常受欢迎的副刊，而且在提携文艺写作者，促进文艺发展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姚紫编辑的文艺副刊与文艺杂志，对于版面的设计非常用心；文章的编排讲究有轻重，题目除了应用不同的字体外，也为一些重点文章的标题作一些艺术加工，并且特别绘制图画配合，使到整个版面非常醒目美观。他在编辑与版面设计方面所花费的心思，以及其特出的表现，是属于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对后来的同道，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2. 书印万六本

姚紫是1947年由中国到新加坡。先在学校教书。1949年初在南洋商报发表中篇小说《秀子姑娘》，轰动文坛。这个中篇小说连载之后，便出版单行本。它的出版，真是洛阳纸贵。在短短的4个月内，“竟一连再版3次，印了1万6千本”。

陈报夏（新加坡著名报人，为南洋商报编辑，后任主笔及总编辑）在为《秀子姑娘》写的序文中，对姚紫的文笔与作品的特色，作出了详尽与深入的论析。他说：“秀子姑娘”是“一部优美的文艺作品”，“作者有强烈的想象力，丰富的情感，洗练的辞藻，灵活的手法，细腻的描述”，而其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从叙事中，从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张精神的画面，跟着一幕幕紧凑的故事被置露着。其中内矛盾、冲突、兴奋、刺激……是思想与爱憎交错，血与泪的交流。（人物）思想和情感在作战，道德和思想在斗争，这一切，构成了它的瑰伟与不平凡……”

想像力强烈，情感丰富，辞藻生动优美，描写细腻，表现手法灵活；以及陈先生分析《秀子姑娘》成功的因素时，所遇到的“写情缠绵悱恻，却有着好色不淫与想律不乱的含蓄功夫”；“写景如一泓清水，有晶莹透彻之妙”，“善于把握一般读者的心理，能够在作品中处处引人入胜，使人们于注目凝神之下，会情不自禁地为之所感动”等，不但是陈先生精辟的见解，也可以说是姚紫小说的风格所在。

在《秀子姑娘》之后，姚紫所写的小说，诸如《乌拉山之夜》、《咖啡底诱惑》、《窝拉拉里》、《半夜行前一十年事》等等，在马华文坛，都曾广受欢迎与佳评。

18 NOV 1998

姚紫的小说，由于写情缠绵悱恻，既有好色又有缠绵的情节，在50年代激越反殖民要求民主的社会运动中，曾引发一而再的争议与论争，甚至被归列为黄色小说。

这固然给予姚紫很大的打击，不过，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创作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新加坡在50年代发生的反黄运动，是马华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而它的社会意义，毫无疑问也是积极的。至于相关的个别作家，文学史应作怎样的评价与定位，当然必须剔除人事的纠葛，由具体作品与作者的人本思想意识作依据。

3. 武侠慷慨气

有一次，我与诗人杜卢一起到天马图书公司，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姚紫。他当时很忙，经杜卢介绍后，便忙着审核特送去印刷厂的一些大样稿，我们并没有深谈。寒暄的话里，他表明知道我已离开新加坡，在吉隆坡谋生。

隔了一段日子，我到新加坡巡迴圈李汝琳家，姚紫也在座，一见面，他却如久未见面的老友那样，而“喧宾夺主”式地送烟倒茶。那一个午后，我们都尽情吸烟（不同品牌），悠闲品茗，谈天南地北，说跟下文坛，不知怎样最后竟提到武侠小说，而姚紫就口若悬河地谈起他在构思写作的武侠小说，既口沫横飞，又摇头舞手，演示他拟创新的武艺招式。

读姚紫的文章、小说，我的印象是他才气洋溢，情怀浪漫，而听他讲故事，他那能言善道的表情与气概，叫我恍若身在江湖，窥悉杀机埋伏，惊心胆颤，疑感听闻真假，突兴起循幽探究，却感风声鹤唳，不敢嬉动……

18 NOV 1993

那次的见面，我又认定姚紫另类小说的创作将是新华文坛的异彩。

不幸的是，这之后当我到新加坡，却获悉姚紫因病在医院留医。我和林兆（即林范平）兄相偕去看望他。如果没有记错，他的病床是被置于病房的走廊。记得苗秀在医院留医时，也是睡在走廊上。他们两人，都是新加坡杰出的作家，生前与身后都是新加坡文坛的交耀。

姚紫看到我们，就急着挣扎坐起来。与他握手时，他说了些话，但声音低沉而沙哑，我一时没听清楚。不过，我感觉到他仍然满怀自信，仿佛在劝慰我们不用担心。他与林兆谈了一些个人的事，便三句不离本行，述说将如何撰写那部武侠小说。他心急又很辛苦地说着说着，我们静静地听。看到姚紫躺在医院走廊的病床上，我的心情非常

沉重，但听到他有那么多精彩的历史故事在心里涌动，有待编写出来，便有一个期盼涌现，相信他会完成一直耿耿于怀的这部武侠小说。

然而，我们这次的见面竟成诀别。

今天，我在追思一些往事，思念姚紫，再看白秋琳（已故）写的《怀念姚紫》的悼文，对它最后的一段话使我感佩系之。那段话说：“卅末年（50年代至80年代），无论时代是多么的激荡，人生是多么的变幻，你说伟大也好，悲哀也好，我终于发现，这

是一个错误的时代。我们都以为伟大，最后却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可笑；卅年前疾恶如仇，卅年后我最不能原谅的是自己。然而，无论当年你如何的磊落，如今如何的卑怯，你我都没有错，一颗颗正直的心怎么会错呢？有心人只应同声一哭。……”

是的，正直的心被误解，或是伤害正直心的现象，都是一样错误。不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我们都该为之同声一哭。

18 NOV 1998

姚紫

■陈雪风

18 NOV 1998

未兑现的心愿

姚紫于1947年到新加坡后，创作文艺作品，在南洋商报与南方晚报编辑文艺副刊，兼出版《文艺行列》与《文艺报》，对于新华文学的奠基与经典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也为新华文学栽培了第一代土生土长的作家，尽了不少的心血。

当他于60年代末（1969年）到新明日报编《新风》时，相对来说，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春风得意，而且也有点儿落寂，但对文艺的情与爱，依然不变与无悔。这时期，他也不像以前那样，有各式各样的创作发表。《新风》大量发表了年青作者的文稿，包括许多当今文名实著的女作家。如果说新加坡女作家能如在其他领域一样，在文坛占了重要的地位，那么，很大的功劳应归于姚紫。

马华文坛有几位女作家，在当年也是《新风》的作者，一如新加坡女作家，得到姚紫的赏识与提携。丽白是其中的一位。

丽白给《新风》投稿，她那优美的文辞，一开始便受到姚紫的注意。她在《新风》发表了几篇文章，就收到姚紫的信。信中说：“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在文艺的情意上，我每看到你的稿子，就有一份亲切的老朋友之感。……”。接着便一如老朋友那样，畅谈他对世态的感触，并解析文学与典型人物与屈原的悲剧人生。他对当时文坛上一味崇尚港台的情情作品，“感觉哀伤”。他赞赏新马一群女作家“更优异、更有正义感，更有朴实的人生观支配她们写出更健康的作品”。

他在信中写道：“《新风》在这几年中，唯一能做到的，是鼓励了不少女孩子拿笔。我计划，我要替这些女孩子的作品出一套文艺丛书，有的一人一集，有的两人一集，有的四人一集。加上一些男作者（如陈龙玉、书墨、我……）合起来可成为一系列的文艺单行本，总名就称为‘新风文艺丛书’。但是，第一，必须充分的，

资金；我已经努力筹备够了；第二，是时间——恰当的时间，如果不是去年物价上涨惊人，印刷费涨了两倍，去年已准备开始了。”为此，他鼓励羅白，要她“继续为《新风》多写一些，更希望在我们出版的行列中，有你的集子参加。我更希望你能坚持写作，保住心血的这一份文艺热情。”

同时，姚紫还向羅白介绍了他的经验，从侧面提供指导——“依我自己的经验，这种文艺热情有时会很低沉，久了就成为懒散。我常常用阅读世界现代名著来激励自己，阅读的对象必须高明于自己万倍的，这样会像遥远的地方有一根旺盛的火光在吸引你前进！假如你读读的一些较低级的作品（指文艺技巧外的思想情感），那有时会受他们那种灰色的情感的染化，胸怀小，视野不远，作品只是在小圈子里翻跟斗，在选取题材方面，就有紧迫的，难以放浪之感。……”

姚紫这封信是1975年5月1日夜写的。两年后（1977年5月31日）即离开新明日报。往后的几年，他虽然一直怀着雄心，想着写作，计划着再搞一番文艺事业，当然包括出版著作与丛书。可是直至1982年2月28日他因病逝世，留下一笔财产（总款新币10多万元），付托4位友人设立“姚紫文艺基金”，资助新加坡作家出版书籍，却没有提到为《新风》的女作者编辑系列丛书出版。我想可能是姚紫未将他的心愿告诉其新加坡的知交或遗产信托委员会。

然而，无论如何，从他给羅白的这封信，我们却看到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无私，也感受到他一心一意鼓励新马女孩子拿笔写作，培养两地女作家的热忱。

可惜，这一份心意与愿望，却是姚紫晚年的遗憾，这也可由他临终前两天自拟的挽联，见到一斑。

五十始知非 原思有所希发 惜积才功 补德
得识

风雨偏来恶 无春落花狂飞 凄凉明月 空照
高蓬

18 NOV 1993

这是大明天啓年間。

秋收的季节，江南的晚稻都成熟了！黄黄亮亮的穗尖吐出黄金色的籽粒，伸在高过人腰的茎干上也，被秋风吹，便随着茎干倾斜地摇晃着，沙沙地发出声响。于是这些稻田好像被踩，从高的地方是连成一片，好像一片黄金色的海，无边无际地铺展在山的脚下，村庄的周围。

在那西山的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官家渡，原来是苏州管辖的，距离州城只有二十来里。村庄里住着三四十户人家，茅舍栉比之间，穿插着土墙粉墙，踏出一派幽静典雅的乡村田园景象。村庄周围四壁伏在柳柳荫下。一道清澈的小溪，蜿蜒在村庄前面，溪水是那么清澈的，溪边的浅滩，像一条碧色的带子从村庄的山脚绕出，穿过村前的弓形的竹桥，流向那黄金色的田野深处。

■姚紫平跋

18 NOV 1998

姚紫著作

柯云/整理

《如梦周诗词集》
《夜歌》

《西楚霸王》

《杂文·这支部队》

《黑夜行》

《根长书》

《情感的野马》

《九月的风》

《萍水记》

《离津拉王》

《带火者》

《马场女神》

《离浪拉王》

《没有季节的秋天》

《午夜灯前十年事》

《风波》

《阎王沟》

《咖啡底清感》

《乌拉山之夜》

《秀子姑娘》

《潜龙记》

《九月的原野》

《木桶鸭》

《新加坡传奇》

旧诗词

诗

评论

杂文

杂文

杂文

散文

散文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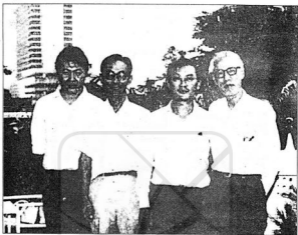
小说



姚紫

■姚紫签名式

18 NOV 1990



■姚紫（左2）与友人（左起）朱江、秦淮及前南洋商报主编石光华
（照片提供/陈雪风）



■姚紫著《新加坡传奇》
（书影提供/吉隆坡民众图书馆）



■姚紫著《咖啡的诱惑》
（书影提供/吉隆坡民众图书馆）

75周年
南洋商报

名编系列 3

完颜籍印象

隔岸的 灯火

■白垚

25 NOV 1998



1. 气寒西北何人剑

那是60年代后期，我在吉隆坡编《学生周报》的“诗之页”，与新加坡

作者时有书信往还，初闻完颜籍的名字，是牧铃奴的指点。后来，李苍与我共事，谈文说艺，也屡言及完颜籍，听惯了，无论书写谈话，我也跟著他们呼完颜籍而不名。牧铃奴、李苍那时年当青少，心地气壮，笔健神清，叛逆的一代，岂会轻易赞许他人。累积传闻，得到一个其人“胸襟如海，自在如山”的印象。虽未谋面，却已神交。隔岸有如此人物，文坛的风雷激变，自是可期。

前此，虽早已惊觉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的蜕变，风格得未曾有，想必有城外高人压阵，几番猜度；气寒西北何人剑？却未曾想及是完颜籍突围，分以公孙渔、黎犇为笔名，早已声满东南几处了。那时，《南洋商报》在星马分别印行，文艺副刊在新加坡编，星马同版。

- 完颜籍，原名：梁明广
- 年龄：67岁，1931年生。
- 工作经历：先在《南方晚报》当记者，后调至《南洋商报》国际新闻版做翻译，兼编副刊通讯、文艺、电影各版。1983年，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后，任《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组副主任。
- 在《南洋商报》及《联合早报》年资：40年（1951年至1991年）
- 专栏：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写了10年《笑谈天下》。
- 著作：文集《填鸭》。

2. 时流每被骄阳惑

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社会，独立不久，何国之有？我说的是文坛的山头堡垒，那是教条现实主义当道的时代。中国读书人莫不以天下为己任，忧时纸上，现实主义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龙牙老蚌，地灵人杰，海上佳气无时无，自尊尊人的现实主义作家，30年代以来，可读可佩可敬者也不少。

有些正确的事，到了一些人手上就变了样，甚至变得不正确了，这些人不一定是坏人，但多是偏颇的小人物，现实主义到了这些人手上，沦为听人的镰刀冲头。自胡风王实味后，现实主义真风告逝，大伤所兴，那是列史毛经盖过一切，“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唯一标准时代，任何主义一旦沦为政治教条，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岂唯误人，且亦自误了。

时流每被骄阳感，泥托东风者众。在某个程度上，龙牙老峽，是这些异类意识形态的殖民地，从市井到殿堂，这些人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以一统江山而沾沾自喜自娱自误而不自知，重重围困，自闭闲人，连开个窗看看窗外的勇气都没有。几曾苍生在全？

3. 完颜突围

也正幸在大环境下，60年代后期，新加坡是一个独立不久的开放社会，后殖民景下，在意识形态上，摆脱另类殖民的约束，是意料中事，必有能容之量，容一“胸襟如海、自在如山”的人物，另创新天。

完颜出身云南园，大学究竟是个可喜的地方，读书明理，各自修行。云南园内，教授藏龙卧虎，学子鸾飞鱼跃，一片葱葱郁郁的青青中，或沉潜刚克，或专气致柔。名师各法，门墙无贵管桃李。

云南园外，却非如此，点指兵兵，在位者改正你邪，不在位者，便秀才遇兵。但英雄时势，完颜突围，在假相的现实主义包围下，变化气质，走入现代。正如吃毛主席奶水长大的孩子，走上天安门一样，不是唯物辩证可以辩而证之的了。

完颜左笔理论，右笔创作，译笔亦佳，文学的现代主义只是他开窗的推手，非全部志业所在，将完颜定位在现代主义作家或现代派，那是不够周延的。完颜的身份有二，作家与编辑。以作家论，廿余年前，马仑说的“宏儒颂学完颜篇”，当时读来，微觉突兀，宏儒颂学一词，似应对著俱半的学者教授而言。廿余年后，证之完颜文学理论的深厚功力，文艺创

作的丰富才情，笑谈天下的旁征博引，自可当之无愧。高言大句千篇少，皇帝新衣半件多，当日以量论而不以质论，实在迂腐得很。

4. 编辑完颜

以编辑论，时人中，我先睹文编而莫逆于心，后有君子之交的有二人，一是罗孚，一是完颜。罗孚是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副刊编辑，同时也主《海光文艺》的编务，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和海光文艺的政治背景，规范不了罗孚用编的取向，他突社会主义文宣之围，鼓励金庸写无益国计民生、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他不拘一格，兼及香港各流各派。80年代，终罹文祸，困离山十载，是身历大是大非的铮铮汉子。今年年初，在三藩市初晤，见面犹胜闻名，谦谦君子，精光不露，境界层次，不是一般横眉怒目的文坛金刚可及。史有文识，文有文识，无识不能用其学，当编辑而无文识，众上诸语，多一不多，少一不少，匠而已。说完颜而比罗孚，在其同样的胸襟如海，在其共有的卓越文识。

完颜以不群的文识，作一士的薄薄，在《南洋商报》先后主编《文艺》、《文丛》，以不著他人脸色的从容，一种鄙弃热闹的自在，对一切躲进小楼与一统的人，客客气气地说：“开个窗，看看窗外，如何？”他不单是说说就算，而且不动声色、实实在在地开了窗，让窗内的人外望。

25 NOV 1998

5. 但开风气不为师

完颜的可贵，在他的从容，在他的自在，在他的不挟《文艺》、《文丛》两刊以自重。记得牧仲奴来信说，完颜要过自在的生活，不编《南洋商报》的副刊《文艺》了，我顿有将军一去，大树凋零之叹，临别前后，不禁怆然。当时我正在读袁自珍，很想把那首《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七绝，抄寄牧仲奴转致完颜，聊表寸心，全诗是：

何妨傍社有人疑，各位于伏处士卑。

一事平生无韵处，但开风气不为师。

诗抄好了，却没有寄出去。后来想到的是，雍容进退史上难，这正是完颜可贵之处，我如此落墨，反着痕迹，有违完颜洒脱的原意了。以编辑论，完颜有胆才而无霸气，进退雍容，较之视文坛为私产而盘据为放，几人称王几人称霸的王王霸霸，谁高谁下，谁正谁邪，不言自明。



■完颜著《填鸭》（书影提供/《南风》）

6. 完颜瑞献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退隐是蓄势待发，不久，在读者如我辈的焦虑中，完颜又从容地与牧仲奴在《南洋商报》合编《文丛》，内容形式，都超越了副刊的格局，那已不只开扇窗，而是更上一层楼，给读者看到的，已不止于扇面山水，而是江山如画的大块文章了。

牧仲奴就是陈瑞献，完颜瑞献，在当年谈文说艺的言谈间，是分不开的。完颜谦谦君子，英华内敛而自在，器外求而独树一帜，瑞献才调纵横，笔锋过处，摄人心魄，完颜因瑞献而灵动，瑞献因完颜而致柔。《南洋商报》开现代文风，到《文丛》刊世，完颜瑞献已浑然一片，共有方圆。

7. 隔岸的灯火

我与完颜只有一面之缘，那是28年前的事了，此后也无书信往返，自然谈不上深交。了无朋党之私，自无吹捧之嫌。莫逆于心的，文章的才情气度，编辑的识见格局而已。

几番风雨，28年真的那么快就过去了，遥念昔日隔岸的璀璨灯火，山长水远，问当年的点灯人在否？“故人几辈经风雨，谁向疆坛问霸才。”解读完颜，如斯印象，难免浮光掠影了。

26/10/98 寄自美国

25 NOV 1999

“才子”梁明广

■黄向京

凡写新华现代文学史，梁明广（完颜麟、黎黎、公孙逸）这个名字无法遗漏。60、70年代，在掀起现代派文学风气、翻译引荐西洋文学方面，梁明广是先行者。

而梁明广一贯低调，受访时不擅牌理出牌，无任余爷（余文锁）跟我说：“你要把他的话当反话来理解。”

在报人生涯里，梁明广的正业是通讯翻译，业务兼编文艺版。1967年，他接替已故杨守默（杏影）主编《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介绍了不少写作者如牧野奴（陈瑞麒）、南子、谢清、英培安等人，在文坛上作文字秀，也译介外国作家康德、艾略特、萨特、苏兹尼辛等作品。后编《文艺》、《青年园地》、《咖啡座》、《文丛》版，为青年写作者开发文字耕作的园地。

当年的副刊只有文艺版，仅有一两版篇幅，易于建立鲜明完整的风格。梁明广认为，《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星云》多刊登星洲掌故，思想较正统，《南洋商报》副刊《南余》看重性灵，风格比较开放。

文如其人，自由放任

文如其人，副刊风格亦然。他说自己性情自由放任，向来不喜欢“口号式”文学，不受思想和政治的限制。早年受欧美文学影响多过中华文学，曾半工读考获第一等南洋大学外语系文学士。近年喜欢港台作家如董桥、李碧华、张小娴，因为文字有空气般的自由。他说：“创作若没有自由的空间，文字无法呼吸，中国，尤其是中共解放后、经济开放前那段时期的文学作品就爬不出这个窗口。”对于自导自演的副刊，梁明广觉得距离理想还远，可以做得更好。

25 NOV 1998

当年进入报界，全是兴趣使然。梁明广是文字多面手，诗歌、小说、影评、评论、杂文、侦探小说样样来。他说：“个人的兴趣是喜爱文字，而兴趣不能改变，不管工作也好，游戏也好。所以，时间一晃而过。”梁明广笑言现在写的是“游戏文字”。其专栏《笑谈天下》议论国际时事，幽默风趣，自成一格。

退休后生涯自是“游戏人生”。每天早上风雨不改和“海南派”加东茶友聚会，无所不谈，过后，吃饭，看电影，买CD、玩电脑，或到书店找书，每星期唱一阙卡拉OK自娱。

原载 6/9/98 新加坡《联合早报》

25 NOV 1998

略说明广

■陈瑞献

明广是我国文坛罕见的先知先觉者。在60年代末，通过文艺的编串，他把新马文艺引入新地带，鼓起新风气，创造新景象，事成，他潇洒的走了。

他天赋好，后天博学强记，文字能力之强，世罕其匹。他又写得一手好英文，在我认识的华文作家当中，只有曾希邦可与之并比。

他写时评，观察敏锐分析入微，是一颗水晶球，而水晶球又藏在一个幽默的盒中，文人莫不视自己的文章为珍宝，明广不然，写完发表，看完就算，从未剪存，这种洒脱是文艺怪癖者最大的明镜。

以上种种，都比不上明广在学识拓展这方面的经验和领悟，正是：

眼明眼视，光焰灿然，洞鬼山径无遁迹；
心广含藏，城一何深，鸟仙花种尽人身。

原载 17/3/91 新加坡《新明日报》

南洋文艺

星期三、六刊出

敬《咖啡座》掌柜一杯

■陈瑞献

25 NOV 1998

掌

柜改行，店小二绝往，《咖啡座》今日收档。

这小小门面/因掌柜通地理，特设于一个外星人的聚散点，故开业以来，生意像流水，一杯接一杯；笑谈间，店小二懂 梵息巴尔扎克癖者当中不乏魔高万丈之士，比如欧阳修 (O. G. Wang) 近日常化装莅临，此刻正对着一杯 espresso 在炼大指，而客一抬头，每每发现店门口一个桔红色的圆碟体吊在半空久久不去，正是“不明来历飞行器”。

收档是把话说直了，不如“自行潜藏”晦涩。当代美国陶艺家阿尼生 (R. Arneson) 有一套型，五杯咖啡：第一杯斟，液溢；第二杯倾，液渐流布；第三杯覆，半身溶于液中；第四杯沉，杯渐隐入碟；第五杯没，杯不见了，留下一片咖啡在碟中，凝成一个漂亮的图案。这就是《咖啡座》掌柜完满一贯的营业技巧；在货色像汉堡包那样流行起来的一刻飘然而去。60年代的《文艺》，70年代的《文丛》以及80年代的《咖啡座》，都在野芳发佳木秀的那一刹，像一只神骏绝尘而去，他不留迹。今日，食家吃“科幻点心”若已吃出一点味儿，就是着了完照幕的道了，他没入自家身影，谁到别处去。

接着，据人性常情与历史发展规律，是轮到“行乞左马之侧，暮缘残弱”之辈来收拾他店后门边的糖水，然后想尽办法来消灭他的名字，只惜，如所周知，你能骗人一世，瞒千万人一时，却不能永远瞒遍所有的人。就在此时此地，趁最后一张《咖啡座》未变成微型胶片之前，让我来敬掌柜一杯，并送这位文艺界的“金人”一方匾额，上有楷体书写的毕卡索的一句咒语：“我在这里抹掉的红色，会在别的地方出现。”

原载 13/3/83《南洋商报》《咖啡座》最后一期



25 NOV 1998

■《联合早报》退而不休的老报人在报业中心合影，前排左起：黄彬华、梁明广、陈妙华，后排为陈新才。（照片提供／《联合早报》）

1998年12月2日 ● 星期三

你就是烛火！



南洋文艺

星期三·六刊出

2 DEC 1998

——纪念杏影先生

■甄供

1. 音容举止

《南

洋文艺》版主编来电话约我写一篇纪念已故杏影先生的文字，这是很可感激的，也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至于他希望我提供杏影先生的照片、手迹之类，可惜我无法办到。

有幸得很，我只见过杏影先生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是 90 年代中期，我在尊孔念书，高中毕业时参加学校主办的毕业班旅行团，到新加坡参观旅行，因机缘便得到这个机缘的。

当我知道参观南洋商报是旅游的活动项目之一，我的心情非常兴奋，便找同班几位经常投稿的同学一叙，说既然我们到新加坡去，就设法见见杏影先生，聆听他的教益。事前我们有没有写信给杏影先生，通知他我们的造访呢？我已记不清楚了。

由于征得领队同意，我们这几个人在参观南洋商报时，可以暂时离队，去拜访杏影先生。多谢谢社职员的指引，我终于来到杏影先生的办公桌前。他见我们的到来，便放下工作，站起来迎接我们。而我们呢？面对一个陌生的长者，却毫无怯生，把我们造访的目的告诉他，听完了之后，杏影先生便逐一与我们握手。

回想当年情景，我以为杏影先生音容、举止、工作作风等等，最能吸引着我的，有下面两点：——

1. 他握手很认真，有力，尽管岁月如水，流去了近乎半个世纪，漂白了我的许多记忆，唯独难忘的是，他的手的力量和热度。特别是当我处在一个酷似严冬、周遭了无人音的环境里，偶尔忆及，精神往往为之一振。

2. 杏影先生的记忆力很强。你想，当年像我们这般的习作者，人数何其多，且又是素昧平生，但杏影先生却能通过稿件，了解作者及其写作情况；你投过几篇稿子，哪些已刊登，哪些未能刊用，他记得一清二楚；你的作品有哪些优点或缺点，他会一一指出。谈话时，他的目光会在你的脸上停留、移动，谈话浓时，他的嘴角就会泛出笑容来。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时你意识到这是他对你的鼓励和希望。

我们还谈了些什么呢？大约不外以文学创作、思潮等问题向杏影先生请教吧。可是，当其他同学参观报社其他部门之后，来到这里，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便纷纷涌上前来，这样就逐渐形成一道人墙了。我想，我不能太过自私，长期霸住这个空间，便挤身出去，让其他同学得以亲炙这种教诲。事后，听一些同学反映，都说杏影先生讲得精彩，虽然我深感遗憾，但心里却是愉快的。

2. 爬的故事

想来就觉得自己是可笑的。当年我投稿《文风》、《青年文艺》的时候，是不知道编者是谁的，也不想去打听，知道这是杏影先生主编的文艺副刊，那是我收到退稿及一封短简之后的事。

50年代是我对文学最狂热的时代，涂写的习作可说不少，小说呀、散文呀、诗歌呀，样样都插上一脚去。这是初学者常犯的毛病，我也未能幸免。另一方面，父亲去世之后，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我自己也走入困境。初中毕业了，我不能升学，便出来打工，赚钱来维持家计，倘有一点余钱，便储蓄起来，准备回校读高中。后来报读高中，得以完成学业，学校的助学金居功不小。至于其他的费用，只好另想办法了。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之所以勤于笔耕，固然是对艺术的热爱，与使命感的驱使。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赚点稿费，以应付日常生活的需要。这就有点“为稻粱谋”的味道了。

投稿的规则，不论过去或现在，大约都相似的吧：凡要退稿，都需附上贴足邮资的信封。我那时很穷，虽然当年的邮费比现在的便宜，但我寄稿（无论长或短）时都没有这样办，因为我誊写时，用复印纸托底，就可以为自己留下存稿了（当时还没有复印机）。我没想到，世间竟有这样关爱一个素未谋面的初学者，不但为他看稿、改稿、写信鼓励，有时还为退稿等琐碎的事情而忙碌的编者！那么，他是谁呢？

——杏影先生！

2 DEC 1988

我收过吉影先生寄来的短信，大约有好多封。这些短信，内容都是针对我的习作而发的。他遣词用句，非常简练；语气平和，亲切且带有点发性。信纸大约是新闻纸，可能这是供编辑书写或制作标题的纸头吧。吉影先生似乎惯用毛笔，便蘸蓝黑墨水，在纸上书写。

从这些短笺中，我联想起两件小事。一是有一年我写了一篇文长的万字以上的种田派文字，投给吉影先生。端午节过后仍未见刊出。我不敢写信追问缘由。不久，退稿寄回来了，内附有一则短信。信中说明退稿原因：文字太过冗长，缺乏新意，来自书本上的见解太多……。原稿上有吉影先生用毛笔蘸红墨水进行修改的字迹，我通篇再看，发觉他改得非常认真。

二是我写了一篇题为《庚》的短篇小说，寄给《文风》。内容是讽刺英租界地时代洋奴的媚态及其恶习的。小说的主角，是一位近于中年的女性，我为她取个名，叫做何太太。笔名方面，我用了“白刃”（后来报章似有人也用这个笔名，写别类样式作品，但这却不是我）。不久，一位搞职工运动的朋友要搞一份报纸型的刊物，取名为《福利报》，要我供稿，指定内容要反映社会现实。我一时写不出其他的文稿，便想到有一篇稿子还在《文风》，何不索回应急呢？当稿子送回我的手上，我习惯通篇浏览，发现吉影先生已替我润饰，主角的名字改为H太太，题目也变成《庚的故事》。我想，这篇稿子大约就要发排了吧？在感佩中，我带有点歉仄，因为这是给编者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我把《庚的故事》交给《福利报》发表，不料这份刊物异常短命，面市不久，就被查封。其实这只是一份内容坚实、进步的刊物而已。当时小道的消息不胫而走，说谁在紧急法令下被捕，政治部正追查在该报投稿的作者的写作动机、政治背景，……如此等等。呜呼哀哉，霎时之间，乌云蔽日，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而我的原稿和剪报，就在这种情况下失落，无影无踪了。

3. 指引教导

我记得方修先生论述某个时期的马华文学现象时，曾说（大意如此）：在风雷激荡的年代里，文学工作者带着使命感去从事创作，希冀藉此推动社会运动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时势的推移，他可能被卷入这道洪流中去（近因太忙，没有查阅方修先生的著作，仅是想到记到而已，容待查核订正）。50年代正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反殖、争取独立的呼声，盈耳而至，我适逢其会，舞文弄墨之余，还参与政治活动，最终免不了要被卷入这股洪流之中，换来的就是失去四年的人身自由！

1963年年初，我步台集中营，算是“自由人”了。除了忙于找工作之外，我对文学创作的热忱，不因遭受万般磨难而减退，往往就在深夜里，我在高居的那间丑陋狭窄的木屋里，以一盏火舌摇曳的奥土灯伴我，伏案把自己的灵感化为文字。（由公共厕所谈起），《十月的暗井》就是我那时涂写的作品。前者发表在《青年文艺》，后者好像是刊在一份刊物上。除此之外，我似乎没有什么创作了。“逼离畏闻文字狱”，我曾因此尝过许多苦头，所以，这个时期我就把精神集中在马来文学作品的翻译。

我译过哪些马来文学作品呢？大约有好一些吧，现在还记得篇名的，有《从土敏土桶中检出的信》（互译的日本作品）、《哈利发·姆玛》、《渔民曲》等等。这些译品，有些是投给南洋商报《青年文艺》，有些是投给文学刊物的，几乎都有刊用。只有《从土敏土桶中检出的信》未见刊出，那是投给《青年文艺》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稿子被退回来，我才知道不能刊用的原因：重译。短信上作了说明，大意思是说：这篇作品已有文友译过，其译文已刊出，你的重译未能再刊用，抱歉退回。在我的原稿上，译错或欠准确的地方，都被一一改正；特别使我获益的是，知道日本人的姓氏，不可以仅凭音译。信末有署名。这都是我熟悉的笔迹和名字。你道他是谁呢？

——杏影先生！

我心潮起伏，把这封信看了又看。我要写信给杏影先生，表达我的深深的感激，感激他多年来在我的写作道上给予的指引和教导；更想告诉他我的怀念，怀念他刚来可好；也想到新加坡去，再次握他的手，听他谈文论艺……。不知怎地，我的眼睛突然显出了万水千山，堵住了我的去路。悲愤袭来，我抓起写好的信件，把它撕个粉碎，斩断赴星的念头。我笑我的愚笨和天真，我笑我的白日梦！……

在许多场合里，常遇到相识或不相识的文友问我：你可常见到杏影先生？我只能用拙文开头第二段那三句话回应：“我只见过杏影先生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4. 照亮别人

杏影先生（1967年1月5日逝世）离开我们已有卅多个年头了。在这段时期，我断断续续地读到一些纪念杏影先生的文章，但自己却没有写过一言半语，因为我与杏影先生的“交往”（倘能用这两个字的话），大都是与我的投稿有关，平凡且又是琐碎，似乎无需用诸于笔墨的吧？记得在那个年代里，我把自己刊出的作品剪贴在一本单线簿里，连同杏影先生来信及我的被退回的稿件等，合存在一起，留作参考和纪念。可恨天不从人愿，这些资料都在离乱中丢失了！如今还能找到我那个时期发表过的作品，只有两篇，那是收集在我的《里程集》中的《随想》和《由公共厕所谈起》。

应该感谢本版编者的厚爱与催促，使我的尘封的记忆得以“出土”。虽然我自断拙文写得不好，但有其弊则有其利吧，因为从我所叙写的平凡而又琐碎的事例中，更能突显杏影先生的不平凡；扶掖和指引后辈，不遗余力；“……树立当地清新刚健的文风，厥功至伟”（方修《怀杏影·注1》），在那万马齐喑、荆棘满途的年代里，杏影先生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烛火！

（1998年10月）

2 DEC 1998



■杏影著《愚人的世纪》
(书影提供/华研)



■杏影著《想想写写》
(书影提供/华研)

1996年12月2日 ● 星期三

1998年12月9日 星期三



薛残白，原名薛前璧
(1910--)

■马汉

薛残白

编过的期刊 与副刊

- 9 DEC 1998

1. 对名字印象深刻

记 得当我年纪很小的时候，便知道南洋商报社有一位名字叫做薛残白的编辑；而且，也在那个时期，便与他结上文字的因缘。

在1949年到1955年的那6、7年间，南洋商报社除了每天出版《南洋商报》之外，还在晚间另外出版了一份叫做《南方晚报》的“晚报”；除此之外，报社还大事发展出版业务，包括了出版期刊杂志以及各种丛书。在丛书方面是以《南洋丛书》为主，至于杂志，则有不同性质的几份期刊，譬如大型综合性、偏重文艺学术的《南洋月报》；综合性质的《星期六》周刊；纯文艺性质的《文艺行列》；以刊载广播电台节目为主，娱乐消闲文字为辅的《南洋广播周刊》；以及以中学生作为对象的《南洋青年》5份。

在当时的这5份杂志与丛书之中，版权页（或“目录”页）上，必定印上编辑委员会的名单，督印人、主编、编委的名字全都印在上面。家父是一位爱读书的人士，在上述的5份杂志之中，除掉《南洋广播周刊》之外，其他3份给成人阅读的周刊与月刊，每期必定购买，至于《南洋青年》，则由我自己掏腰包买回来读，虽然在1952年，我才是一个6年级的小学生。

虽然是一个小六生，可是读熟了“编委会名单”之后，督印高延龄（当时南洋报社的经理），编辑之中的主笔曾心影，主编陈振夏（《南洋月报》）、连士升、薛残白（《南洋月报》编辑，后来担任《星期六》周刊主编）、谢松山、曾快忱（《南方晚报》总编辑，兼南洋丛书编辑）、彭松涛（《商余》主编）、郑梦周（即姚素，《世纪路》副刊兼《文艺行列》主编）、杨守默（即杏影，《文风》副刊主编）、冯列山（主笔）……这些名字，都牢牢地嵌在脑版之上。

之所以会对“薛残白”留下深刻的印象之一是这个名字在当时我幼稚的心目中认为是个很特别的名字，为什么有人的名字叫做“残白”？毕竟当时年纪小，不懂得30、40年代，中国许多旧式文人都爱用什么冷血、残云、张恨水、孙了红（侦探小说家）、陈蝶衣……这些带着艳丽、灰白、或谓“罗曼蒂克”的名字。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南方晚报》有一个每晚报纸的综合性的副刊，叫做《咖啡座》，跟《商余》的风格十分接近，也是个综合性副刊杂志，评论为主的副刊，上面有一个方框，由南洋报社几枝“名笔”轮流在写稿，其中有洪亮等人的杂文，这个副刊就是薛残白在担任编辑。

当年我虽是一个小六生，可是也经常有习作在《咖啡座》上刊出，原因是经常聆听家父讲述潮汕家乡的习俗和民间传说，斩后便将之记载下来，以几百字到1、3千字，然后寄到《咖啡座》去，居然几乎篇篇见报，给我鼓励很大，因而乐此不疲。我记得当时的《咖啡座》也刊登影评的，我自动便跟着家父去看电影，也摹仿别人写了意见，结果也被选刊了。当年的署名就叫“小影迷”，事实上也是个如假包换的小影迷哩！

2. 编辑身影的延长

薛残白先生在南洋商报任职的历史十分悠久，根据马仑兄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书中的记载，薛老白从1928年便进入南洋报社了，最早担任记者及校对，然后再升任编辑，其时年仅17。在撰写本文之前，我曾致电向马仑兄请教及求证，他告诉我：有关薛残白项目下的资料，是当他访问薛老时承他亲口讲述的，应该没有错误。看来，薛老果尔：“出道极早”焉。薛老生于1910年，今早已登88高寿了，也是新马文坛，报坛的一位耆宿了。

根据马仑的记述，薛残白先生年轻时代也曾搞过“文艺”的。《新马文坛人物扫描》页375，《薛残白》条中记载：“17岁（1928）那年，入南洋商报社任校对和记者，同年开始写文艺作品……翌年，他在《总汇报》写短评。”另外也记述称：“约于1937年（26岁）编《如此社会》副刊，当时，也用薛残白为笔名在《现代日报》发表新诗。早期也用真名薛前竟发表散文作品。战后，曾编《星期六》，用单字“丑”为署名发表文章。”

从这一段记载中，不难了解，薛老曾经一度是“文艺青年”，为新马文坛干过播种、灌溉及栽花植木的工作。后来随着工作负担的增加，年龄的漫长，兴趣转移到写“南洋”地区的掌故与考究小品去了。因为根据他在《南洋日报》中以“丑”作为署名发表篇目观之，在90年代，他写了大量此类小品。

进入60年代以后，不曾再见到薛戎撰写的作品。看来，他是专职于编务，无暇再从事写作，更多不再搞“文艺”这个调调了。事实上，在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也有过像孙伏园、黎烈文等位名编辑，原本本身也搞文艺，从事写作的，后来专心去编副刊之后，（孙伏园编《晨报》副刊，冰心便是在他鼓励之下开始写作的；黎烈文留学法国，译介过不少法国文学名著，后来编《自由谈》，十分出色，许多名家杂文，包括鲁迅的，都在《自由谈》刊登）本身的创作便少了，不比他鼓励或栽培出来的作家出名，著作也远较他们少了。这不是奇怪的事，在新马二国的名编之中，编《晨云》的林健安；编《展望》与《文艺》（均为中国报副刊）的林英强，编《光华日报》、《新风》与《青年文艺》的温梓川，都有相同的现象。

因此，薛戎白先生本身也未见有著作面世。反而是当时在他主编的杂志和副刊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不乏成为作家、著作等身的。

薛戎白主编过《南方晚报》的《咖啡座》，南洋商报的《商余》与《影艺》，我甚至相信（猜度），当年《南洋商报》星期刊的一个叫《星期园地》的综合文艺副刊，也是由他主编的。从风格之上，有理由如此推测，加以相信，不过有待求证。

薛戎白从1949年9月3日开始担任当时创刊的《星期六》周刊主编，同时为期甚长，大约将近十年，一直到了1958年前后，《星期六》周刊从综合性内容改革为纯文艺周刊为止。

然后，他自60年代初期一直到60年代末期，接编《商余》副刊，为期也约有10年。其60年代中期（65、66年间），他还兼编《影艺》副刊。

薛戎白主编下的《商余》，便一改即风人、彭松涛、洪叔谦三人的“杂文”为主的风气，也与李敏生的“香港风味文艺”迥异。他将《商余》带进一个以考克、掌故为主要内容的“时代”。每天刊出中国各地的名山胜水的描述及历史，中国诗人词客，文学史上的逸事与掌故，以及各种文史的考克文章，跟他在《南洋月报》用“钰”为署名的发表的20多篇小品风格相近。他的兴趣在于此，因此所编的副刊也以此作为风格，应了西方人所说的“刊物是编辑人身影的延长”，信哉斯言！

我之与薛老结缘，始自《咖啡座》，再到《星期六》周刊，然后再至《商余》与《影艺》。当年，我曾以“树欣”（原署“小影迷”的，编者王兆田先生大约认为不够严肃，改用我另一个名字）、罗茵、方亮等署名为《影艺》（自王兆田主编时期开始，一直到薛老的时期）发表影评、影坛掌故与明星评述。一直到薛老不再编副刊为止，总共历时几近 20 载。

不过，年轻时代由于性格内向、自卑，一直不曾到报社去拜会编辑，虽然其间接获《影艺》编者王兆田与《绿洲》的曾铁忱的信，约我到报社见面，无奈“年幼无胆”，都不敢赴前聆听获益，与薛残白先生也只限于“神交”。20 年间蒙他不弃采用拙文，可是却缘慳一面，一直到大约四年前，在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办的春节雅集宴会上，才见到薛老。当时还是由马仑兄加以介绍的。薛老年岁虽高，可是精神奕奕，一副清瘦的模样，不过却是风度翩翩，充满长者之风。只因时间短促，也只略为寒暄而已，不及向他请教与访谈。面对著心仅数十载的编者，又无缘向他请教，不免感到若有所失也。

听说薛残白先生比较乐于讲述主编《星期六》的往事，事实上也必然如此的，他毕竟主编了将近 10 年的历史，从《星期六》创刊开始，一直到改革为纯文艺周刊为止，不免结下深厚的感情。

3. 星期六十年难忘

《星期六》周刊在 1949 年 9 月 3 日创刊，每周出版一次，顾名思义，自然是订星期六为出版期。不过当年在星期五便可从书局或报摊上购得了。

这份周刊是综合性杂志，集合了时评、评论、艺文、文化、历史、地理、掌故等等内容，并且略为偏重文艺。封面彩色印刷，以刊登当地（新加坡为主）画家如钟泗滨、刘抗、陈文希……等名画家的作品为主；封二和封底刊登时事、名人、风光等等图片，每期各有主题，封三（封底内页）刊登幽默、趣味的西洋漫画。第一页，在目录之上有几则时事短评，薛氏以“钰”作为著名的短评自然经常出现；内页经常刊登当时南洋商报几枝名笔的文章，连士丹以伯棠、观海等署名发表杂文、怀旧文章，后来结集出版的《南行集》与《回首四十年》，奉半文章都

在《星期六》刊登。谢松山的专栏《杂俎忆语》，每期一篇。此外有掌故、名山胜水的报导，世界各地的见闻等等，每期还刊登一篇一期完的短篇小说，当年名噪一时的邱苇絮（重阳）、白荷（陈瑶亚、谷萍）、陈蒙、李金泉、徐君康、陶焰……等人，都经常提供小说，其中也刊登过较长而分为两期刊完的。另有余儒吾、曾铁忱（德寸、二难等署名）、许云槐等人的南洋地方、历史掌故；最后2页刊登“鬼影幢幢”的西洋鬼故事。从上述的内容简介中，可以窥见内容极为丰富、充实，而且足以满足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需求的。50年前创办的杂志，以当地人材、财力、物资维持，不可不谓十分先见的了。

在《星期六》周刊创刊号上，薛戎白还亲自写了一篇《发刊词》，写得十分幽默风趣。而且别致，我将它抄录于后，作为本文的结束。大家不妨细读，当知薛氏的功力与作品风格之一斑了。（同时，也可见得当年创刊的前因后果。）

《星期六》发刊词

本刊筹备将近半年，很荣幸的，今天得和读者见面了。照例应该来个发刊词。

我们创办这小小的刊物，既无政治上的目的，也没有什么大道理，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共军的连战皆捷，席卷中原半壁山河，而称毛泽东风流潇洒，有儒将风。或者故意讥讽蒋介石光头秃秃不文，有点像虞世凯。可是，我们总得承认毛泽东确有文学天才，一闻《沁园春》万人争诵。因为事实总是事实，个人政治上的立场不同，也只见个人政治上的立场不同。“歌功颂德”或“落井下石”并不见得高明。所以，我们觉得与其用美丽的谎言，向人们说教，不如用笨拙的忠言，引人共鸣。你以为对吗？亲爱的读者！

本坡的定期刊物，实在太少了，除了几家日报以外，简直寥若晨星。京沪易手之后，国内一切杂志，停刊的停刊了，不停刊的也没有办法南来。精神粮食一经断绝，这沙漠也似的南国，更显得加倍凄凉。于是，我们邀集三五同事，倡办本刊，大家的看法既然相同，并经报社当局的不同意，即时毫无异议通过。因姚素复写的《秀子姑娘》一

- 9 DEC 1993

版再版，再至三版，一时洛阳纸贵，名重仕林，又以刘抗兄为华人美术会主席，素负时誉，所以大家决定请他们两人担任编辑。而余因在报界服务较久，各方情形较熟，可拉稿，可跑腿，亦躬与其盛，爰居编辑之列，实在是“聊备一格”，“毫无出处”，说起来惭愧得很。

本刊因为每逢星期六出版，所以就名做《星期六》。如其说，读书是正当的消遣的活，则我们很愿负起这个小小的责任，使亲爱的读者，在每个周末，“一卷在手，乐在其中”。如果因为我们的名字叫做《星期六》而误会到过上海《礼拜六》派，则甚抱歉。

以上当作发刊词。

（薛残白）

（1949年9月3日出版）



■薛残白（左）与马仑摄于新加坡，1985

（照片提供/马汉）

关于薛残白

■马汉

— 9 DEC 1998

薛

残白先生的原名叫薛前璧，又名薛瑾，他是福建会门人，生于1910年农历1月27日，毕业于厦门同文书院。

1928年，薛氏便到了新加坡，并进入南洋副报社工作；开始的时候任校对及记者，其时才17岁。

大约到1937年，当时他26岁，担任《如此社会》副刊编辑，同时也开始用“薛残白”这个笔名在《现代日报》上发表新诗。至于早些时候，他也曾用真实姓名薛前璧发表散文作品。

马仑也记载薛残白也曾用“钰”作为署名，发表过相当多篇文章。

结果，我在南洋报社于1960年1月创办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南洋月报》总共23期的目录中，发现自第二卷第三期开始，每一期都有署名“钰”的作者，发表过不少篇的作品，现抄录如下：

1. 新加坡来历；2. “角子”名称的由来；3. 亚历山大在南洋的威望；4. 马来亚是马来人的吗？5. 马来王子向仙女求婚；6. 缅甸人的星期分做八天；7. “风马牛”新解；8. 梁山泊英雄传说在暹罗；9. 新文字的鼻祖是新加坡旧桥；10. 中英语言的大同趋势；11. 重头轻脚的暹罗风俗；12. 新加坡的街头英文；13. 马来亚独一无二的中文地名；14. 人变虎的法术；15. 三宝太监有没有胡子？16. 帝汶岛和郑公明；17. 富有诗意的地名——芙蓉；18. 大伯公有没有老婆？19. 缅甸泼水节的来历；20. 暹罗泼水节的由来；21. 物以地名的特产；22. 宝物散珠的传说；23. 铁和珠的区别；24. 恶语的禁忌；25. 中国记载南洋最古的书；26. “钱”叫“王”的来历。

以这些篇章看来，从《南洋月报》第2卷第5期（1951年3月出版）至第2卷第11期（终刊号），总共9个月（9期）当中，他以“钱”为署名，一共发表了26篇小品文。这些作品全部都是简短的考据文章，其中与南洋文物、风土有关的文章占了大多数，可见他当时热衷于南洋文化、文物的研究，因此便写了26多篇类似“笔记”的掌故小品文。

也由此可以看出，薛钱白在50年代初期所写的文章，已经不属于文艺创作了，当然也不是新诗或时评，而是一些趣味性的小考据小品。这也难怪当他编《南余》副刊的时候，对掌故、考据文章情有独钟，那是不奇怪的事。同时，比起同时期的连士升、冯列山、谢松山、曾铁伏、曾心影、王仲广、杨守默（杏影）、郑梦周（晓寰）等位南洋的“同事”来，他写的不像他们的“大块文章”，而属于“小块文章”了。

我一连翻查了不少史料书籍，找不到薛钱白的著作，可见他老一生中并没有著作问世，这一点，又不像上述多位当年《南洋》的老同事的“著作等身”了。

看来，薛钱白是一位“编者”（编辑）而不是一位“作家”。

南洋文艺

星期三，六刊出

- 9 DEC 1998



1998年12月16日 ● 星期三

75周年
南洋商报
名编系列6



李向，原名张道防
(1935—1998)

追记

■ 李锦宗

李向

李

向于1969年，在新加坡对面的
乌敏岛敏江学校教书。进入第
3年时，突然觉得教不下去
了。

有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南洋商报文艺
副刊《青年文艺》编辑杏影，说明他的苦
衷，并请杏影介绍他到报馆去做事。

不久，李向接到杏影的回信，说明事情
已经谈妥，可以在9月中上班。①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向开始在南洋商
报服务。

李向天生有点口吃。他虽自我控制得很
好，但教书要张口说话，不如拿笔顺畅。于
是，他选择了进入南洋商报当一个报人。②

介绍他进入南洋商报的杏影，他早在
1952年就认识了。在杏影的鼓励和帮助下，
他开始学习写作。最初杏影替他转交稿子给
副刊编者，文章很快得到发表。后来杏影编
《文风》时，又总是使他有发表稿子的

③

李向最初在南洋商报当电讯翻译，过后
改任“本坡新闻”助理。

1970年2月1日，他继完颜翰之后，兼
编《文艺》和《青年园地》。当时，他已经
是电讯组编辑。

他编的《文艺》和《青年园地》，在新
马同时见报，因此容纳新马写作人的作品。

《文艺》的水平较高。在这个副刊发表
作品的新加坡写作人包括杨刚、陈君、林
理、吴伟才（吴韦材）、陈纶新、风沙雁、
谢清……。在这个副刊出现的马来西亚写作
人包括笔仗、看看、北蓝岭、杜文凤、温任
平……。

不久，《文艺》和《青年园地》合并成
为一个文艺副刊，恢复杏影时代的名称《青
年文艺》。④

1971年8月3日，李向在《青年文艺》
开辟了“战前马来诗歌欣赏”的专栏，令人
惊喜。听说这个专栏受到不少作者和读者的

欢迎。李向在“编者识”中指出：“本刊自本期起将有系统地介绍战前马华诗歌作品。先从抗战时期的诗作介绍起是因为这一个时期是战前也是战时马华诗运最丰收的一个时期。这些前辈们的作品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受到吉影提拔的李向，无论在写作和编辑副刊方面，深受他的恩师的影响。因此，他编的文艺副刊，除了拥有自己的风格之外，兼具吉影的作风。

我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李向，不过，我不是由于投稿的关系才认识他，我似乎不曾在他编的文艺副刊发表作品。

我是在吉隆坡，在几个文友的聚会上跟他见面。后来，他几度来吉隆坡，大多欢聚在一起，因此逐渐熟络起来。

有时到新加坡去，经常跟他会面，漫谈文坛内外的事情，例如吉影和郁达夫等人的点点滴滴。

我当时已经开始收集新马文学资料。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也不忘搜集资料的工作。

我记得有一次，为了补充“南洋商报丛书”的资料，他热心地带我去南洋商报的资料室，让我进行补遗的工作。出乎意料之外，资料室内竟然没有完整的“南洋商报丛书”，令我大失所望。他也表示无可奈何。

当时，他正在搜集吉影写给新马写作人的信件，以便收集成书，来纪念他敬爱的吉影。我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那些曾经投稿给吉影的写作人，但是成绩不理想，因为他们大多没有收存这些信件，实在可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几年前由林端完成了。

1976年初，李向约我写《1975年的马华文坛》，4月10日刊于综合刊物《知识天地》（革新号第一期）。我猜想他可能跟这份刊物的编务有关。

后来，李向改编南洋商报的《旅游与名胜》，接着负责《生活》版的编务。

他把《生活》编得甚有特色，趣味盎

然，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他开了几个小栏，例如：“生活点滴”、“真实故事”、“我住的地方”、“鬼的故事”和“生活漫步”。其中的“生活点滴”和“鬼的故事”最受欢迎。“生活点滴”每期刊出几则几百字的小块文章，短小精悍，内容生活化、充实，有的写得很有哲理。“鬼的故事”内容诡异，引人入胜。

李向升任执行编辑兼副刊主任以后就不再编副刊了。他的工作越来越忙碌，作品愈来愈少。他也少来吉隆坡，而我甚少前往新加坡，因此，有一段时期，各忙各的，最少有十多年没有见面。

直到“花踪”举行颁奖仪式，他受邀前来观礼，我和他才重逢。在时间的冲淡下，恍若隔世。在人来人往的场合上，我和他只能闲聊过去的生活经历。

前几年，我陪中国作家徐西翔去新加坡出席微型小说研讨会，偶遇李向，惊喜不已。不过，在聆听演讲的场所，我和他只能闲谈几句话而已。由于行色匆匆，没有再跟他联系。想不到这次的见面竟然是最后一次的会面！

注：

①李向：《苍蝇集》（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3年12月），页100。

②林晓：《还来到访时——追思李向》，新加坡联合晚报《文艺》，1998年3月22日。

③李向：《苍蝇集》，页98。

④启影于1960年7月20日开始编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直到1967年2月6日停刊为止。总共编了7百31期。

16 DEC 1993

李向的生平与著作

■ 黄梅雨

李向，又署墨卷、任宁、主艾、李横、文提凡、李如哈，本名张道勤，原籍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清塘，1935年9月21日生于新加坡一个中等家庭。

他的父母都是教师，也都是基督教徒，因此，他从小信奉基督教，中学时代才放弃宗教的信仰。

在他入学年龄时，日军侵占马来亚，他只好在3年8个月内读日文，不过，在家里，母亲教他华文。

光复后，他在公教中学附小念四年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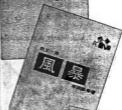
1954年底，他在公教中学高中毕业。

1955年，他加入新加坡师训学院全日制文凭班。

1956年底成为合格教师后，他并没有到学校教书，反而进入星洲日报当翻译，不过半年后辞职，前往乌敏岛敏江学校执教。

1959年9月，他进入南洋商报担任电讯翻译。以后的职务时有变动，他先后当过新闻助编、电讯编辑、执行编辑、副刊主任。过后，他曾任联合早报副总编辑、联合晚报副总编辑、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华文新闻研究部主任。直到1995年退休。

1998年2月18日因患癌症去世，终年62岁。



他在高中时代就开始学习写作，作品刊于《南洋少年》（许云樵、杜连进编）和《马来亚少年》（南洋书局出版）等等报刊。

在他中学毕业前后，跟范石和林建等人合办文艺刊物《人间》。

在新加坡师训学院时，他是《学生年刊》编委之一。

他的作品主要是散文，特别是杂文，散见于文艺刊物《人间》、《新报》、文艺副刊《世纪路》（姚素编）、《文风》（李彭编）、《青年文艺》（李彭编）……。

著作

(1)《在路上》，1956年1月由新加坡生活出版社出版。

(2)《苍蝇集》，1972年4月由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3)《寒相小品》，1975年10月由洪炉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编著

(1)《查米》——“文风丛书”小说一集，1972年12月由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2)《风暴》——“文风丛书”散文一集，1973年4月由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3)《批判（苍蝇集）》，1973年6月由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4)《煎煎》——“文风丛书”小说二集，1973年11月由万里文化企业公司出版。

(5)《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1982年3月1日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16 DEC 1998



李向(右)及其编著
(书影及照片提供/李健宗)

南洋文艺

16 DEC 1998

星期三，六刊出

1998年12月23日 ● 星期三



谢克，原名余克泉
(1931--)

谢克

的淡静敦厚

■ 唐林

南洋文艺

星期三，六刊出

23-DEC 1998

谢克是当代著名新华作家。曾经主编南洋商报文艺版（新年代）。

我在50年代中期就知道作家谢克这个名字，却在90年代初期才有机会认识谢克本人。

是所谓缘吧，1992年7月某一天，谢克担任第5届“乡青小说奖”评审，由新加坡乘飞机来吉隆坡，“乡青小说奖”工委中认识谢克的碧澄和李亿蕾临时无法到机场去接他，叫我代替。因为我未有见过谢克，碧澄便提醒我：“谢克个子瘦小，很容易认的。”于是我便到梳邦苏丹阿兹兰沙国际机场等待谢克。出乎意料，谢克一出现就向我举手招呼，原来我和他根本不必经过任何介绍，已经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依此看，我和谢克早在50年代便有另一类神交了。当时他经常在报章上发表小说，我则只偶尔以唐之一名字在《文风》刊登短诗。由于马华文学刚刚开始启蒙萌芽，文坛上充斥着对中国文学马首是瞻的侨民文学或跟尾巴溜调，我对于谢克或像谢克这样勤于创作的青年作家，既是羡慕，也很敬佩。

然而，羡慕归羡慕，敬佩寻敬佩，时间



(书影提供/周锦雄)

23 DEC 1998

毕竟摧毁了一切，原本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混在一起的华文侨民文学，终于蜕化出马来
半岛包含沙巴及砂朥越的马来西亚华文学
和仅限于新加坡岛的新加坡华文学。地域
和政治在奠基两个不同的独立自主个体，华
文作家也随着国籍地域分成马华和新华作
家。谢克是新加坡人，自然当然是新华作家
了。

我国自从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
以后，开始和新加坡逐渐疏离。1963年9月
16日组成马来西亚后，新加坡又回归这个国
家。可是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脱离马
来西亚而独立，形势就完全改变。不过，这
期间南洋商报等主要华文报章及一些文艺刊
物，仍然继续在新加坡出版。50年代便由杏
影先生主编的南洋商报文艺版《文风》，直
到1967年中杏影先生逝世以后，梁民广先生
接手主持，《文风》还是新马的马来文学发
表作品的一个主要园地，后来谢克继任时易
名《新年代》，情形还是一样。

70年代，马新两国的分歧愈是深广，南
洋商报文艺版已经设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
个不同园地。谢克编的《新年代》归于新加
坡，却照样刊载马华作家的创作。我国已故
作家韦翠和马夫之的小说和散文，资深诗人
郁人的诗，青年作家李亿善的小说，经常都
在《新年代》发表。谢克相信文学创作可以
跨越国界，一方面可以相互观摩，一方面能
够引起共鸣。

谢克专长的是小说，并且以小说家而成
为文艺版编辑。谢克的小说背景多数是大时
代的缺憾，反映都市百姓的种种哀乐。淡泊
宁静的叙述，敦厚无怨的诉说；没有50及60
年代那类狭仄的一窝蜂叫嚣，也没有自诩是
世纪幻想者导师的盲目膨胀。他这种风格遭
受到当时那班自命是文学主流的跟尾巴伟人

嘲斥，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因此，连他编的《新年代》也保持这种格调。稳重但不媚俗，不标榜自己，只是孜孜不倦的默默栽培秧田，为丰饶文学园圃而浇水施肥。

我认识谢克本人时，谢克已经是一个媒体人士，但他却不安于闲适，依然活跃于文学界；除了关注新加坡华文文坛动态，也关注各地域国家华文文学的演变，谢克从不讳言退休前和退休后个人生活上有过时空移位的调整，深切体验到作家比市井小民更热衷于追逐名利的现实。谢克的感触，大概只有元朝诗人刘因的诗形容得贴切：“纪录纷纷已失真，誓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

1993年，谢克嘱我代购买绿原等胡风朋友回忆胡风事件的书。当我带书给他时，一起对茶闲聊。我说：

“当年胡风受冤枉下狱，全世界都知道是本世纪又一次悲惨的文字狱，新加坡偏有一些跟尾巴伟人隔雨表演落井下石的丑剧，你当时有没有注意这些？”

他不假思索的答：“有。”

“但是，你为什么保持沉默？”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能够有份量吗？”

我明白谢克所指的“份量”，才想再开口，他已经非常平静的说：“法是是非，今天已经非常清楚明白。”

我忽然想起胡风逝世后，他的好朋友聂绀弩写的悼亡诗句：“百年大狱千夫指，一片孤城万仞山。”

看着眼前也搞文学史的谢克，书来笔下的文学史，会不会保留当年那班落井下石英雄的漂亮嘴脸？

23 DEC 1993

曹操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谢克喝的是咖啡加糖，我唱的是茶加淡奶和糖；咖啡“乌”和茶“西”，算不算可以当歌？能不能抵回？果然是“存在的只有生命，生生不已的生命，时间算不了什么，变化算不了什么”？

认识谢克之前，我以为谢克懦弱，不敢抗拒那股横行华文文坛的跟尾巴恶液；认识谢克以后，我才体会到这原来就是谢克的涵养敦厚。

22-11-1998 山打根

谢克小说年表

整理/周福梅

1. 《为了下一代》1954，汀兰出版
2. 《困城》1955，南大书局
3. 《新加坡小景》1959，青年书局
4. 《学成归来》1962，群鸟出版社



23 DEC 1998

57

1998年12月30日 星期三



彭松涛，原名彭乔松
(1916-1996)

75周年
南洋商报
名编系列 8

南洋文艺

星期三，六刊出

30 DEC 1998

永不言倦的 彭松涛先生

■馬崙

彭

松涛先生不仅于1947年受聘主编当年最受欢迎的《南洋商报》综合性副刊《商余》，而且于1959年离开新加坡前来吉隆坡创办日新印务馆，承印《马来亚通报》、《学生邮报》、《雷报》和《大马新闻》，开创50年代末吉隆坡兴办小型报的新风气，乃当年报坛中心人物之一。

这位著名报人，屹立在新、马文化界逾半世纪，他不单“撰”优则“编”、“编”优则“创”，而且善于伺隙而动，打破成例、因地(或时)制宜、吐故纳新。据悉，今日的大马知名报人，有多位还直接受过彭松涛先生的培植或提携呢！

写作人挤满办公室

为了搜集有关新、马写作人和作家及报人等的生平史料与相片，早自出版拙编著《马华写作人剪影》之后(约自1979年)，我便在文友引荐之下拜会了早在50年代中就已著名的名编彭松涛先生。

那些年头，学人拜谒吾、报人彭松涛等先生的藏书，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以及多家书店，都是我每月常赴新三两次寻求资料的最佳对象去处。尤其是彭老先生的办公室，位于星河书城百胜楼(巴斯哥波大厦)对面余街附近的一个楼房里，是强人墨客逛书局之后最方便停歇和晤文友的地带。

在几近16年间，我在彭老的办公室，认识或见过的报界及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少说也有50位，包括黄国良、陈建基、陈名宗、王球、沈炳光、黄任芳、谢白寒、谢森美、陈加昌、郑展志、李扬江、谢佐芝、林肇刚、梁君爽、何荣源、谭友利、王业香、林任君、田农、刘子政、陈田启、冰梅、黄婉秋、曹浩、李星可、李祥璋(白寒夫人)、邱高明、邱少华、林方……等先生女史；他们有的是从大陆或香港返新省亲作客，我有幸与他们识荆。

30 DEC 1998

彭老先生交游广阔，所以赠送给他的书刊甚多；那些作家编者亲笔签署的书藉，他尤其珍惜，我们只借来翻阅，偶尔借出外复印参考时，他总嘱咐得放回书架原处。

在老一輩的写作朋友当中，彭老该是我仅见的最热衷于拍照和悉心珍藏照片的一位。他把所拍摄的相片按次编排、写上说明文字及日期；他从不吝于送照片给影中人。

他具有报人寻根究底、穷源溯流和巨细靡遗的专注精神，加上他的藏书一应俱全，故此他写起专论的大块文章之际，旁征曲引，毫无困难或不便之处，令人心折！

那些年头，我狂热地到处探访与搜集写作者史料；我确实是个穷文人，为了买书添补资料，我经常是只吃两个叉烧包算是解决了午餐。

彭老获悉我在《扫槽》一书的打字工作方面碰到一些困难时，他常劝我“慢慢来，不用急”，又说：“太困难的事儿，才有机会让你和我来做；有利的和容易的工作，早就被别人抢去做啦！”有时候，他还会补上一句：“明知自己是傻子，为何还要不断做傻事？”

1988年5月间，我替新加坡丘邱氏公会主编的《新加坡丘邱氏公会庆祝30周年纪念特刊》出版了。这部文字稿长达256页的纪念特刊，由我执行编务工作，并提供2万余字的专文特写。彭老得先生是主编社团特刊的高手，他接过我草拟的上述丘邱氏公会纪念特刊，仔细地翻阅了20多分钟，然后微笑地赞了一句：“你们处理得真认真！”

“你们处理得真认真！是一部有东西好看的纪念刊物。”

老实说，要编妥一部理想的特刊，绝不是咄咄可办。而在这方面，彭老汇编印刷成书的特刊不计其数，他处理得才真认真哩！

不过话说回来，彭老过去是大报的总舵

主，历任总编辑、主笔，每周数次立下不易之论的时评家，如今在晚年时期，却以主编特刊为主业，是日常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谁不认为这是“大材小用”，而有几许的无奈！唯对于这么一位不愿取悦于世的前辈，我们自然格外敬重他。

熟知彭松涛先生的友人，无不知悉他擅长词令，出口成章，是担任司仪或代为致词的首选人材；可是，每当他的办公室高朋满座时刻，他总是热情地替客人倒茶递花生，鲜少高谈阔论，许多时候他微笑着坐着聆听友好闲聊天空、津津有味地清谈高论、嘘寒问暖。

彭老是好客的；我知道也最高兴我带当天的报纸送给他。要是你送几份当天不同的日报给他，他立时显得更加开心。他最爱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版的《南洋商报》，每回紧执着它都爱不释手似地仔细翻阅。

彭松涛先生曾经多次高扬着报纸对在座的朋友说：

“马者从柔佛州来，他送来的最佳礼物，就是报纸，因为他知道我到过吉隆坡和檳城办过报纸、编过报纸。”

生平事略

由于有太多的机会与彭松涛先生晤叙，我似未正式跟他老作个专访，只断断续续地听他回答别人的提问和偶尔与他的对话中获得：——

彭松涛，本名彭开松，1916年7月（农历）生于中国福建省晋江县，高中毕业后进入福建师范班，于1938年毕业于；他从福州转至永安（临时省会）居留，适值中国抗日战争演变到最危急的生死关头；他思前想后，遂毅然投身救亡工作，前往抗战洪炉的重庆，积极地参与抗战新闻宣传的活动。

30 DEC 1998

抗战胜利后，他选择到南洋来。

他抵达星洲时是1946年春天；初期在章德学校执教职，这间小学位于实兆律。他只教了1年书，翌年就有机缘进入报社服务。

原来饱读诗书、观察力敏锐的彭松涛，是以数篇言必有中、说理畅达的论文发表在南洋商报《星期论文》栏，而敲开了新马规模第一的华文日报——《南洋报社》的大门，光荣地于1947年受聘主编南洋商报唯一的综合性副刊《商余》版，同时兼写该报社论。

《商余》次任主编

在他之前，主编《商余》者是著名杂文家风人先生；该副刊创刊于1946年10月18日，首任主编是原名邱衡近的风人。继风人之后，曾编过《商余》副刊（指新加坡版）的计有：彭松涛、薛残白、查士升、李徵生、林秀、洪家谦、黎省吾、李维建等人。（详见拙著《新马华文作家群像》，页222（邱风人著〈华言集〉））。

彭松涛把《商余》副刊编得比邱风人所编的更为出色，而且写作群也倍增；前者更乐意挖掘新秀、培植新人，以壮大《商余》作者之阵容。这就难怪他的老同学（同在福建泉州全书）王原晏先生说：

“当时《商余》副刊在彭先生主持下吸引新马许多作家投稿。著名之《南洋丛书》十之八九即选自《商余》发表之文章。当代许多作家，即通过《商余》而成为名家。”

据彭老先生亲口告诉我：他从1947年至59年，在南洋商报社任职，唯其间即自1953年至54年曾到《中兴日报》任职，后又返回南洋报社服务。

30 DEC 1998

50年代末在吉隆坡

1959年，彭松涛离开新加坡南洋报社，前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创办印务馆，承印多种小型报，同时兼任华文《虎报》要闻版编辑，并撰写社论文章。

早在1950至53年，彭先生也曾与友人合创小型报《新力报》和《华声报》，轰动一时，为新加坡50年代小型报最繁盛时代，开辟了先河。

60年代初，他原想在吉隆坡大展鸿图，为创办华文报尽心尽力，然而1965年新马分家，他只好携眷返回狮岛，后来创办石叻报社，出版《石叻晚报》，后改为《石叻周报》，至1981年才停刊。

彭松涛先生曾说过，他主编《商余》副刊（约达4年）是他最愉快的一份工作。由于众多作家认真地写，言之有物、真知灼见、要言不烦，尤其是写杂文的作家，下笔得当，畅达幽默、嬉笑怒骂，妙趣横生，加上写作技巧圆熟。当时的名家如山东佬（卓凡）、康如也（即林连玉）、文怀朔、依藤……等人，都是《商余》版的常见作者，立论奇妙，字挟风霜。

主编是伯乐，当然有不少的千里马奔驰在当年的《商余》草地上。

写完社论回家哭母

80年代末叶，由于我是彭松涛先生办公室（称为书房也无不可吧）的常客，所以，有机会听他讲一些小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彭老“哭母”的小掌故。

身为一名报人，他克尽厥职，为了搜集资料下笔赶写社论，限时交稿，有时连患病或特别事故也得伏案疾书——病不得也！

有次，约莫是中午时分，彭老收到家书，原来那是一个噩讯——他敬爱的母亲仙逝了！家书传来这个悲喜讯息，他持信的双手正发抖着，真想放声痛哭一番，可是旋即想到今天必须交稿的社论尚未完成。

因此，他咬紧下嘴唇，冲到洗手间洗个脸，之后一声不响地继续构思赶完那篇有关中印战争的社论。

交上了文稿，又得等校过排版稿样后才能离开报社，赶回家已是夜晚时分，到了这时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闭门痛哭亡母……

你说，身为报人需具备多大的能耐，连哀痛亲娘也得使尽忍功哩！

彭老宿愿未遂

岁月不饶人，彭松寿先生到了古稀之年，仍然有不少的写作计划和出版计划，等着他去撰写、等着他筹款来印刷出版。

像他这么有理想、有抱负的老报人，必然活得不很开心。要是彭老跟其他报界人士一样，成功地把儿女养大成龙成凤之后就“登岸养老”的话，我想他老会生活得更快活些。

我思忖年迈文人多是两袖清风，左支右绌，谁能活得真正逍遥自在呢！

我知道彭老写过好多有关新华人物与文史研究的文章，曾多次资助他出版单行本，但他总是表示“慢慢来，先整理出版集体的东西；我个人的书可以慢慢出……”

于是，彭老似未留下一部个人著述的单行本，怎不令读者惋惜呢？

人生匆匆，岁月唯留。

呵！多少握笔人风云际会的彭老办公室，胜地不常，盛会(筵)难再！彭先生，请安息吧！

(1998年12月10日晨，可冬小稿)

30 DEC 1998

彭松涛的 社评及其他

■ 馬崙



■ 彭松涛（右）与马崙合影，1986（照片提供/马崙）

主 编过南洋商报《商余》副刊的4年的彭松涛先生，是公认的名编，他也是杰出的时评家和著名报人。虽然他曾出版过个人的属于某一文体的单行本，不过大家仍然承认他是位产量甚丰的报人。

彭氏对中国的近代史有深入的研究，而且曾经历过中国抗日战争活动，因此下笔常有精辟见解。早在1946年春抵达新加坡定居后，他常说：要是孙中山先生不来新加坡，他的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在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时，他撰述的一篇《新加坡与清末革命》的专论刊登于南洋商报，曾引起读者群的同感与赞赏。

必须补充的是，南洋报社于1950年创办《南方晚报》和《星期六》杂志，彭氏兼任这二家报刊的编辑委员兼写评论。从1950年至52年，他在中兴日报也兼写社评，每周2篇。他替《星期六》每周写3则短评，每则700字。根据性披露：在1950至52年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写评论，每周至少撰写6千字。后来，彭氏也替《展望》杂志撰写过每月一次的时评。

30 DEC 1998

那个年代，与彭松涛同时写南洋商报社论的其他5位时评家是曾心景、连士升、王仲广、陈履夏和谢松山。

由于马新分家，彭松涛即携眷迁回新加坡，创办石叻报社，出版《石叻晚报》，后改为《石叻周报》，直到1981年才停刊。他将这份报纸分装12巨册合订本，内载好多珍贵资讯，颇有收藏价值。

由彭松涛主编的第1部华文版《新加坡经济年鉴》，于1976年由石叻报社印行，每卷16开本，厚达五百多页，颇受国内外读者或学人欢迎。

80年代初，彭氏感慨这一代的青年人对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任务的重要性，故此，他乐意为新加坡同济医院、晋江会馆和安溪会馆等编纂特刊。在他主持之下的社团和多系特刊，不单是应时纪念刊物，且成为重要史料专著，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从1981年开始，彭松涛耗费的3、4年时光主编《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此乃他从事报业40余年经验的结晶。他主持的文献出版公司印行这部厚达1千700页的专著，诚系新加坡文化上一大贡献。

此后，彭松涛还有一连串关于东南亚珍贵史料的出版计划，将在《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出版之后陆续推出问世；例如他所预告的《新加坡系年史》、《新加坡先贤传略》、《马来亚华侨与清末革命》、《环球华族家乡团体大观》、《千年古乐南音的发扬》、《新加坡艺坛缤纷录》……等8部著述，随着他不幸于1996年9月14日辞世，今后是否会出现有心人替他出版上述专著，我们企盼有奇迹出现——我期待着！

30 DEC 1998

- 9 OCT 1999

80年 马华文学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一向被文学史家视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从侨民的文学、到南洋的文艺、到国家文学的悬而未决……在多少文学工作者的血汗泪影中，一晃，时间已经来到了1999年，10月。——马华文学，在崎岖的行道上跨过了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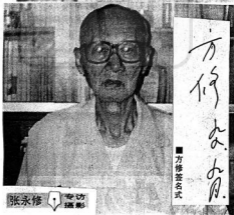
80年的文学史，有多少疑惑已经封尘？有多少迷思仍在继续？有多少玉石未被鉴别？在马华文学庆祝80大寿之际、在世界迈向21世纪之前，《南洋文艺》今起推出“80年马华文学”系列，访问不同年龄层与关注面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向不同时期的历史。



马华 文学史 整理

- 9 OCT 1999

第一人



方修签名式

■方修签名式

张永修



专访
摄影



方修简介

方修，原名吴之光，1922年生，新加坡人，祖籍广东潮安。从零散的文学史料中整理出马华新文学的轮廓，方修是第一人。他编著等身，计有：《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史稿》、《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马文学史论集》、《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等。

“我是提倡现实主义精神的。”

不管那个作品是以什么手法来表达，

只要能反映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它可以让你看出一个时代的侧影，

并且关心人民关心生活关心社会

——那就是好作品。”

- 9 OCT 1999

9月

14日，我依时抵达新加坡马里士他路大众大厦5楼方修住宅。那是一间客厅很宽敞的组屋。靠露台的一角有张书桌，那是方修看书写作的地方。而书，几乎摆满了两面墙。通往卧室的走廊上也是一排书架，睡房墙壁也尽是书。

77岁的方修，看起来很健朗，脸色红润，行动自如，说话中气十足。他说他的脚没有力，很少出门远行。目前与妻子、孩子住在一起。

我们很快进入正题。首先我问这位从事马华史料工作的长者，如果能够重写马华文学史，他是否还会延续他战后的划分法呢？

“轮廓还是不变，”方修如是说：“如果改变的话，以前的划分法就要推翻掉，整个重写，工程更大。不过在作品方面，我会将新发现的加进去，那些内容比较没有深度，我比较不满意的，会去掉。”

方修将战前马华新文学史分为：萌芽期(1919-1924)、扩展期(1925-1931)、低潮期(1932-1936)、繁盛期(1937-1945)。战后则分为：战后初期(1945年8月-1948年6月)、紧急状态初期(1948年6月-1953年9月)、反黄运动时期(1953年9月-1956年年底)、新马独立前夕(1957年初-1975年年底)。为什么方修会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期法划分战前战后呢？

“大体上，战后文学的发展起伏没有战前的明显，不过战后反映历史事件的划分法比较容易掌握。”方修得调逻辑，说：“在我看来，这样的分法，比较方便，而且我也想不到有明显的、更好的方法可以取代。我就是按照那时文艺发展的起伏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分出几个时期。”



- 9 OCT 1999

弥补遗漏

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但是在上海，却出现了大量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言情三角小说。早年的马华文学也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除了现实主义的作品之外，其他主义的支流里会不会也有一些好作品出现？方修在整理大系的时候，会不会将那些因没有反映当时的历史事件的好作品，排除在文学史门外？

“在战前是没有这样的现象，战后的分法就有以上的缺点存在。”方修点了根烟，说：“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将那些历史感不强的好作品放到另外一章去。也是按照同样的划分方法来分，并列两个时期出现的其他文学流派。”

方修对马华文学史料整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马华新文学史稿等都是大马中学、大学马华文学课里的必备参考书。近十几年来，有人认为方修的史料整理，比较注重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忽略了现实主义以外其他文学风格的作品，因此对于那个年代的文学面貌的反映并不全面。对这样的指摘，方修怎么说呢？

“战前，现实主义是主流，其他主义的作品微乎其微。”他说，那时的生活困难，作家要反映的是现实生活里的疾苦，没有闲情慢慢的研究写作技巧。方修表示，即使是提倡象征主义的曾圣强的弟弟曾华了，早期文字幽默，但是当生活逐渐逼人，他后来的作品也转向了现实主义，写出《五兄弟墓》这样反映时代现象的作品。

抗战时期，方修认为是马华文学最兴盛的时期。那时作者最多，作品最多，水平也是战前那个时代最好的。报刊也比任何时期都热闹。在这个期间，文学肩负着抗战救亡的任务，作品能及时反映一些事情，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来，作家会不会因此而忽略掉技巧？

“那时候，就有‘差不多’的现象出现：作品写出来，倾向差不多、故事差不多，不够深度，因此常被批评。不过，”方修强调：“当然也有写得很好的。”

现代派与闲适派

马来西亚独立后 20 年间的文学史，方修把它划分

- 9 OCT 1999



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方修的“六十年代”是指 1957-1966，即反黄运动退潮期；“七十年代”则是把上下限界定在 1967-1976。新马是 1965 年分家，为什么方修的年限会断自 1967，而不是 1965？

据方修说，虽然新加坡在 1963 年脱离大马宣告独立，但是当时大马的报章还是在新加坡印刷，两地的作者还是把作品寄到厂址设在新加坡的报馆去。当时，在文学上新马还是一体的。要到了 1966 年之后大马才积极发展报业，文学上才慢慢的独立起

来。

而创刊于 1955 年，在六、七十年代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大本营的《蕉风》，在方修整理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文学史里，是占着怎样的位置呢？

方修的回答是：“《蕉风》月刊我看得不多。那时《蕉风》在吉隆坡印刷，我有时买得到有时买不到。”

那么，在 1960、69 年以军事突起之势一反现实主义主流的现代主义大将克那赫和欧玲奴，方修从史的角度是如何给他们定位呢？

“我的文学史没有写到这个时期。”方修说：“这个时期以后，这些人当然也是文学史上的人物。当时现代主义的小说并不突出，不过现代诗的表现最显著。”

依据方修的说法，60年代末，除了反现实主义的作品和现代主义作品，还有一种“闲适”流派，即没有时代感、不激情，也不现代，只写一些小场面、温和的、小市民的小故事，代表作家有陶荫、耽铃、马汉、罗平、雅波等。

在方修的眼中，怎样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我是提倡现实主义精神的。不管那个作品是以什么手法来表达，只要能反映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它可以让你看出一个时代的侧影，并且关心人民生活关心社会——那就是好作品。”

马华文学的独特性

1934年，皮名提出“马来亚文艺”的口号来抗衡“上海才有文艺”和“去上海登龙”的自卑、媚外心理。今天马华作家是不是还有类似以上现象的心理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大家都认为能够在上海、台北……发表文章，身价就高了一些。”方修说：“实际上那边的水平也比我们这里高一些。不过没有到外边发表文章的作者不一定水准就不高。当时在上海发表的机会也不多，被刊登出来多少带有一点鼓励的性质。”方修说他的工作集中在七十年代，或更早的时期，对当前的现象，他表示不清楚。

——1947年，凌佐在《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呼吁：“不要把马华文艺当作中国文艺或侨民文艺，不要把马来亚看成香港或‘租界’。”九十年代初，某些日本学者反而不如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作者有见识，竟然把马华文学当成是“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方修怎么看待战后/今天的马华文学的独特性？除了题材方面，在语言上和中国的有没有什么分别？

“如果作家将本地词汇操练得比较高明，成为艺术（语言）的话，就能显现出特色。”方修的看法是：“一般上的语汇，停留在日常吉祥如‘巴刹’、‘巴刹吗兰’等，表面的特色让人一看，也可以分出和中国的不同。”

- 9 OCT 1999

提炼本地词汇成为艺术语言不是马华作家的共同倾向，反而是很多人很直接的就把中国古诗词中的意象、语言搬来用，而不是很革它的养分再创造。太执著/拘束于中国的语言意象，会不会妨碍我们创造出有本地色彩、自己的语言呢？

“我的看法是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淡，能够使用古典文字的人也会越来越少。”方修认为这只是一时过渡时期。而且方修认为“马华文学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过后他补充说：“五、六十年代，受影响的比较明显，到后来八、九十年代，你说，有几个买中国的书看？最近听说本地区（新加坡）新开了一两家特大型，侧重卖台湾书的书局大事扩充营业，生意都不错，看来台湾书的销路几乎比中国书还要好。这自然是凭印象随意说说的，并非中国书的市场真的如此不济。但台湾书的销数确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方修认为马华文学受台湾的影响反而更大。

二十年代末，新国民日报《筑岛》编辑张金燕（1901—1981）已经用崎岖的文字，表达了理应不属于他那个时代认知范畴里的感性，他写道：“黄河泥色的活水，又虽未浸染过，但我皮肤遗传着祖宗的旧衣裳，而黄姜、咖喱，把我的肠胃腌渍了，因此我对于南洋的色彩浓厚过祖宗的圣经，故都蒙多过大禹治下的水了。”当年的“南洋色彩”之议，在七十多年后却似乎变相成今日方兴未艾的“断奶”之争。方修也注意到大马“断奶”论争事件。然而，方修的反应是：“依我看这些人多多少少有‘恐共病’，他们以为中国的书刊都充满共产意识。现在很多中国书都和共产意识没有关系，如《废都》大写性爱行为，《妻妾成群》描写地主小老婆争风吃醋之类故事，实质上与港台本地产品没有太大差距，‘断奶’不‘断奶’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 9 OCT 1999



■铁亢 (1913-1941)

不会输给“100强”

方 佛所涉猎的马华文学里，有哪些可以符合他心目中的“经典”要求？

“如果有人将铁亢（即铁抗，1913-1941）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筛选出一本小说集，肯定有代表性，而且不会比香港‘100强’里的一些小说差。可惜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出版工作。铁亢只出过薄薄的一本《白蚁》，字数不多，却是很精练的作品。铁亢的作品在抗战前后，比一般当时的作家有深度。”

铁亢原名郑卓群，祖籍广东揭阳，曾任编辑和校长。日本南侵的时候他从邦咯岛逃到新加坡，当时日军设岗检查抗日分子，通过检查的人衣服背后会被盖个印，以示“清白”。根据方佛说，铁亢是个有洁癖的人，本来已经可以平安过关，但是他拒绝日军在其衣服背后盖印，而是要求把印盖在手巾上，此举止触怒日军，使他平白丢了性命。遇害那年，仅28岁。铁亢其他小说有：《试炼时代》、《运输兵阿那信一》、《在动荡中》、《洋娃娃》、《义妻》、《山花》等。

方惟认为香港某杂志选的“100强”的小说，有些是纪念性质的，有些是流行的，不是都好。而且当年马华文学作品流传不广，港台大陆难得看到。反观港台大陆的书，发行非常广，能看到的读者，相应就多了。

此外，方惟也推荐写过《八九百个》、《柬埔寨工》、《牺牲者的治疗》的殷枝阳（乳壁）。日本人曾翻译过殷枝阳的几篇小说。

“六、七十年代，韦曼的作品良莠不齐，如果重质不重量的精选出一本，还是可以列为‘有代表性’的，不比‘100强’中某些作品逊色。”

- 9 OCT 1999



南洋副刊

1999年10月12日 ● 星期二

南洋商报

缩微 胶卷



看过去

——就都达夫留下的问题
访杨松年

12 OCT 1999

林春美  专访
摄影



杨松年简介

杨松年，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汉学中心副主任，并著有《新马华

文文学论集》、《战前新马文艺副刊析论》、《新马早期作家研究》、《南洋商报文学副刊（舆论）研究》等。



1939年初，檳城青年为南来不久的郁达夫设了一个欢迎宴，尔后，郁达夫把在宴会上回答檳城青年的几个提问整理成文字，同时发表于檳城与新加坡。不一二日，报章上开始出现对他的言论的第一个反应。之后，反驳郁达夫的文章和郁达夫本身的再反驳一篇接一篇的涌现，一场论争由此开展。这就是日后新马文学史家所谓的“郁达夫《几个问题》引起的论争”。

60年过去了。可是60年前的“几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却还是有重新思考的需要。这个访谈试图从半个多世纪前我的家乡青年的疑惑中寻思今日新马文学的一些问题，当中一些设问是在郁达夫的有关回答的基础上延伸发展出来的——提问的不再是当年的那一群激情热血，却依然是来自檳城的青年；回答的不是南来的浪漫作家郁达夫，而是立足于新加坡的严肃学人杨松年。

关于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的关系

30年代中，一些作家对南洋文艺界过于推崇中国，以致过度搬取中国言论的现象开始存有相当的疑惑。郁达夫南来之际，不少作者都多少奢望这位中国新文学大家能够为本地文坛指点迷津。可是，郁达夫并不了解南洋在地者在面对两地文化冲突时的复杂敏感的心理，他从一个纯粹的文学创作者的角度，表示既然同用中文写作，那么以中国的论题自然亦无不可，问题仅在于所提出的题目值得不值得讨论，讨论的态度真率不真率而已。如此一般性的答复令文艺界大为不满。

杨松年先生认为，至二十年代中叶为止，由于新马文化非常贫弱，对于传播至此的中国强势文化根本不会想到是“搬取”抑或“吸取”的问题。可是当本地文学在二十年代末开始操作、三十年代逐渐建立一定基础时，搬取中国文学理论或口号为恰当与否的问题，就自然开始为本地作者所关怀与思虑。他指出，一个强势的文学理论传播到一个较弱势的地方时，其引介的方式若没有照顾到当地实际情况，势必会引起有关地区的反抗；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马当时若没有得到中国文学理论的滋养，本身的文学也无法发展起来。新马文学的发展除了从言论的传播搬取文学理论的滋养之外，一些外来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与协助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就目前情况而言，新马的文学创作风气虽然兴盛，但是比之于中、台，则我们在理论的建设与创作的成就方面，似乎还是有待努力的。杨先生说，在这个时期，大家应该怀抱怎样的心态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一方面，引进者必须照顾到本地的情况；另一方面，本地文学界也应该以宽大的胸襟对待外面能够汲取的滋养。回顾新马的历史，我们就是在一直不断吸取滋养下成长的。

马华文学在整个文学源流中是属于华文的源流。在二、三十年代，文学主要发达的地区是上海和北京，其他如香港与台湾等地的文学在发展中可能走在新马的前头，但都同是在受影响的地区，彼此交叉的影响不大。那时中国作为一个主体的影响很大，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已大不相同。今天，我们在滋养的汲取方面不再是以中国为唯一的对象；杨先生提议，我们在滋养的汲取上不妨可以多元化，而在多元化中难免的主次之分则可视我们目前的需要而论。另外，滋养汲取的多元化不仅指在空间方面向各个地方的文学与理论借鉴，也指在时间方面于古典与现代之间上下求索。

相对于强势的中国文学，我们这些地处“边缘”的小国文学是否就注定只能成为大树的旁支？杨先生认为，地区或边缘，只是在于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的问题。在新马，我们有自己的传统与文化。从同处着眼，她跟一般性的中华文化有其共同点，向异处看，她亦有其独特性；如此的一般性与独特性在这样的时空的结合，所形成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杨先生神色坚定，说道：“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华族的文化，我们就是从过去的路子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我们把我们的文化跟别人相比的话，是的，我们承认有一些地方我们不如人家，但不如人家这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外面的文化。我觉得我们应该吸收人家，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某某一种文化的附庸。”

问及他一些中国中心论者把新马华文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支流的想法，杨先生说，从过去新马文学的发展看，他同意中国文学对故新马文学的影响极大，当时参与耕耘的多是南来的作者，要说这是过去我们的文学的特色，当然也可算是一个特色；要说这个特色让当时新马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支流，我们总很难强加否认，因为它们确实有很多相近之处。”但是经

12 OCT 1993

南·洋·文·艺

南洋商报

过战后的这段时间，我们这里的政治社会状况、人民以至知识分子的心态、以及整个文化环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所关心的问题这里可能也会关心，但已并不一定是这里主要的问题。如果把战前的日子与四、五十年代走过的日子一比较，我们显然会发现，我们自己的道路已经开始慢慢形成了——杨先生想了一想，很快的更正：“不，我应该说，我们的路子是很迅速的形成了。所以我绝对不承认新马现代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环。”

最近白光勇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曾经提到，只要是用中国文字进行创作的，都可以被列为中国作家。我就这个问题请教杨先生。杨先生说，“中国”这个名称如若抽离其政治内涵，仅仅指涉“中华”或“华人”的意思，那么对于这个称谓他可能可以接受。然而，实际上，“中国”这个名称有它自己相当政治化的性格；尽管“中国作家”在概念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称谓。杨先生接着补充道，曾经有一个日本学者根据地区把华文文学分类为“中国文学”与“海外文学”，前者包括中国大陆与港澳，后者则涵盖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杨先生本人并不认同这样的分类，据他的看法，“中国文学”与“美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等世界各个地区的华文文学，是应该放在一个平行的地位上来处理的。

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地方性的建设

新马华文文学是否非得有“地方性”方能成就她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特殊性”呢？杨先生认为，文学作品的好坏，绝不是取决于其中有没有表现特定地方色彩的题材，而是在于作者是否能掌握更好的写作手法，或吸取其他文学的滋养好好的进行创作。他说，这并不意味着鼓励作者不写本地题材；新马的作者在手握本地题材方面占了一定的优势，他们如果写出一些对外人而言新奇的特殊事物，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这只是作品为人接受的辅助性条件而已。地方色彩不是保证成功作品的标签，更重要的还是作者有没有写出好的作品来。

关于如何建设新马文学的地方性问题，当年郁达夫在回答檳城青年时说：“根本问题，我以为只在于人，只在于作家的出现。南洋若能产生出一位大作家来，以南洋为中心的作品，一时能好好的写它十部百部，则南洋文艺，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艺，自然会得成立。”杨先生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支持郁达夫的。他说，只要本地出现杰出的作家，写出优秀的作品，那作品若具备本地特色，并因此为世界所赞赏，那当然是好事；但是就算作品没有本地特色，只要写得好，也是一件好事——反正这些都是本地的东西。

如何界定一个作者或作品是“本地的”的问题，是处理早期马华文学史的工作者必然会面对的难题。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依然不减其复杂性：一些作者在新马成长，但是其文学生命却是始于他方；或者一些作者在其他较强势的文学地区得到承认与肯定，他未必需要强调其“马华”或“新华”身份，而是可以很自豪的把自己定位为“世界作家”……类似的神祕问题，处理一地城文学史的学者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杨先生认为，在交通与资讯发达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已大大缩小，一个作者可以今天在这里写作，明天在那里发表作品，其活动的空间相对变大了。一个作者如果自命世界作家或者不愿接受一个地区的局限，那是他的自由；以针对个别作者所做的研究来说，若仅把该作者套之于国一地，恐怕也无法突显他的特色或成绩。治理一地城的文学，则是另一个问题。在杨先生本身的研究里，他首先对所治理的新马文学作一个界定，划出哪一些是跟新马有关、或对新马有所贡献的作者。在这种前提之下处理某一些跨越多个国度，但毕竟曾对新马文学做出贡献的作者，杨先生说：“如果不把他们列入新马，我会感觉对他们不起。”在杨先生而言，当牵涉到新马文学的某个时期，而这个时期正好是有关作者在此地活跃时段的话，文学史家不须因为该作者日后的创作空间已经离开新马就不去理他。他后来不在新马活动，这一点我们可以提；甚至他离开新马以后所发表的作品如何、在其他国度有什么成就、得到怎样的肯定，文学史家也应该交代这一笔，因为这样才能给一个作者比较完整的评介。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工作的话，一个文学史家一方面可以在治理自己的文学，另一方面也同时照顾到了特定作者的世界性层面的问题。而如果那个作家在比如台湾方面也有所贡献，杨先生说：“我不反对将来台湾文学史把他划为台湾作家，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事情。”

12 OCT 1999

马华文学



与 现代主义

现代诗的出现、现代小说对文字与技巧的重视、域外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可说是丰富了马华文学的“文庫”，不满足于“现实主义”教条化文本的读者也有了多一种选择，不认同文字可以透明地再现内外在世界的作者也有所借镜。

19 OCT 1999

张永修 专访
张锦忠 笔谈

19 OCT 1999

张锦忠简介

张锦忠笔名有张瑞星、张爱伦，1966年出生于彭亨，现为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曾任《学报》、《蕉风》编辑，著有诗集《张瑞星诗抄：眼前的诗》、小说集《白鸟之幻》、博士论文《文学影响与文学复系统之兴起》等。



问：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主流”，可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阵营却也着实出现了一些不可忽略的人物。你认为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史中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

答：说“现实主义”文学是“马华文坛”或“马华文学系统”的“正统”或“主流”，其实只是部份真理。严格说来，什么是“马华文坛”或“马华文学系统”，还有待厘清。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立国前的马华书写，显然属于（英国）殖民时期文学，大部份还是 *pre-literature* “前文学”，虽然其中不乏佳作，当时文艺界也发生过南洋色彩运动与本土意识论争。这个时期的作品，今天已是珍贵的社会文献，是否“现实主义”或“主流”，已不是太重要的事了。话说回来，当年的报纸及副刊既已残缺不全，或尚待重新整理，我们只能依赖方修等人的大系或选集。由于编者个人的文学观，集中选辑的，几乎皆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产物。但这不表示当时就没有其他的非主流的东西，只是方编不录，或斥之为颓废、灰黄罢了。既然史前史待考，我们只好从较有信史的独立建国时期讲起。

当我说“集中选辑”的，几乎皆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产物”时，似乎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其实未必。到底什么是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之别，只是译名不同而已吗？事实上，马华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其来有自（上承中国“新兴文学”，而非欧洲文学的写实主义传统），应称为“社会写实主义”，因为其主张偏重文学的社会效用，过份强调文艺反映外在社会现实生活。独立建国以来，马华“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色彩，因现实政治压力，时隐时现，时强时弱。

至于“马华文坛”，这个运作系统其实是这样建制起来的：报纸副刊（主要是《南洋》与《星洲》两大报）、文艺刊物、出版社、文艺社团、华文学会、书店、高等教育或学术研究机构、文学奖等，加上写作者、编者、批评家与作品。引领风骚、带动风潮的自然是报纸副刊及其编者，因为华文报发行量大，是华社读者每天都看到的东西，虽然文艺副刊并不是天天见报。因此，我们大可做点实证检视，看看独立建国以来两大报的副刊编者路线如何如何，从而了解“现实主义”文学是否一直是“马华文坛”的“正统”或“主流”，或者除了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的二分法外，是否还有第三或第四种文学路线？易言之，把“现实主义”当做一张大伞，以之笼罩现代风格外的一切马华书写，显然问题重重。更何况，“正统”或“主流”，往往是一种律性的建构。过去，奉行现代主义的作者，只有林色、温任平等少数人做点文学史事论述，而每年在报章写年度文学发展现象报告的人，多半无视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

但是，现代诗的出现、现代小说对文字与技巧的重视、域外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在60年代初，在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可说是丰富了马华文学的“文库”，不满足于“现实主义”教条化文本的读者也有了多一种选择，不认同文字可以透明地再现内外在世界的作者也有所憧憬，而马华文学也不至于在整个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缺席。

问：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是否迟至国家独立、甚至新马分家后才出现？请您略谈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坛之兴起，并说说当时的主要推动者为谁。当时报章文艺副刊扮演怎样的角色？属于小众传播的文学杂志，在马华现代主义大潮中的的影响力有多大？文学团体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表现？

答：

现代诗早在 30 年代末、60 年代初出现，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前锋。《蕉风》、《学生周报》在独立建国前后创刊，编辑同人来自香港，有反共、恐共甚至亲美的背景，主张“马来亚化”，但不认同左倾的“现实主义”（早期编者多认同写实主义，如写《恺尼河的鸣咽》的方天），倾向追求求实的文学表现，但不前卫。现代主义美学正好适宜作为“现实主义”的反动，影响所及，若干文艺青年团体（如“银星”、“海天”等）也响应这样的创作风格。《学生周报》大力推广现代诗，也常有文章介绍现代文学（如编者黄崖的《现代文学欣赏》，而《蕉风》在黄崖主编时期多转刊台湾现代文学（借用德国的现代文库来补本国文库之不足），造就了现代主义文风的新气象。马华文学对学现代性的追求，可以说这时已展开，只是非计划性，故这一波现代主义运动进程缓慢。

60 年代中叶，星马分家，成为两个政体，但就马华文学而言，长堤两岸仍然互联，对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来说尤其如此。先是周唤革新《学生周报》的《诗之页》进一步推动现代诗运。接着是梁明广（完麟福、黎强）在新加坡执编《南洋商报》的两个文艺副刊，作者颇多联邦人（大马人）。陈瑞献（牧铃奴）当时在新加坡崛起，其现代风格强烈的诗文常在《蕉风》与《学生周报》刊出，他与其他现代诗人集结，形成“六十八年的一代”，并创办“五月出版社”推出《巨人》、《新加坡十五诗人新诗集》等诗文集推动本土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说陈瑞献是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巨人也不为过。影响所及，新加坡还有《文艺季风》与《猎户》等现代主义刊物出现。《蕉风》在 60 年代最后一年改版后，陈瑞献加入李苍（李有成）、白森、姚拓的编辑阵容，先后推出诗、小说、戏剧、马来文学、

19 OCT 1999

牧铃假作品五个重要专号。70年代初陈瑞献与梁明广合编《南洋周刊》的《文丛》版，译介当代西方文学与文化甚属不遗余力。这几年可说是第二波的星马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此外，当时还有《大学文艺》（初期）、犀牛出版社、棕榈出版社、砂朥越星座诗社、天狼星诗社（及其前身）（出版《大马诗选》）响应现代主义路线。

但是，到《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编者易人、星马副刊分家、陈瑞献退出《蕉风》编辑群、《文丛》停刊，这个文学运动就开始走下坡，渐成未竟之业了。虽然在70年代中叶以后，新加坡还出现了展现强烈现代主义风格的《楼》半年刊与《红树林》诗刊，吉隆坡也有张翼云（即画家张翼，诗人张生因）、沙离等人倡立人间诗社、出版“人间丛刊”，但那已是星马华文现代主义文学的“回光返照”，作为已不大了。

上文其实已一并回答了有关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推动者、报纸副刊、小杂志及文学团体的提问。主要推动者中，姚拓自承不懂现代诗，他的戏剧与小说一点也不现代，但是能包容善用出版社旗下刊物的编者作者的现代风格，殊为难得，这也是《蕉风》可以拖到最近才停刊的原因。白石的诗清新可谈，较力匡成棉北岸现代多矣，然亦非 High Modernism，倒是他一系列捍卫现代诗的《现代诗闲话》颇有披荆斩棘之功。黄崖以长篇见长，在香港出版过现代诗集，也出版过破弦的经典诗集《苦苓林的一夜》，但他的小说还是相当传统的产物。黄崖离开友联出版社后创办《星报》，仍常转载台湾的现代诗文。《学生周报》在周唤、李荃执编时强化诗与文艺版的现代风格，李荃的《鸟及其他》至今仍是马华文学的重要诗集。但是，整个星马华文文学现代主义运动的主力仍来自梁明广与陈瑞献，二人的现代视野始终无人能及。

问： 据您的观察，到了80-90年代，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否仍旧“壁垒分明”？两者在文坛中的“主、次”关系（姑且这么说）是否一如既往，或者有所更动？

答： 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在五一三事件后，有卷土重来之势，但在70年代初政府发表马共整武白皮书、逮捕其（身份曝光的）地上成员及外围份子、解散马华文学会后，显然遭到压制。走“现实主义”路线的两大报副刊也依然如故，《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编者从陈思庆换成钟夏田，版名改为《读者文艺》，《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上的诗文社会性较强，但也没有明目张胆突显文学的阶级性。70年代中叶后，马华写作者筹组写作者协会，也算是马华文学史上的大事。筹备期间，自有若干派别、利益之争或门户之见造成的风风雨雨。实际上，当时只有温任平、黎纪元、叶啸等与筹委会诸人周旋，现代主义文学健将如梅淑贞、沙禽、张景云、紫一思、甄贝零、温梓英等人，完全置身事外，姚拓、白森或《蕉风》与《学报》同人也未涉入。基本上，一直到80年代中叶，马华文学系统仍是“双中心”壁垒分明地并行，但是现实或现代主义双方都没甚么出色的表现，因此也无谓主、次之分。

不过，80年代中叶以后，壁垒就不那么分明了。1985年底，张景云编《南洋商报》星期刊的《文会》版，颇有当年《文丛》之风。张景云并无意划地自限以现代主义挂帅（他常留意中外文学发展，当初在欧美或台湾，当时已掀起后现代主义风潮了）。出刊前编者邀若干文友小聚，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些人包括陈思庆、梅淑贞、李婉宗、沙禽等，各人文艺观并不尽相同，但也相谈甚欢。隔年彦火（潘耀明）访马，我和许友

彬去访问他，与陈思庆不期而遇，他对我们会去访问意兴大感讶异。到了90年代，舞文弄笔的早已新人辈出，成龙成凤者大有人在，二大报文艺版编者也已易人，他们也不像前人般好设定派别门槛。林春美编《蕉风》时，也广邀各路人马撰稿。1997年，华文作家协会与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合办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我即和碧漫同场发表论文，并不觉得我们有多大不同，除了论文内容，不过要是研讨会提前一年举办，主办单位大概不会把我们摆在一块，他们大概会把我戴上现代派的帽子，跟碧漫头上那顶不一样。大体上，我们可以说马华文学已步入整合期。这时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别已没什么意义了。若干年前，我还在编《蕉风》的时候，早已在《风讯》中借用“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来表态了。

19 OCT 1999

南洋副刊





出土与重探

问：· 马华文学文学有哪些作品称得上你心中的“经典”？或者，谁有潜能贡献经典（可不可能有一些作者非常有才华，但在可以写出经典之前不幸英年早逝，或停笔/封笔/弃笔？）

答：· 经典乃人文或人为建构（虚构）产物，并非历史遗址古迹。遗址或古迹的存在，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要历经大自然的浩劫（如地震、火山爆发等）。文学经典没那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书单，不一定是“国学必读书目”或“一生的读书计划”那么影响深远或堂皇的东西。马华文学的历史还短，即使把殖民时期文学算进去，也不过 80 年光景。我们只能说，谈某一类的课题时，哪些文本不能忽略，否则论述难免失之偏颇。例如，谈马来亚化的写实主义小说，总得谈万天的《烂泥河的鸣咽》。谈马华现代诗，当然也有一些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诗集，如陈瑞献的《巨人》、吴碧安（手术台上）、李哲的《鸟及其他》、梅淑贞的《梅诗集》、温任平的《海风是一种伤》、杨标光的《雨天集》等。谈散文呢，恩采的《风向》、温任平的《黄皮肤的月亮》自有其重要地位。谈现代小说则不能不论《牧铃奴小说集》、《宋子衡短篇》等短篇集。长篇集则付之阙如，没有长篇而谈经典，岂不怪哉。经典建构或真加速已生产作品永续价值的行为，我们很想像预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样，预测谁将是未来经典作品的生产者。与其洒在未来，不如现在读几本好书，不管这些书是否入围谁的经典书单。

问题是，即使我上面所列诸书诚属经典之作，我也不一定从中得到读书之乐。比如说，陈瑞献的《牧铃奴诗二集》才是 *writerly text*，里头的文字就比他那一本集子中的诗更耐玩味。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书，每一本都已绝版，是不是经典，一般读者无从求证。对我来说呢，这些书也多半不在手边，在手边的则多年未读。我们的阅读品味其实常常改变。既然如此，是不是经典，又有什么关系呢？

相对于所谓经典，我们也许应“出土”非经典佳作。例如叶进的《一九六四》、张生因的《吉差集》等，读者更多没有接触的，是散在《蕉风》、《学报》或其他地方的，因年代久远，资料流失，早已淹没……；出土或重探这些文本，也许比建构经典更功德无量。

19 OCT 1999

80年代的 时代 命题



张光达 专访
庄华兴 笔谈

23 OCT 1999

南·洋·文·艺



庄华兴简介

庄华兴 1962 年生，福州利民济人。现为国中教师、新纪元学院兼任讲师。马大中文系硕士，研究马华—马来文小说。主编大马翻译与创作协会会员文集《瞬息》（1998）。编译《寂寞求音——Lim Swee Tin 诗选（1973-1998）》，即将出版。

23 OCT 1999

庄华兴

■庄华兴签名式

置诸 80 年代的政治与社会景观来考察，我以为它是马华文学面对危厄的权宜性因应策略。80 年代的政治与社会形态的遽变/动荡对马华文学带来了变数。

问：请谈谈 80 年代马华文学的现象。

答：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除了单纯的食物链，个别生物的存亡生长完全是可以孤立看待的。同样的，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可以避免惯性思维的盲点，并容许特殊性、异质性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方式即为现象。

姑不论马华文学这概念的吊诡与颠覆性，来到 80 年代，华文文坛出现了有趣的现象：文学与消费文化合流。80 年代，专栏文学泛滥，造就了不少“作家”。各媒体鼓吹的消费文化，直接致使文学庸俗化、异质化，也损害散文作品的生存空间与生态。纵观整个 80 年代，马华散文的质地并不高，也无不超越前期的水平。

另外，文学次元工具如文学奖、讲座、写作班、文艺营、研讨会、史料展等等开始受重视，形成某种特殊的现象/热潮。置诸 80 年代的政治与社会景观来考察，我以为它是马华文学面对危厄的权宜性因应策略。80 年代的政治与社会形态的遽变/动荡对马华文学带来了变数。一方面，它复苏的社会内容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作者被赋予过于沉重的社会使命，往往导致艺术性的失落。实际上，80 年代是一个异常政治化的年代，它一再考验着马华作者的智慧/因应能力。

问：请您就 80 年代的小说风格特色作一个分析。

23 OCT 1999

答：80 年代政治、社会与经济急剧的转变也导致文学作品注入更多的族群与文化关怀的命题。这表达在诗歌与小说尤其显著，几乎是 80 年代马华文学的基调。国内政治、经济、教育问题，如独大败诉（1982）、全国 15 华团草拟提呈国家文化

备忘录（1983）、合作社事件（1986）、华小高职事件（1987）、茅草行动（1987）、巫统分裂（1988）、马共和平协议（1989），对作家构成很大的冲击与影响。潘雨桐、傅承得、游川、何乃楷、霍波等纷纷通过作品发出愤慨，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对民族与国家的忧患。马华小说家或焦虑、或彷徨、或愤慨、或怀疑，都是现实情境的辐射与反弹。潘雨桐、宋子衡、洪泉的小说除了对族群命运表达愤慨与控诉，更让人感受到他们对历史宿命的沉痛。面对这种事实，梁放显得较内敛，他的两篇“伤痕小说”对该群历史宿命作了最沉痛的伏贴，然其境界又比潘、宋、洪三君高。他在揭疤/疗伤之际，又有反省的余地。后来小黑也意识到这一点，但读来有余，近乎自责。

其他比较明显的反映在大专/校园文学的兴起。80年代初港台大马现代文学奖、中期大马境内的全国大专文学奖大部分得奖作品可资例证。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实是，在初涉文坛的岁月便得承担如此沉重的使命，终究使他们荒废了美学探索而无法走出自己的路子。因此，当热血冷却后，大部分都相继消声匿迹，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大专/校园文学的宿命色彩。

问：您本身也从事小说创作，必然也观察到90年代与80年代有所不同，可否说明这些不同之处？

答：90年代涌现的文学新人类在艺术认知方面与前期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格格不入。他们的小说着力挖掘人性的阴暗面，如黎紫书。在艺术感性方面，不限于传统吉语（Parole），客观情境的反射亦事先经过主观的感性干涉与再造，如夏绍华和殷修。90年代的小说新人类从未把现实情境排除在书写

实践之外，只是他们选择从博大走向纯粹，从共相取向趋于殊相取向，这些在李天森表现得最为极致。另外，90年代小说观念的开发也有显著的成绩，黄锦树思辨性极强的小说让读者看到小说文体的更大作为，90年代的小说风景与80年代可谓各擅其胜，各有看头。



未完成属性

问：80年代的马华小说作品和现实社会之间有什么关系，仅就80年代的马华小说，您认为有哪些作品有可能成为经典？

答：马华小说无论是写共相或殊相，取材无论是博大走向纯粹导向，皆是社会的反参与反思的结果。有些小说家试图从历史与传说中寻求/重构现实；有者深入人类精神内部以探究心灵故乡；有者跨阈乡野，拾撷祖先遗落的足迹。他们或多或少，或是或隐把现实诸相进行再塑形，力求做到内在真实与外在真实互补共存，同时也呈现出内蕴殊异的美学视野。实际上，80年代的马华小说不能单纯以模拟、再现、反映等理论概括之。它是反思文学的开始，对当下的现实与历史情境进行反思。

马华文学的批评与理论风气未开，学术建制刚起步，出版机制欠缺规划，这些都与典律建构有互助互补的关系。马华文学的批评与理论，一直以来都善于印象式、形式主义的操作，或隶属于某种意识形态与教条，长久的积弊造成批评者被神权化而不可侵犯。这些牵涉到学界/识见与诚意的问题。学术建制方面，马大、南院、新纪元学院中文系的马华文学学术研究刚起步，一时学界剑人藉端，应该可以对南院乐焉，只是憾焉。

23 OCT 1999

与资料整理与存档有待加强建设和巩固。

文学选集，包括合集与个别作家选集、年选、译作等编纂出版也是典籍建构的组成部分。

从选文到出版、流通都应系统化、专业化、建制化。目前国内师范学院中文组马华文学课之所以取方修的大系/选集为教材，我想主要原因是坊间没有更理想的选集。其他如出版中学华文科马华文学读本的想法在目前来看似乎还不太容易实行。在这种种问题未克服之前，单凭论典仍然不太实际。经典的生成不是单凭其先天/主观因素可以成就的，它仍须仰赖后天/客观的条件才得以诞生。经典本身所具备的互补互动性格说明它是在建构中自我完成的。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典籍/经典的生成或许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你的问题的提法同样认可 80 年代马华经典小说的未完成属性。如果我的角度正确，我同意你的看法。潘雨桐《南门桥下的流水》（1983）、《何日君再来》（1984）和梁展《碎片屋顶上的月光》（1986）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可以考虑重写。对马华文学，潘、梁二君有责任完成建构工作。



南洋副刊 23 OCT 1989

90年代 年轻的 一代

他们会认为“文学性”比“马华性”来得重要，而且有更
大的抱负要跨出“马华”，成为中文世界的作家。



系列 5
(完结篇)

26 OCT 1999

张光达 专访
许文荣 笔谈

南·洋·文·艺



■许文荣近照（摄影/张永修）

许文荣简介

许文荣 1964 年生，吉打人，马大中文系硕士，现为新山南方学院中文系主任。著作有学士论文《苏轼的婉约词研究》及硕士论文《列子思想研究》。

■许文荣签名式

26 OCT 1999

问：

· 请谈谈 90 年代年轻作者和大专生作者的风气和风格趋势。它与 80 年代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又有什么方面的延续？

26 OCT 1999

答：

· 90 年代是众声喧哗的时代，特别是在年轻作者及大专生创作者群中。80 年代的大专生的创作比较具有“群体性”，表达族群的焦虑、不满及忧患意识。这与当时较受压抑的社会环境有关；90 年代个人色彩比较明显、表现较浓厚的“自我”，族群意识较被隐藏及模糊化。80 年代的作品主题倾向比较“集中”，90 年代比较多元化，比如他们的创作参照系，不只有杨牧、余光中及白先勇，而且还包括了世界级作家如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等；在表现手法上，80 年代比较注重内容性、历史文化感较强，如何国忠、祝家华、潘碧华等位的作品。90 年代则较注重技巧性，其中如断裂、感性与知性的融合、意象纷呈、拼贴、后设、游戏性、开放文本等技巧，都可在 90 年代崛起的年轻作者群中，如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黎紫书、孤舟社的成员等作者中普遍存在。此外，在文化/文学中国的情意结方面，90 年代的也比 80 年代的来得淡薄，常常只是轻描淡写，不像前一辈那么敏感及执著。

问：

· 您如何看待 90 年代年轻作者对未来世纪马华文学发展方向的定位角色？

答：

· 他们会更把自己视为一名“作家”，而非定位为“马华作家”，并非放弃他们的马华属性，而是不愿成为一种负担或约束，影响他们追求更高的艺术表现。他们会认为“文学性”比“马华性”来得重要，而且有更大的抱负要跨出“马华”，成为中文世界的作家。

问：

· 请谈谈 90 年代年轻作者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来寻找自我在世纪末的定位？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形式与前辈作者/外国思潮读本对话？

答：

· 对于前辈作家，尤其是来自“现实主义”阵营的，年轻作者已从 80 年代的“若即若离”到 90 年代的断然划清界限，他们勇于表达对现实主义的反感与憎恶，并认为现实主义已到了历史的终结。他们的创作动机及驱动力大多在于表现“自我”及一种艺术精神的追求。他们在技巧上将更加具有探索及实验精神，并将借鉴更多世界作家的创作成果，而且不会只定于一尊。

问： 请谈谈马华文学史在面对 21 世纪应如何重新调整和定位。是否可以在一套崭新的理论视域运作下产生新的定位/定义？如何产生？将涉及哪一方面的论述？

答： 文学史的撰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程，无论如何它对于文学的传承却是很重要。在我教学的经验中，由于缺乏一本胜任的文学史，使到教学倍感艰巨。到目前为止只有方修的《马华文学简史》，而这部“文学史”由于浓厚的“主义”色彩，一直都要受许多的抨击。无论如何，他在资料的保存上是应该给予称许的。所以文学史的撰写不能有太强的“主义”性，必须有广阔的胸怀，兼容并包，才能反映文学的真正规律与发展轨迹，我期待着陈鹤刚教授的《独立后马华文学史》的出炉。

持续“文学热”



问： 90 年代是否有产生任何“经典之作”？您对“经典之作”有怎样的定义？

答： 所谓“经典之作”应该是具有权威性、广泛的影响力并能够“历万代而常新”（摘自珍语）的著作。庄子说，水若不深就难以承载大船，这种说法用在文学也是很恰当，以马华文学历史之短，在现阶段谈论马华文学是否已产生“经典之作”似乎并不是很实际。目前更重要的是如何持续 90 年代的“文学热”，让年轻一辈有更自由的空间、更具有文学倾向 (Literature Friendly) 的环境，推动他们持续不断的书写。此外世界性的经典著作，如《生命不可承受的轻》、《百年孤独》等，以及传统及现代的中文经典，如唐宋诗词、《红楼梦》、白先勇的小说等等，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创作参照系。

26 OCT 1999

批评的 典范

——方修的“接近文艺写作”略谈

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方修先生是有一定的审美标准的。要而言之，那就是：实事求是，不求全责备，不动辄行使“裁判”。



逢星期二及六见报

20 MAY 2003

◆ 甄供

南洋文艺

又见有人在发牢骚，说马华文艺批评的薄弱、粗浅和不行。粗略一看，似乎言之成理，但进一步思索，就发现这种论调未必属实。我以为，要估量马华文艺批评的成绩，就需要具体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中国作家叶圣陶早在上个世纪廿年代指出批评的重要性。他说：“没有批评家冷静的观察，明亮的报告，也许要认黄土为珠宝。”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他认为“批评家与艺术家是相辅而行的”。可以欣慰的是，马华文坛是有一批优秀的、具有风格与特色的，可以经得起时间验证为文艺批评。方修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方修先生把他为作家写序，以及为前辈作家整理文集而写的前言或介绍，辑编而成《游谈录》出版（按：方修先生还有一些文艺论评收录在其他的集子里面）。他说：“给文艺书籍写序跋，一般说来也是一种文艺批评工作，应该发挥一下文艺批评的功能，对于作者的长处短处，作品的优点缺点，作出几句恰如其份的评说”。他认为这是一种“接近文艺写作”。不论是这本集子里所评论的廿多位作家的作品，还是他收录在其他集子里的文艺论评，人们都敬佩和感谢他的劳绩。那些在他鼓励、批评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不论是文艺运动进程顺利也好，抑或是文坛处于低迷状态也要，他们仍然坚守岗位，勤于笔耕，不时有新著问世。这就证明方修先生所作的文艺论评，眼光是十分独到，善于发现文艺人材。

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方修先生是有一定的审美标准的。要而言之，那就是：实事求是，不求全责备，不动辄行使“裁判”；对于作家的思想境界的高或低，作品的优点或缺点，方修先生都一一指实，既报喜又报忧。他还有一个特点，即“从动的、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和评论作家，他写道：“我经常从动的、发展的视角来观察作家，评论作家，不仅对于抵抗如此，对于其他重要作家也是这样。”这个观点极具科学性和前瞻性，值得从事文艺批评工作者关注和认真学习的。



20 MAY 2020

正由于方修先生持着这个“从动的、发展的视角”来观察和评论作家，所以他能摆正作为批评家与文艺家的关系，尊重作家，爱护作家，与他们相辅而行，共同为马华文学的繁荣而作出贡献。

对于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方修先生是重视介绍和评价的，至于作家的生平事迹，则放在较次要的地位。他说：“最重要的是把被淹没在旧纸堆里数十年的优秀作品介绍出来，丰富本地文学遗产，裨益后人，而关于作家的琐碎的讯息、情报，于我是可有可无的。又或者为了保存某个时期的文艺史实，他会在自己的集子里收录一些作者有涉及上述史实的，尚未收集成书的篇章，处理的手法也与上述的一样。

方修先生真的是不重视作家生平事迹的介绍吗？不是的。设身处地的为作家着想，不让作家的真实身分，在不适当的时段里曝光，这是方修先生爱护作家的诚挚体现。在他评介的作家群中，即使好些人早已与他时相过从，非常熟络。但在介绍作者时，除了作者常用的笔名、作品及文学成就等等之外，个人经历、职业状况等都不提及，往往是以“生平不详”一笔带过。譬如以野火为笔名的已故林晃升，方修先生对于他的生平早已知之甚详，但是在80年代之前评介他的作品时，他的生平也是在“不详”之列。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曾对专访者披露他的看法：“文艺工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些人并不希望别人把他的身分公开出来，……你把他一些个人生活、所用笔名都公开出来，他所能进展的路程便很有限了。就是说他本来有一段路可以跑，可以跑10里，经你这样做，他可能只能跑5里了。”

方修先生的“接近文艺写作”即文艺评论的写作，是他坚持真理和艺术的艺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从而汲取养分，增进知识，改善我们的文艺工作。

（作者为新纪元学院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20 MAY 2003

记马华文学归侨作家 丘士珍


 □ 钦鸿 (中国)

2001年9月，福建龙岩的《龙》杂志第二期登出署名岩人的《半生漂泊海外的杰出作家邱士珍》一文，简略地记载了邱士珍一生的文学经历。读着这篇文章，不禁想起我与这位马华文学归侨作家的一点联系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还尚未涉足马华文学研究领域时，因为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便已注意到了从马来西亚文坛返回祖国大陆的丘士珍先生。他生于福建龙岩，早年曾在厦门从事新文学活动，南下后又积极参与马华文学运动并卓有贡献，40年代后期返回故乡龙岩后，仍没有脱离文学队伍。像他这样的经历，无疑是我研究的对象，于是我一面努力从新马华文文学的书刊资料里收集他的材料，一面打听到他的住址，与他取得了通信联系。1985年12月24日，他给我寄来了《关于我和文学的结缘》一文。这对我当时正在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和《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小说卷》颇有帮助。这两本书后来就都收入了他的资料。几年后，当我准备着手进行马华文学研究的时候，又一次给他写信，向他请教一些马华作家的情况。他于1990年2月25日给我复信，对我的工作甚表赞赏，但却表示他“已年迈，今已36岁，不但江郎才尽，而且记忆衰退！所托之事，无法办到”。只是附上了一份他自己的《简历》。这是他给我的第二封信，也是最后一次联系。最近听说，他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

人亡信存，引得我们后人无限的怀念。这两份材料，对了解和研究这位马华文学归侨作家，显然是弥足珍贵的。且附录如下：

关于我和文学的结缘

记得是我年轻时，在集美学校念高师体育专科，课外除了运动外，晚上很无聊，有些念文科的同学就介绍我看丁玲、冰心，以及创造社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不久我就爱上了新文学，也开始学习写作诗歌、散文甚至于写小说……接着就在厦门各报副刊投稿……同时我的同学陈柏生又鼓励我参加CY。毕业后，就在厦门福建印书馆自办《飞泉》文艺周刊以及《鹭江》小报，不久便被厦门市国民党当局通缉，便逃亡到海外新加坡、马来亚一带，因为生活无着落，就在各报投稿谋生。

我在厦门的文学活动，当时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刊》曾介绍过我的情况，在海外的文学活动，新加坡的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曾经介绍过（我）的作品和情况。

我曾经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过一本中篇小说《没落》，在海外世界书局出版过一本中篇小说《春春和娘惹》，及怡保日报社出版过一本剧本《三姐妹》，吉隆坡民声报社出版过一本中篇小说《复仇》。笔名丘天，其他笔名较著名的是丘家珍、丘士珍等，有些我自己也忘了。我今年已经是一个81岁的老头子了，记忆力差了，写作能力衰退，真所谓江郎才尽了。

1985年12月24日 于龙岩

简历

邱士珍，又名丘家珍、丘天。1905年9月12日生于福建龙岩市月山乡。现居城关工农巷门牌2号。

我18岁肄业于厦门东山云梯职业学校，19岁转龙岩省立第九中学，22岁考取厦门集美高级师范体育五专科毕业。在集美，受创造社郭沫若的文学著作影响，爱好文艺！后又受鲁迅著作影响，参加CY。25岁即转进中共，在厦门搞地下工作，为党主编《鹭潮》文艺周刊、《鹭江》报等。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逃亡海外。初为生活，在星马各报写文章卖稿过活。后以教书为职业。日寇南进时参加马来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军中参加了党。

1949年4月间被英帝驱逐出境回国，现已离休。

1934年经上海生活书店自费出版《漫笔》中篇。

在马来亚协保日报《三姊妹》剧本一书，在吉隆坡民声报出版《复仇》中篇小说。1935年在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中篇小说《苍苔与绿茵》一书。

丘士珍寄给我的这两份小传，写得都很简洁，却也详略参互，各有侧重，对照来读，其生平轨迹才大致可见。

较之马华文史家马崙兄在《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和《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中为他所写的传略，以及岩人的《学生飘泊海外的杰出作家邱士珍》，他自己所写的这两份小传的最大价值，是提供了新的内容，即他青年时代在福建厦门的活动情况。那一时期，正值革命文学蓬勃发表，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接受了革命文学的洗礼，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斗一员，因之遭到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通缉而逃亡南洋。任何人的行为表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他的这一经历，不但说明了他之所以南下的原因，而且对于了解他在南洋的种种表现，包括积极参与马华新文学运动，嗣后又参加马共领导的抗日军等，无疑也是一把钥匙。

丘士珍提到的他在厦门的文学活动，由于历时久远，资料散佚严重，现在已经很难查找了。福建省研究地文文学的学者汪毓夫、汪洲和欢声和3人，上世纪80年代初曾编过一份《福建新文学期刊闻见录》，在《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第一、二辑连载，共收集了福建省1919年至1949年间出版的地方文艺期刊161种，其中厦门出版的刊物比重甚大，但丘士珍提及的《飞泉》周刊、《鹭潮》周刊以及《鹭江》报，却均未见收录。倒是丘士珍回忆的上海《读书月刊》，确实对他当时在厦门的文学活动留下了一点剪影。

29 APR 2003

最近，我在1931年5月10日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二期上，查到一篇邵天降写的《福建文坛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文中就有关于丘士珍的记载。作者写道：“当1928到1929年全国文坛迅速地开展中，福建静寂的文艺界也被惊醒了，文艺小集团，书店，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勃发起来”，其中厦门是当时文艺运动的“中心”，而文学团体中“最有影响的”，首先是由“集美丘士珍、丘絮絮、张源津、幻怜等所组织，为厦门文艺界的主力军”的蓬蓬社。该社编了3份刊物：附于厦门《民国日报》发刊的《蓬蓬周刊》和《天河周刊》、以及附于《全国报》发刊的《荒岛周刊》，在文中谈到的文学社团中是最多、影响也最大的。在谈到1930年下半年以来的文坛情况时，文章又一次提到了丘士珍：“丘士珍氏于去年往南洋解决生活问题，闻有连载长篇小说数种将在马来亚书店出版。”这时，他已经离开厦门而侧身于薰风椰雨的马来亚文坛了。

在上海出版的《读书月刊》第2卷第6期（1931年10月10日出版）上，还有一篇寄自马来亚K埠、署名YANG（“羊”）的《南洋槟榔屿的文化概况》，文中也有对丘士珍的片断介绍，不妨也引录于此：“丘士珍，林明心——这两位都是马来亚半月刊的撰稿员，现执教鞭于南洋某埠。”

至于介绍丘士珍在南洋的文学活动情况的，他自己回忆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其实应当是《马华新文学大系》。该书由方慧主编，共10卷，在1971年1月出版的第4卷“小说二集”中，收入了丘士珍的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方慧在该卷的《导言》中认为，丘士珍是马华新文学低潮时期较早出现的“具有客观现实主义倾向”的一批作家之一，作品“色泽暗淡，气氛低沉，冷静与客观地描写当时马来亚不景气底下的一般现象”。另外在1972年5月出版的第一卷“理论批评一集”中，又收入了丘士珍的《介绍饶楚瑜君的《荒》》、《〈太白〉与《星火》》，以及他以“废名”的笔名写的《地方作家谈》和《总算是我抛了一块《地方作家谈》的砖》等4

篇文章。方修在该卷的《导言》中特别评述了他关于“地方作家”的文章，指出丘文提倡“马来亚地方文艺”，并介绍了14位地方作家，从而引起了马来亚文坛一场大论战。虽然他推举的地方作家并不准确，但对马华新文学却“尽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在他那篇引起论争的《地方作家谈》中，第一次提出了‘马来亚地方文艺’这个名称，也等于当地文艺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来亚’这个地理概念。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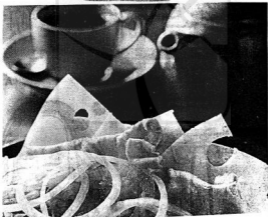
马华新文学的孱弱，是由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辐射与影响，但是马华新文学毕竟是生长在马来亚这块土地上的，如果不能脱离中国现代文学的母体，总是手执报纸眼望天外，则马华新文学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发展。所以丘士珍针对当时马华文学的现状，提出“马来亚地方文艺”的命题，确实是关系到马华新文学的个性特征和发展方向的大问题，确实是对马华新文学建设的一个大贡献。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作为南下作家的丘士珍，他不但身在马来亚，而且已经全身心地融入马华新文学之中了。

“马来亚地方文艺”的提倡对马华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使丘士珍及其《地方作家谈》已经被记载在马华新文学的史册。方修以及其他文学史家在论述马华新文学发展历程时，都不会忘了提出他的观点和对文坛的贡献。

关于他的创作，除了上述小传里提到的几部作品以外，还有不少。他在1985年1月给马崙的信中，曾提及在《南侨日报》、《风下》周刊以及洪丝丝主编的《现代周刊》发表过的几个短篇，如《野恋》、《春困梦里人》、《三姐妹》、《母亲》等篇，认为“比较好一些”，其特点是“短小精悍，能说明问题”（见马崙《新马文坛人物扫描》）。看来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另外，他还发表过短篇小说《爱情的快乐》和一篇约4万字的中篇小说《复仇》，被收入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二·小说一集》。所有这些，都是他对马华新文学的贡献，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首

推《苔苔与嫩蕊》和《没落》两部。前者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第一部中篇小说，后者是马华新文学在上海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比在马华新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7月版）还早了两年，其意义显然非同小可。因此，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到了丘士珍的《苔苔与嫩蕊》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之后，马华新文学才算有了中篇的创作。”又指出：《苔苔与嫩蕊》与丘士珍的短篇小说集《没落》，以及另一作家的《面包及其他》3部作品，“构成了马华新文学创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由此可见，丘士珍在马华新文学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了。

南洋文艺 29 APR 2003



商 余

2003年10月8日 星期一

何物千年 忽若潮

(上)

人本文学的出发

“铁尽九州铸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那是诗人聂绀弩的痛语。文章扶社稷，是一些文人的自我膨胀。连孔子这位万世师表，也在现实中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只好以删《春秋》表达他对社会的关怀。

■白 丑

海 花 雨

(寄自美国休斯敦)

- 6 OCT 2003

逢星期一至六见报

南洋商報

◎艺圃长耕 文章行健

马来亚历史新开，1958年，《蕉风》从新加坡壬吉隆坡出版，编辑部设在在八打灵再也的旧区201路13号，东亚酒厂后面一条小街道上，十分僻静。编辑有甘美华、彭子敦、原上草、岳文才和我，同时编《学生周报》。

新的时代，新的地方，新的展望。斯土斯民，无根的身分已变，文人作家，刺猬的心态未除。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封闭的时代，《蕉风》面对一个凤凰再生的崭新社会，也面对一个熟迷燕副的传统文坛。两者之间，竟如此的脱节逆向。当时黄思特、黄崖仍未南来，《蕉风》由姚拓主持。

姚拓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即投身抗日，生死顷刻、枪林弹雨的雷霆阅历，让他遇事沉着坚忍。四海南奔，又历经险阻，潦倒困顿、山边海涯的风雨人生，让他待人随和慷慨。南来后，大音希声，文章行健。近乎糊涂的宽厚而有真知，类似执迷的笃行而无偏见，宜其在此人文多元、新旧反复之际，带领《蕉风》作老农的艺圃长耕，开始四十余载的文化稼穡。

◎新的土壤 新的生机

1959年4月第78期，《蕉风》第一次改版，由原来的综合文艺刊物，朝向纯文学方面发展。在形式上，采用16开本，随刊发行一本32开本的小册，刊名家小说，后来亦刊新诗。

陈思明以本社名义，写了一篇（改版的话），提出了“人本文学”，副题是“兼论马华文艺的发展路向。”

“人”依然是人类历史的中心，文学与艺术亦必将波澜壮阔的奔向这个重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方向。……文艺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的主要表征，而人类文化活动的特性，是愈能接触其他文化，愈能得新血、新的生命力，便愈能充实、丰富而多形多姿。就这一点来说，中华文化在“海外”，特别在乌新，正

- 6 OCT 2003

如同西欧文化传播到“新大陆”一样，它是古老文化的一脉相传，但新的土壤赋予它新的生机，在新的雨露中，它将长得更为年轻而健壮。……人性的尊严，生命的和谐，是我们文艺创作的最高目标。

这个“人本文学”的概念，似是五四“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传承，梁实秋谈文艺，曾说“文艺的包蕴在于普遍的永久的人性之描写。”

◎文学的归文学

新人文主义 (New Humanism) ，源自 19 世纪末的美国文学大师诺顿 (Charles Elliot Norton, 1827-1908) ，他曾任文刊巨擘《北美评论》的主编，在哈佛大学教了 23 年艺术史，影响深巨，强调理性思考、传统抉择、诚心正意。梁实秋在哈佛的老师白登德，即为诺顿传人。

人本文学的精神，接近乎此。姚拓以鲁文为笔名，写主题文章“文学的个体主义”，也有一番陈述：

“要求形式上的美，要求感情上的真，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求发掘人之内心深处的良善，对失去的理想不绝望，对悲惨的世界不悲观，在挑战与反应中求进步，在进步中要求更深、更美、更好的创造。”

这两篇文章，仍有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但已越过政治的石头，文学的归文学。姚拓在“读者、作者、编者”写的一段话：“我们的创作态度必须严肃，我们反对以政治标准来代替艺术标准。”是明话实说。

四十多年后，以批判人文现象著称的龙应台，说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文化虽与政治、经济关系千丝万缕，但在某些层面，又不能让功利进入文化，因为这样会变成文化为政治服务。”正是这种顾虑。

◎个人意识的觉醒

文章事业，在历史上是不负江河的万古流，文人作家，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却弱不禁风。文人的爱国心，对苍生的悲悯，对社会的关怀，常常被功利的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上，“铁尽九州铸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那是诗人聂绀弩的痛语。文章扶社稷，是一些文人的自我膨胀。连孔子这位万世师表，也在现实中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只好以删《春秋》表达他对社会的关怀。

尼山推识慨然心，慨然心是孔子对社会关怀的人世意识，不等同政治意识，更不等同政治污染。社会关怀是个人的觉醒，政治意识是群众的认同，政治污染是标准的独视。

佛言劫火遇皆销，
何物千年怒若潮，
经济文章磨白昼，
幽光狂慧复中宵。

那是龚自珍的诗句，何物千年怒若潮？那是人类不能禁锢的心灵，那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在文化史上，晋永嘉年间，因海南奔，民族的迁移，世局的激荡，传统的崩离，中华民族有过最大一次个人意识的觉醒，而后始有唐代文学的大气磅礴。约半个世纪前，文化的避劫南奔，颇类永嘉，宜乎另一次个人意识的觉醒。姚拓的“人本蕉风”，生正逢时，后来的编者，亦多心领神会。

◎人性的尊严 社会的关怀

1959年底，黄思骋接编《蕉风》。他南来古隆坡前，在香港即以小说名重士林。他创作态度严肃，文笔干净舒暢，章法结构缜密，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写人世间的温情，读之者莫不会然于心。他十分推崇狄更斯可夫、法国莫泊桑、美国奥亨利的结构风格。大师级的世界三大小说名家，笔触人间，全是人性的尊重关怀。黄思骋取法乎上，推己及人，《蕉风》的取向，因而更重人性的描写。

- 6 OCT 2003

黄思群主编期间，以小说为主流，特别着力在年轻小说作家的联络，他尽量利用附刊的小册，刊载本地年轻作者的小说。小说人才辈出，马汉、陈孟、梁园、年红、秋娟、梦平文声大著。

黄崖南来较晚，在香港已落有文名。初来时，住出版社宿舍，与我同居一室，在我床边书桌，发现三十多本台湾的文学杂志与现代文学，阅后对意识流的理论深感兴趣，开始接触现代文学。

黄崖早期工作，只编《学报》，不涉《蕉风》。《学报》时由姚拓主持，黄崖从原上草手上接编《文艺三版》。我在通讯部的工作之外，仍被编《诗之页》，《诗之页》每月一期，用稿有限，积稿甚多，我将诗稿分3个展夜，交给《文艺三版》，他也乐得有人代劳，分期分阶刊用。在此期间，他联络到多位早期南来的作家文人，日后他们为《蕉风》贡献良多。

多元色彩 文社诗声

1960年，“友联”迁人八打灵再也217路10号的白置厂房，《蕉风》、《学报》随之。1962年，黄崖接编《蕉风》，很有企图心，有意将之编成读者作者包括港台、马新、欧美的国际文艺刊物。选稿对象，多为港台和旅居欧美的成名作家，也转载一些台湾翻译的现代文学理论。当地作家温梓川、梁园、黄润岳、萧遥天、依藤、白鹤，或写文坛忆旧，或写随笔散文，温柔敦厚，人文色彩浓厚。青年作家的创作与现代诗，是较能与外界接轧的本地作品。《蕉风》内容因而多元。

黄崖性喜组会结社的活动，来吉隆坡后，常常因利乘便，随我跑各地通讯部，与通讯员接触多了，惊见南洋少年的英气。他在香港编《中国学生周报》时，青年文社蜂起，成文坛盛事。他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常思换地结网。接编《蕉风》后，与我研商，可否考虑将通讯部学术组改组成交社。

6 OCT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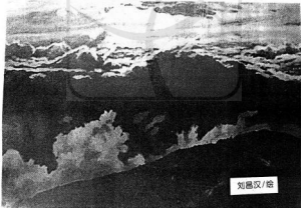
何物千年

怒若潮

(下)

-7 OCT 2003

人本文学的出发



刘昌汉/绘

文艺活动，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我职责所在，以通讯员全是在校学生，当时法令，实属不宜，建议提高层次，鼓励成熟的作者筹组文社，通讯部会全力配合，有此承诺，黄崖欣然就道。记忆中，当年文社，北有《海天》，中有《荒原》，南有《新潮》，《海天》曾出版“海天诗刊”，献手评人是笔名慧透的林木海。

(上)

文学讲座 艺事春秋

友联在营利事业之外，另设“友联文化协会”，主理青年文化活动，由陈思明兼会长，我负责实际会务，会务包括两刊作者的联络，通讯部、学友会的活动，举办生活营、野餐会、文艺讲座，也赞助社会文化团体的活动。

因为“友联文化协会”的工作，我与音乐、戏剧、舞蹈、美术、报馆、电台各界人士常相往来，中有马来西亚广播电台陈玉婵，任海外部中文部主任，头脑开放，肯拼搏创新，能人之不能，通过《蕉风》、《学报》的安排，在电台制作一系列的文学节目，内有文艺座谈与青年作家访问。

陈玉婵在当时的广播界，大家姐也，有一群艺文界志同道合的朋友，中有王宝英、刘雷华、梁志成、姚拓、辛上图、谢金福、姚春晖。工作之余，谈文说艺，观剧赏曲。在街边大牌档，宵夜闲谈，可以谈到月上中天，乐而忘返。这群艺文精英，终于在吉隆坡组成“剧艺研究会”，日后《蕉风》刊出几个剧本，都由“剧艺研究会”演出。

1962年底，陈玉婵调往马来西亚电视台当开台监制，又配合“友联文化协会”，制作了“乡土之歌”、“邦国颂”两个音乐专辑，把《蕉风》刊出的剧本《慈园》搬上荧光屏。

- 7 OCT 2003

少年十八会文时

那几年是两刊文化活动的鼎盛期，《蕉风》、《学报》在吉隆坡和檳城举办多次文学讲座。在波德申海滨、金马仑高原、檳城的巴都丁宜，举办了3届作者野餐会，会期一周，每届约30人。在我的记忆中，作者野餐会人才辈出，当年青葱，日后成名家的大不乏人，我有诗记这群青俊。

少年十八会文时，
佳出天南笔几枝，
奇思秀句超余子，
青声想象宋新词。

有一文学教授，60年代初，写实主义小将也，曾参加《蕉风》、《学报》作者野餐会。三十多年后，在吉隆坡重聚，教授已名满士林，授现代文学，桃李满天下。文章学海之余，以擅长筹募研究基金，扶植青年学人著称，备受敬重，渐成份外的工作重点。

教授淳淳君子，谈起当年旧事，说在野餐会认识几位讲师文友，影响他的文学人生至大，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激励帮助，他的留学生涯，想必艰辛。谈到份外的重点工作，教授微笑表示，这也是份内事，当年感同身受，今日所为，不过是以不同方式，作同样的事，尽心而已。这是他的谦厚，他今日播散的文学激励，实已百倍当年。我们的周围，多几位这般人物，那该多好。

雪夜林畔的声音

1969年，黄厘离开《蕉风》，由牧羚奴、李苍、姚拓和我接编，走向现代。我主其事，想起曾在香港首倡现代文学的杨际光，或可请益。

7 OCT 2003

杨际光，笔名贝娜者、罗娜，20世纪40年代末期，即在香港以诗名世。1959年底南来，先在《虎报》任副总编辑，继在马来西亚广播电台任编译。我曾邀他为《学报》、《蕉风》写诗，他笑以诗人佛洛斯特的名诗《雪夜林畔小憩》自况。

后来，他入主《新明日报》，新明社址距“友联”不远，他偶尔来访。及至《蕉风》改版，走向现代，我趁机向他请教。他与牧铃双英雄同见，提出了出“专号”的概念。偶尔论及文化垄断，他说历史是面镜子，绝对有权力，绝对的腐败，神圣如宗教，也有百年黑暗。文学的专横，不分写实或现代，人人需要不断的谦卑自省，言之丰厚。我像在那里听到过这种声音，后来在他的《雨天集》，找到几句诗，诗人对现代文学有期待的眼光，也有对文学全面的关怀，

所以我能从无知里，
对你说深奥的哲学，
且在冬天给你听，
去春和明春的晚雪的声音。

◎文章合有老波澜

1970年，《蕉风》出版《戏剧专号》，杨际光来看我，说已买了几本送给他的海外朋友，跟着谈了一些海外文坛状况。他临走前，我问他能否写一篇评论《戏剧专号》的文字。他表示久已不写文艺评论了，我说随笔亦可，他想了想，看到我桌上摆着一本《龚自珍诗集》，真的随笔写了一句龚诗“文章合有老波澜”，说尽在其中了。

“老波澜”，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旧传统，便说，《蕉风》正要出个《古典文学专号》。他微笑不语，后来查得此句出处，语出杜甫诗句“波澜独老成”，王洙注解为“才气浩瀚，故有波澜，意指浩瀚壮阔。”我想，这也许是杨际光的双关语，既指传统，亦意浩瀚壮阔。他的微笑不语，让我加紧《古典文学专号》的出版。

— 7 OCT 2010

当时，《蕉风》走入现代已逾半载，高潮渐起，正推向第一座高峰。《戏剧专号》是篇幅最多的一期，厚达240页，作者有完颜藉、牧铃奴、安敬礼、萋萋、南子、郝小菲、孤鸣、吴雨辰、张岸、姚拓、刘戈，极一时之盛。论文章才气，波涌独老成，完颜藉、牧铃奴、姚拓足以当之无愧。

刊出的3个长篇剧本，《臆园》和《汉丽宝》日后都曾多次上演，《结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以3个剧本的范畴而言，翻译、改编、创作各一，时空广及现代法国、近代中国、古代马来亚，斯时斯地，能同期刊出，也属罕见。杨际光尚惜清誉，不轻易推许他人，以浩瀚壮阔言《戏剧专号》，应非俚辞。

◎浩瀚壮阔如彼沧溟

且观其诗“文章合有老波瀾”的金豹，写的是对清代文坛的感触和预言。意谓文学的天地旷远无边，非时潮所可窥见，浩瀚壮阔为大势所趋，今日虽位微言轻，听者藐藐，但莫谓言之不预，这个看法，在50年内，一定会应验。

文章合有老波瀾，
莫作郗阳典陈看，
五十年中言文驗，
蒼茫六合此風言。

历史的景象不断重复，20世纪50年代，岂不其然。《蕉风》人微言轻，但不妄自菲薄，攘攘文场吾独往，言所当言，为所当为。1958年，以“人本文学”作出发点，与作者互动，催醒个人意识，发潜德的幽光，葱油扬清，千流奔汇，共赴沧溟。12年的文章行健，《蕉风》与作者同步，体验这个奔流赴海、天地渐宽的文化历程。到1970年《戏剧专号》，不期而能有此浩瀚波瀾。文章千古事，当年始其事的姚拓，得失寸心，至此可暂时浮一大白了。

7 OCT 2003

友联诸友历经忧患，逢变之际，各有所见。《蕉风》创刊，播种同行，尽量尊重主编的自由发挥空间，而主编又尽量容纳不同的创意。君子和而不同，无乖戾之心，无阿比之意。姚拓的“人本蕉风”，在出发时，各我投下一块同路的石子，那是“新诗再革命”。

(下)

当时，《蕉风》走入现代已逾半载，高潮渐起，正推向第一座洪峰。《戏剧专号》是篇幅最多的一期，厚达 240 页，刊出的 3 个长篇剧本，《愁园》和《汉丽玉》日后都曾多次上演，《结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以 3 个剧本的范畴而言，翻译、改编、创作各一，时空广及现代法国、近代中国、古代马来亚，斯时斯地，能同期刊出，也属罕见。

2003年10月7日 ● 星期二

白頁

海濱花雨

(寄自美国休斯敦)

- 7 OCT 2003

商 余

逢星期一至六页报



■ 钦鸿与梁秀英女士（左）合影。（照片提供/叶晋）

遥送
梁秀英女士

□ 钦 鸿

- 8 JUL 2003



接到梁秀英女士病逝的噩耗，悲哀不禁袭上心头。虽说生老病死乃人间常事，而且早就听说耄耋之年的梁女士久卧病榻，但一旦离去成为现实，仍不免感到难过和怅惘。

我之认识梁秀英女士并且还有一段交往，说来也是与马华文学的缘分所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曾经常在20、30年代上海的文学报刊上读到温梓川的诗文，后来慢慢知道他来自马来西亚的檳城。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后又返回椰风蕉雨的南洋，不禁对他产生一种莫名的好奇和亲近感。我开始注意收集有关他的一些资料，后来还把他写成辞条，编入我主持或参与编纂的几本辞典如《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中国现代文学辞典·诗歌卷》和《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中。所以，在没有认识梁女士之前，我已经与她的丈夫、马华文学前辈温梓川神交已久了。

1992年8月，我应马华作协之邀赴马来西亚作文学访问，遂有机会到了被誉为东方花园的檳城。那天在当地华社欢迎我们的宴会上，我恰巧坐在梁女士的旁边，在一种又惊又喜的心情之下，我们彼此谈了许多，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回想起来，我们的话题除了那次访问以外，便是她的丈夫温梓川了。我向她倾诉了对温梓川的仰慕和关注之情，并且谈了自己准备对温梓川其人其作

做一些研究的想法。梁女士则非常高兴，爽快地表示愿意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随后，我由女作家叶蕾引导，登门拜访了梁女士。就在温梓川生前的故居里，梁女士翩跹赠给我《夫妻夜话》等几本温梓川的原著，另外如《梓川小品》这样没有复本的著作，她请叶蕾到街上复印了副本让我带走，以便于我学习研究。这次见面完全出于我的意外，而收获之丰又让我极感兴奋，梁女士与美仑美奂的檳榔屿于是便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时隔4年之后，我趁在泰国参加第2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便，从曼谷飞抵檳城。这次专程赴檳，主要任务之一仍然是拜访梁女士。上次访马回国以后，我仔细研读了梁女士以及吴天才等友人提供的温梓川著作资料，光是撰写了题为《温梓川与郁达夫》的长文，交由《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发表。接着，又通过城拓、李翰宗先生的帮助，收集了温梓川在《蕉风》杂志上连载的《郁达夫别传》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资料。拜读之下，我对温梓川研究兴趣愈来愈浓，尤其对这部《郁达夫别传》更是情有独钟。因为作为一名文豪和战士，郁达夫生命的最后一段是在马来西亚、印尼一带度过的，记载他在南洋战斗、生活的事迹和历程，自是南洋作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而温梓川不但早年与郁达

- 8 JUL 2003

夫在上海有过交往，就是郁达夫南下以后，也还有许多晤面和文字往来的机缘。加上他文笔老到，描写生动，显然是撰写郁传的最佳人选。事实上，发表在《蕉风》上的这部《郁达夫别传》也确实写得不错，与中国学者撰写的郁传颇有异趣，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却发现，此作在《蕉风》发表以后，温梓川又作过许多修改和补充，并且已经定稿准备付梓出版，只是由于不幸逝世而致搁浅。同时我也从一些资料中获悉，他还写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其中关于30年代上海文坛的回忆录尤其使我感兴趣。所以，这次槟城之行，温梓川故居自然仍是我必到之处。

念念不忘 出版温梓川作品

当叶蕾驾车把我带到那幢典雅而温馨的小楼时，梁女士已经如约在家里等候了。几年不见，岁月的风霜明显地在她的脸上留下了印记，然而谈起她的夫君温梓川来，她还是那样神采奕奕，兴致勃勃。她说1986年温先生病逝以后，她长时间陷于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她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才解脱出来。但对整理出版先夫温梓川作品之事，始终念念不

忘，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如愿。她现在有意逐渐淡出社团活动，以便腾出精力来做这件事，还不知道能否成功。听说我依然致力于温梓川研究，她立即拨电话请《光明日报·东方花园》的记者张

丽珠小姐过来采访，又翻箱倒柜地拿出温先生的著作、手稿、剪报、照片等许多东西让我和叶蕾查阅，还将温先生的游记《冬天里的伦敦》剪报集剧本、《郁达夫别传》手稿复印件赠送我，托付我设法介绍给中国大陆的广大读者。临别时，我们还在一起合影留念。

回到南通后不久，叶蕾给我寄来了张小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对我的采访记。原来，我的这次槟城之行，正值温梓川过世10周年之际，时间上的巧合，无疑为我此行注入了特殊的意义。我想，梁女士对我热情的接待，给我如许的支持，也正是出于她对先夫深沉的怀念之忧吧。不过，张小姐文章里提到我此行是为撰写温梓川传记收集资料的话，却使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我的本意只是想对温梓川作些研究，原来还没有为他立传之意，报上这么一写，倒使我颇有“骑虎”之势了。或许是

- 8 JUL 2003

我当时的表述不明，使记者产生了误解吧。然而读着以下的文字——“在1968年逝世时，他（温梓川）想要为自己的灿烂一生完成自传的心愿来不及实现，现在，终于有人来代劳，让遗愿成真了”，我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梁女士对我的最切期望吧。这样想着，我顿时感到自己肩上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加紧资料收集工作，准备着手撰写研究文章的时候，一场恶疾把我击倒在病榻，任我再有天大的雄心也无能为力了。不过，在漫长的治疗和休养过程中，梁女士的殷殷嘱托、叶蕾的热情帮助，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而我自己对温梓川研究的浓厚兴趣，也使我始终有跃跃欲试之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可以开始工作的时候，温梓川研究就首先提到了议事日程。我数次赴上海图书馆去翻查几十年前的旧报刊，试图寻觅、辨认青年温梓川在上海的文学足迹。又通过马仑、政欣、叶蕾、李锦宗等众多文友，在马来西亚查找温梓川在《南风》、《南洋商报》等报刊发表的文坛回忆文章。随后，我撰写了《温梓川编的〈郁达夫南游记〉》、《温梓川晚年的力作〈郁达夫别传〉》、《温梓川未曾出版的游记〈冬天里的伦敦〉》等文章，先后由《光明日报》和《南洋商报》发表；还完成了温梓川书稿《冬天里的伦敦》的整理工作，并且已经交付给上海的出版社，正在出版之

中；其他的一些事情也都在进行之中。可惜的是，这时我已经无法与梁女士取得联系，该城的文友政欣、叶蕾夫妇想了许多办法，也没有能帮上忙，只是听说梁女士已经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本来，我还有三赴该城的计划，因为我还想再向梁女士作深入的采访，却不得不因此而搁置下来。现在，采访梁女士的计划已是永远无法实现了。

此刻，我遥望南天，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和遗憾。如前所述，我与梁女士从相识到有一些交往，无不与温梓川以及马华文学研究密切相关。虽然我也听说梁女士曾在马华教育界辛勤耕耘四十余载，为管理学校、培育英才建立许多功德，但就我而言，却更对她数十年如一日支持先夫温梓川不胜敬重之至。她能在温梓川尚是一介穷书生时倾心相爱，又甘心为丈夫操持家务做好后勤，从而使温梓川得以潜心工作，写出如许精彩著作，为马华文学创造辉煌。温梓川病逝以后，她一直计划着为丈夫整理并出版遗著，虽然未能如愿，但完好地保存了温梓川的资料，也是厥功甚伟。现在，梁女士也追随温先生而远去了。她珍爱珍藏的那些温梓川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还会安然无恙吗？倘若不幸散失毁坏，将不仅是温梓川的悲哀，也是马华文学的重要损失呵！真希望有识之士能对此引起重视，设法把这一批宝贵的文学遗产征集、收藏到相关的文学馆或图书馆内，以便于永久保存，

也便于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学习
使用。倘能如此，则蒙女士幸
甚！温梓川幸甚！马华文学幸
甚！

2003年6月15日

(寄自中国)

- 8 JUL 2003



圖牧鴻與叶蕾(右)在陳家翻閱溫梓川
先生遺下的稿件。(照片提供/叶蕾)

南洋文艺

逢星期二及六出版

甘为 螺丝钉

雅波先生把原始资料汇集起来，为文学历史保持一个“原生态”，今人或后人可以依据这些现有的资料，重新爬梳与检视，或再度发掘，都是富有意义的。

南窗文艺

逢星期二、六见报

■ 甄供

文学咖啡座

• 陈湘琳 • 林春美 • 马盛辉
• 张景云 • 甄 供 • 庄华兴



25 MAR 2003

雅波

先生于去年杪和今年初先后给我寄来两小包的书籍，内有他的著作和主编的“德化丛书”，以及他编选、复印和自制而成的马华文史资料的本子，引起我兴趣的是后者，他将这些资料自编自制（包括复印）地装订成册，分赠予文友或同好，我想，获得赠书者，大约不止我一人吧？这样一来，他在时间、精神和金钱的耗费，付出的一定不小。

他那两册自编自制的马华文史资料的本子，内容是什么呢？一是收录90年代末期《南洋文艺》版的“我的文学路”专栏的篇章；二是收集2002年全年的“300字极限篇”的微型小说，刊出的园地也是《南洋文艺》。

集子的封面印着雅波先生的公开信，他写道：

诸位文友：

一些珍贵的马华文学史料或文字，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可能亦永无出版或重现的机会。在下略尽绵力，自整理自认为“有用”的史料或文字，以供阁下参考、编书、查阅与阅览之用。

别忘了，马华文学需要您的支持、爱护、继承与发扬。

整理：雅波

在这封短信里，雅波先生透露了他的忧患意识的沉重。的确，资料这种东西，散见于报章、杂志或是一些零星的篇章上，倘不及时搜集、整理和保存，随着岁月的淘洗，可能就会消失。雅波先生有鉴于此，做了一些工作，虽属微小，但却是一种贡献。

当然，雅波先生“自认为‘有用’的史料或文字”，未必就是其他人或我认为“‘有用’的史料或文字”，但这也无关紧要。因为雅波先生把原始资料汇集起来，为文学历史保持一个“原生态”，今人或后人可以依据这些现有的资料，重新爬梳与检视，或再度发掘，都是富有意义的。

由雅波先生的作业，使我联想到我们是否可以每年选编一本实录文坛重要事件与重大现象的集子，内收一年来文坛要闻、大事、力作，再加一份年度的文事报告，如漓江出版社出版的《'99中国年度文坛纪事》之类。让读者披览时，即可详知文坛概要；让专家学者治史时，有参阅的资料。必须指出，这是一种亏本生意，特别是读者人口日益下降的今天，编选之后，出版或保存，应作理性的评估。但是，如果个人或团体认为深具意义，不怕亏蚀，那就不妨去尝试。

写到这里，我需要声明一下：雅波先生与我，素未谋面，说不上私谊。我之所以认识他，是从他的作品和文字去认识和了解他，时间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那时我编文艺副刊，他投稿或我的约稿的情况下结下了文字之交，嗣后偶尔互赠彼此的出版物。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现在。事实是否如此，雅波先生可以作证。

后来听人说，他为人颇为低调，专注创作和做自己该做的事，不炫己新。不像某些文坛新旧贵族那样，动辄行使“话语霸权”，抛掷 MDAB 炸弹，我伤别人而后快。这就给我对他添了一份亲切感。最近，翻读他寄来的资料，知道他关心史料搜集，做了一些工作，大有甘为螺丝钉的况味。这又给我对他添一份尊敬感。于是，我就以我所了解到他那丁点的行迹，写进我的专栏里去。

我说雅波先生“甘为螺丝钉”，是从他主编的、含有宗教意识的《温情人间》集中的《做个螺丝钉》一文引申出来，也是我综合他从事文艺工作的推论。集子各篇文章没有署名，但可视为雅波先生为人处世的准绳，或许这也可作为他的文艺观来看待吧。这篇短文的最末一段写道：“做人，要像螺丝钉，当有用的时候，人家并不知道我们的价值；没有的（得？）用时候，人家就知道少不了我了。当人家需要我们这一颗螺丝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发挥自己的功用；当人家知道我们还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自抬身价，我们还是要很安份的做一颗螺丝钉，如此才能发挥大用，才能成为一颗名符其实的螺丝钉。”

淡世滔滔，做人要不卑不亢，需要勇气；要作一个有风骨的作家，更需要巨大的勇气。雅波先生甘为螺丝钉，勇气可嘉！

（作者为新世纪学院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25 MAR 2003



■游牧遗照

拜访 游牧

- 5 APR 2003

□王增文

作者案：

游牧不幸于2002年10月22日与世长辞。对于这位勤于笔耕长达半个世纪的前辈作家之离世，诚为我国马华文坛一大损失。笔者由于攻读南京大学中文硕士班课程，为了完成课程的作业，乃选择访问本地作家，因而写成了这一篇作业。后来得知游牧病逝，斯人逝去，徒留

一片唏嘘而已。遥想当日与游牧午后的畅谈的情景，如今仍历历眼前。为了向这一位马华前辈作家致敬，我谨诚敬地发表了这一篇访谈纪录，以让读者们了解这一位前辈作家在孤寂的写作旅途上一些心路历程。

一、前言

游牧 (1936—2002) 原名游禄辉，祖籍福建永定。

曾任职于华文教育界多年，退休前担任大山脚阿尔玛 (Alma) 新

亚华文小学校长。游氏执教之余，勤于笔耕，著作颇多，写了不少散文与小说作品。为我国马华文坛上颇负盛名的前辈作家。

为配合课程的作业要求，我选中了大山脚前辈作家游牧，加上之前探悉游牧亦为教育界同道，应该在话题上会谈得很投机，于是通过诗人陈强华先生提供联络线索，冒昧拨电联络，说明原意，游牧快人快语，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趁着下班后闲暇时间，我与同事张悦珍小姐驱车前往造访游寓，按图索骥，一下子就找到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而游牧早已在门口等候我们。

二、与时代并进的写作方式

游牧从事写作将近半个世纪。游牧在访谈的一开始时，就说他当时是以电脑来进行写作。在操作电脑技术方面固然无法比得上后生小辈，但是他多年来在写作上所培养出来的毅力，早已克服了操作电脑的技术问题，而且还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写作，并且以电子邮件模式投稿到报馆，充分显示出作家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被抛在后头的不屈服精神与积极的人生态度。

游牧很谦虚地表示，他仅能掌握一些电脑文书处理的技术，更复杂的操作技术就无从胜任了。当然，对于一名作家，只要能充分掌握电脑的文书处理程式，就已经是非常足够了，至少游牧在这一方面已经达到了以电脑来处理文书的基本要求。

三、老作家的感慨

游牧从事笔耕将近半个世纪，人生阅历颇多，加上多年来在文教界的服务经验，深知时代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本是无可厚非的，对于70年代以来马华文坛上一场为时相当久的文艺论争，那就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论之间的冲突，游牧作为一名前辈作家，见证了这场火药味非常浓烈的论争，不禁感慨万千，尤其对于年轻一代作家对前辈作家不留情面的批判，更是感到痛心疾首。

回顾马华文学史的发展，由于受到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加上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对抗，以及40年代抗日战争的冲击，还有本地华人社会所面对的各种严峻的时代考验等，文艺工作者对于整个大时代面貌的描绘及对现实状况的揭露，坚持以现实主义的文学观来进行创作，已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文学传统。

游牧生于抗战之前，见证了当代许多历史大事迹，年轻时确实受到当代文艺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当它谈论到70年代以来的那一场文艺论争时，很感慨的说道：“我毕竟是已经写了几十年，又怎么能甘心放弃呢？”对于当今的年轻一代有别于前辈作家的创作手法与风格，游牧并不排斥，他认为文学创作应是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在马华文坛上固然扮演过重要且主导的历史角色，而且现今也仍然有其价值，但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备受港台文艺思潮影响的文学创作模式也已发挥了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种好事。至少游牧是这么认为。

但是，对于新生代对前辈作家的文艺创作所做出的批评，有著竟然“出言不逊”，对前辈作家过火的批评言论，很难令坚持了数十年的现实主义创作论的前辈作家们吞下这口气，游牧就是如此。

四、走向创作这一条路

任何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必定有一个不寻常的起点，对于从事写作近50年的游牧，询及他是如何开始文学创作生涯的，他娓娓道出一段小时候的经历。

原来游牧自小就与书结缘，忆及就读小学时候，曾无意发现乃兄收藏在抽屉中的《天方夜谭》一书，他如获至宝般，并偷偷地把该书读完，豁然发现原来这部文学小说竟是那么精彩，从此就爱上了阅读文学著作。

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当时学子们梦寐以求的著名中学——檳城钟灵中学，游牧的阅读层面更加拓广了，他接触了大量的五四时期诸如巴金、丁玲、老舍、鲁迅等文学健将的文学作品，在思想上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与影响。当问起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谁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是鲁迅、老舍等，这些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对游牧的影响可说是非常大的，从他的散文作品风格，大略可见一般。

另一方面，游牧也开始学习写作，并经常发表作品于当时的《儿童世界月刊》。后来，游牧结识了一位《星洲日报》编辑陈征雁先生，谈论到写作的问题，当时游牧在陈征雁先生的鼓励之下，乃向其文艺副刊《文风》版投了一篇文

章，竟然获得主编的赏识，刊登出来，这对游牧来说，无异是一项很大的鼓舞。从此，游牧就走上了写作之路。那是发生于1954年的事情，游牧读到这里，仍然很清楚地记起其间的过程。

此外，游牧也向另一份也是本地颇具历史性与代表性的报章《南洋商报》的副刊《南余》版发表文章。屈指一算，其写作生涯不觉将近50年了。

在这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长河里，在游牧那一份高度的写作热忱的背后，如果不是有其过人的意志力，我想是绝对难以达成的。

- 5 APR 2003 (上，待续)

拜访 游牧

(下)

■王增文

•星期二

2003年4月8日

五、面对写作的困境

数十年来，游牧写了不少作品，可是结集成册的却只有5部，即：

一、短篇小说集：《生与死》、《那些过去的》及《演剧者》。二、散文集：《游牧散文》与《风生录》。

除了上述作品，游牧还有许多各种发表过的文章。谈及个人在写作生活方面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时，游牧首先对出版问题颇多感触。以往游牧认为只要有机会在报章上发表作品就已经够了，出不出版著作并不重要，而且加上本地出版条件并不理想，更减低了游牧对出版著作的热诚。

- 8 APR 2003

提到出版著作，以他个人的经验，通过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简称作协）的赞助则比较有机会，而且还可以获得该会 2 千 500 零古的赞助经费。但是上述这笔经费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每次出版的册数仅限一千本，其中 100 本作协留存，其余 900 本则由作家本人自己设法寻找书商售卖。在售卖的过程中，往往书商由于人事问题而最终不了了之，故出版著作总是吃力不讨好，诸多的折难，令游牧意兴阑珊而不再有出版著作的强烈的动机。

如今他发现过去的那一种不出版著作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要让后人有机会对本人的作品进行研究，首先就必须要有本身的著作集，因此出版著作主要是为后人提供研究素材。然而如今想要继续出版著作时，出版情况比起从前又更加不理想了，基于数十年来所坚持的文学创作手法已较难获得新一代出版界的认同，加上向乡团或文教机构申请出版经费又面对许多的竞争情况，游牧只好打消出书念头。

虽然现实环境的诸多考验，但并没有动摇游牧坚持写作的信念，他除了写散文之外，现在正进行微型小说的创作，只是还未发表而已。问起什么时候可以面世，他也不肯定。总而言之，老作家不肯伏枥之心，仍然可以揣摩得知。

其次，是新旧两代人对文学的创作态度所持的不同角度以及双方抗争的结果令数十年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前辈作家感到心寒。新一代的写作者在马华文坛出色的表现，后浪赶前浪的成果固然令前辈作家钦羨与激赏，但是对于这一批新生代对前辈作家的严厉批判，有者甚至已到不留情面、不顾对方尊严的地步，令一些前辈作家尤感不忿。但是基于个人能力与才情，这一些曾在马华文坛上扮演过传承角色而目前还在继续写作的前辈作家们，在创作上已难寻求更高的突破，所以，游牧对于自己的新创作，总觉得难以获得肯定。

第三，就是各种刊物上发表作品的稿酬相当微薄，较难激励写作者热衷于写作。

六、对马华文坛前景的展望

针对马华文坛的未来前景，游牧也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他对此抱持乐观的态度，此话怎说呢？游牧认为马华文学的存在取决于我国华文教育的继续发展。

他表示，与东南亚诸国相比，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是最稳健的，我国有 1 千 280 余所华文小学、

60 所华文独立中学，以及 3 所民办华文大专，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由于华文教育体系的完整，不仅能延续华人文化的传承，也保存了广泛使用华语华文的机会，这对于我国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游牧举邻近国家泰国与新加坡为例，泰国华人在文化与血统上已被同化（泰化）了，华人文化的传承已走向衰亡，而新加坡则由于过度欧化，华文学校从 80 年代初开始至今，逐渐灭绝殆尽，该国华文教育事实上早已中断，因此上述两国的华文教育前景已渺茫，华文文学的发展连带受到冲击，已很难再维持当年的面貌。

另外，游牧也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由本地华文教育所栽培出来的华文写作人在受到当代中、港、台文学的影响与冲击，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代写作人也相应仿效与进一步创造，也将开展出具有本地色彩的文学风貌。

七、结语

游牧将数十年来的创作心得侃侃谈出，从所谈论到的点点滴滴，可以感觉到他的心境已不复当年，尤其谈到是否还有什么写作计划时，他表示没有，平时只是随意地写一点评论时事的杂感文章而已，问他如果不再写作的话，会从事何种艺术活动，他思忖一下，说大概是写写书法吧！然而过去的写作热忱还是会继续维持下去，至于要写出鸿篇巨幅的作品或许已经力不从心，而短小精悍的杂文及微型小说则还能胜任有余。当然，对于这么一位前辈作家，不管他是坚持何种文学创作观，只要能够写得精彩，又何尝不是马华文坛之幸呢？

两个多小时的访谈进行得很顺利，而且言谈甚欢，但很快就成为过去了，当我与张悦珍走出游寓时，才豁然发现原来天色已变，还未来得及走出宅门，淅沥的雨点已经降落，急忙冲上车，在车上向游牧挥一挥手，我们踏上了归途。

（下，续完）

南洋文艺

8 APR 2003

马来西亚的 1-8 JUL 2003

族群文学 与国家文学

撰/外谷悦 (日本)

译/庄华兴

译者按语：

这是一篇讨论马华文学和国家文学关系的文章，虽然资料的掌握有些问题，论析亦不够深入，但外国学者参与讨论上述议题，而且在本国学界以英文发表，还是第一遭，立场也颇堪玩味。特翻译出来，马华作家或有话要说。

马来西亚由 3 大种族及其他多元族群组成。马来人占 50%，华人占 29%，欧米尔人占 8%，组成 1 千 900 万总人口，他们的分化从基础教育到基督教，而文学也不例外。马来作家的创作媒介语是马来文，华人则用华文，欧米尔人用淡米尔语。我怀疑各族群共享的“马来西亚文学”（Malaysian Literature）是否已经萌芽成长。

马来西亚政府自 1981 年便通过语文厅与藏书馆 (DBP) 设立国家文学奖。迄今 8 位马来作家已赢得这定时举办的文学奖项，得奖人享有优惠，如奖金 3 万零古，同时享有免费的医药照顾。一方面，有关奖项标志着对卓越的文学成就的肯定，另一方面它也被视为现代马来文学的典律创造，因此，得奖者的甄选引起我们的兴趣。

当然，马华文学在 60 年代即建立起本土文学的主体意识。然而，在五一三种族事件爆发，进而促成 1971 年的国家文化计划之后，马华文学已经被视为非马来文文学，并被排除在国家文学的边界之外。故华人的想象是马来语文文学=国家文学，因而作出强烈的反对。这种状况反映非土著（华人和淡米尔人）和土著在新经济政策之下已截然二分，同时马来人在此政策之下获得特别优惠。操华语的马来西亚人（Chinese tongue Malaysian）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半数的民族（马来人）可以享有文学，同时亦宣告他们自 19 世纪末到 20 年代的翻译工作对印尼-马来文学作出贡献。他们对马来作家独占上述国家文学奖深表不满。由华社颁发的“马华文学奖”遂于 1989 年设立，方北方被选为第一届得奖者。这对未曾思考过马来西亚文学的马来人产生冲击。倘若马来西亚文学可以诠释为“马来西亚民族”的文学（Literature of “Bangsa Malaysia”），它首先就开启了创造马来西亚民族的先机，符合首相马哈迪于 1991 年倡议，列于 2020 年宏愿中的 9 项重大挑战之一。

2020 年宏愿中塑造马来西亚民族的宗旨是为了促成国民统合，以摆脱新经济政策施行以来造成的种族分化现象。然而，华人把马来西亚民族翻译成“马来西亚国族”，显示它不是自然存在的种族，而是国家制造的人为建构的结果。这是华人对马来西亚民族的负面评价，也就是说，它并非马来西亚国族的马来西亚国，而是马来西亚国的马来西亚种族（Malaysian race）。塑造以民族为基础的马来西亚人（Ethnic Malaysian）的愿望被视为五一三种族事件在后 70 年代以及内安法令在后 90 年代的记忆再现。譬如，福素素在短篇《亲爱的丹尼斯》，如是描述“我”（华人）和马来同房的关系：

碰成了我们之间最敏感的话题，谁也不敢先去触及。唉！只不过是一只盲牲罢了，竟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弄得如此紧张。我不禁想起那年——1987，那年的中南海。

对于文学作品，触碰种族摩擦已然成为马来西亚在 1969 年五一三种族事件以后的“敏感课题”。虽然有少数几部作品，在某些限度挑战这个不易处理的课题，但作者并无法清醒地处理这个问题。1995 年，丁云（1952-）在新加坡提呈一个题为《马华文学中的族群关系》的报告，提起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围乡》，还有夏霖、梦平、小黑、福素素、薇修的小说触及的敏感课

题。报告中的内容谈到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说这是个非常特别的情况。笔者认为，丁云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获得新加坡公民权。在这些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者是《围乡》（1982）和魏素素的《亲爱的丹尼斯》（1982）。前者关涉五一三种族事件，后者与1987年内安法令的基调有关。两部小说展示了两个有关马来西亚种族摩擦的历史机会。

各族群文学的交流

各族群文学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创造新的文学，无论是“马来西亚文学”或“马来西亚民族的文学”。以下我将介绍80年代以后的某些运动。

此运动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1983年由语文厅与藏书阁召开各民族作家交流会，由当时的语文厅文学组主任乌斯曼阿旺主导。会上议决进行马来文、华文、英文和淡米尔文出版物的对译工作。这个半官方促成的组织，由下列人士筹组，华人这边是吴天才、阮铃、年红、杨贵谊、碧澄；进行双向对译，介绍马华文学、马来文学等。同时在1987年4月于语文厅举行《华社与马来语文展1877-1987》。

此外，华裔马来西亚公民也通过其他途径进行马来西亚文学的交流。例如砂朥越诗人吴岸（1937-）对出版马来文和英文版的作品表现非常积极。而乌斯曼阿旺等人和砂朥越华裔作家也有非常成功的交流。犹有进者，在各类诗人圈中，著名的天鹅星诗社于1985年出版了《多变的缪斯——中美巫诗选》。此书的出版目的应该是为了消除马来人对马华文学的误解——以中文作为描述中国的标准。

一个值得注意，并且与马来文-国家文学有关的事件是1983年于雪华堂召开的会议。这次的会议成为华裔和淡裔马来西亚公民并肩奋斗的范例。马来西亚作家大会已于1982年在新加坡召开，淡裔作家第一次和马来作家、华裔作家同台而坐。1985年的大会更显出两项宣言：抗议把华、印裔文学称为移民文学，同时要求开放国家文学奖予各族群作家/各语文学作品。这些宣言在马来西亚淡米尔作家协会主席、雪华堂教育委员会和华裔马来西亚作家出席的交流上获得接纳通过。

-8 JUL 2003

- 8 JUL 2003

对马来人而言，马来文学和马来西亚文学是毫无分别的，似乎说明在多元民族的国家，缔造统一的马来西亚文学仍需要时间，原因系于这样的一个图景：马来文学和华文、淡米尔文学的对立。在这种状况下，外来观察者的存在或许具备某种意义。

注：原文以英语发表于国民大学主办之“第3届马来西亚研究国际学术会议”，2001年8月6日至8日。作者为东京立教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专事研究马华文学。

2003年11月8日 ● 星期六

林英强的

□ 饮鸿

《郁达夫先生及其作品》

郁达夫生命旅程中的最后一段中，有三年多时间是在马来半岛上度过的。他与大家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热情参加马华文学运动，在当地人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牺牲以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发表了许多纪念和研究他的文章，也出版过好几种关于他的书。林英强的《郁达夫先生及其作品》，就是其中的一本。

此书1974年8月31日由马来西亚居銮教育出版(马)有限公司印刷出版，发行人郭玉成。以小五号字竖排，共68页。封面上有“教育文丛”的字样，扉页上却注明“林英强主编：生活文丛”，版权页上还有“生活文丛”的书目，《郁达夫先生及其作品》便名列其首。

该书署林英强著，其实应属林氏的编著。全书分事略、作品、评语和附录4个部分。事略部分是编者为郁达夫所作的小传，郁的文学经历、成就以及为抗日而献

- 8 NOV 2003



身的业绩，均有简略而明确的记述；作品部分内有单行本及集刊、书刊所收作品。逝世后发表的作品和报章期刊所收作品四栏，分门别类地辑录了郁达夫一生著作的细目；附录则是郁达夫留日期间在日本《爱知新闻》发表诗作的原文。上述内容资料收罗详备，编排有序，对读者了解郁氏生平行状和著作情况颇有助益。其中“逝世后发表的作品”栏内所收香港、新加坡出版的多种作品集，如郑子瑜编的《达夫诗选集》（星洲世界书局1957年版）、陆丹林编的《郁达夫诗选抄》（香港上海书局1962年版）、金紫霞编的《郁达夫的爱情日记》（香港蓝天书屋1963年版）等书，都为权威的《郁达夫研究资料》（陈子善、王自立编）所未收，更显出它独有的参考价值。

“评语”栏里，林英强除了肯定郁达夫作为“五四巨匠”的文学地位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外，以主要篇幅对郁达夫“寄情于诗寄情于酒”的所谓“颓废派”表现作分析，认为那不过是诗人的伪装。又认为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中所写的，“虽然以‘我’为中心，却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实有的事情，往往由于凭空虚构，或者是从别人的故事中‘硬化’过来的”。他并且引用了与郁达夫有密切交往的郭沫若，并云云的话语，来证明郁达夫“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

编者林英强，原籍广东梅县，是李金发所推崇的象征派诗人。30年代曾活跃在中国大陆诗坛，曾任广州《星期报》总编辑、南方诗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过《爱地福》、《海马图》、《沙漠船之旅歌》等诗歌散文集。他1939年南下后，曾任马来亚《马华日报》国际新闻编辑兼副刊主编、社论委员。他与郁达夫相识，可能放在这段时间。郁达夫曾为他写了一幅诗：“一骑功成万马/是谁纵放感南侵/谁君珍重春秋笔/记取遗民并底心/英雄克正/郁达夫（印）”。这幅诗，就被林英强用来印在《郁达夫先生及其作品》一书的封面，作为他对郁达夫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的一份纪念。

- 8 NOV 2003

南洋商報 《南洋文艺》

<自由日報>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一日 (星期五)

華裔史實

雅波

(一) 飄洋
苦從窮中強
美好生活向 艱難

(二) 邊海
三月海上飄
相見皆同胞 奮抗

(三) 落地
南洋種植杏
橡膠錫米長 難返

(四) 生根
一臥過三代
駐留已百載 自強

(五) 尋源
回鄉人不倦
空留老舊屋 祭祖

◆雅波
古老太平
速寫

美英王之星
孤阳斜照乱葬碑
伴属海山派
我属义兴派

(2)

当年呵当年……
午后只听阿伯说
不落雨雨城
雨城不落雨

(1)

首条铁路通

一八八五年

(6)

像足此太平

鴉片战争论太平

太平代拉律

拉律不太平

(5)

笑指英军路

吮着家乡鸡小孩

陆亚史是津

邮景普是津

(4)

今朝一堆泥

岭南古属昨地震

悲情苦华工

百年回残庙

(3)

官孙在卖血

太平以鲜血砌成

儿子对母说

阿伯对子说

(9)

笑得好凄凉

大善佛堂善萨笑

从没回家乡

我见中国天

(8)

晴几点下雨？

在人仰头齐望天

中酸呵往事

血肉呵太平

(7)

枕木竟失眠

今日一九九八年

马华文史（7）

名编系列与其他

整理：雅波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年7月29日